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3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目 录

文 献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发言..... 聂荣臻(1)

历史的回顾

- 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徐向前(18)
接管南京前后.....宋任穷(66)

人物介绍

- 陈毅在赣南闽西.....蓝君文(84)
罗荣桓同林彪的一次原则斗争
..... 梁 汉(108)
叶剑英与我党我军历史科学的研究
..... 范 硕(125)

专题资料

✓ 海外同胞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 黄慰慈 许肖生(146)

美国对华侵略干涉的失败和我解放战争的胜利

翁仲二(161)

黑龙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元仁山(183)

✓ 改革开放方针形成的历史考察 孙大力(214)

译文选登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史料三则

..... 马贵凡译(242)

小资料

✓ 党的各级委员会制度在军队的恢复

..... 瞿定国 周炳钦(255)

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45年5月9日)

聂荣臻

编者按：聂荣臻同志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从路线的高度，对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建8年来的工作作了深刻的剖析。发言讲到未来的任务，对即将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很透辟。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现在读来也很有教益。

同志们：

晋察冀代表团讨论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报告，全体一致拥护这两个报告。我个人也无例外地拥护这两个报告。我今天的发言，既不是总结晋察冀将近八年的抗战经验，也不是反省我在晋察冀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我仅仅是以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的精神为准绳，作为测量晋察冀进行人民战争的尺度，并据此提出今后任务上几个问题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晋察冀执行的路线正确不正确

呢？就是说，是不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路线？整个抗战还没有完结，中央没有作最终的总结。但是毛主席的报告，已经正确地作了将近八年抗战的总结。正因为这个正确的总结，产生了今后正确的方针和任务。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就指出了两种方针两种前途，就是国民党的方针与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上，党内曾经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产生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实质上，不管是在党内党外，都还是两条路线。那么，我们在晋察冀所执行的是哪一条路线呢？我认为我们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从党的方面来说，才能由内战中间在晋察冀所保存下来的很小的党，变为群众能信任和依靠的力量较大的党。在今天来说，晋察冀拥有三十三万四千多党员，联系着两千多万的人民。正因为这样，才能由地下党变成公开的党，有了武装，有了政权，有了根据地。这都不只是由少数党员长期做地下工作或者靠部分共产党员搞盲动冒险所能获得的。而是由于在伟大的人民战争中间，把晋察冀的党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晋察冀的党是经过了考验的，是有战斗力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早就会被凶恶的敌人反复“清剿”所击溃，从人民中间拔掉了我们的根。晋察冀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岗位，坚持了自己的地区，坚持与敌人进行残酷斗争，不论是在山地还是在平原，特别是在平原地区，经受住了更为严峻的考验。晋察冀边区从长期人民战争中锻炼出来了。从军队方面来说，由留在晋察冀三千左右的八路军，变为十多

万的八路军，不仅据有北岳、平北等山区，而且开辟了冀中平原，由冀东推进到伪满统治的辽宁、热河。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就是说，八路军是从人民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脱离人民的，单纯军事观点，或者不是执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么我们就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在敌后就站不住脚跟，早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更谈不上八年的坚持抗战。我仅提出这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其它的我不想多讲。

人民战争的发动和组织是怎样起来的？我想，这不是什么英雄站在五台山高喊“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就会起来的。这是一个艰苦的群众工作过程。这里不详述这个过程。总起来几句话：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相结合，民族斗争与民主民生相结合，发动广大人民，特别是减租减息，发动了广大农民；依靠农民为我们的基本力量，争取这个基本群众的优势去发展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去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我们所执行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在执行这条路线下，我们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的。

但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不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呢？不是的。我们有摇摆，不论政治上军事上都有过偏差。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完成任务上来说，也就不是那样美满、没有遗憾的。在政治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的投降路线，曾经在党内占据过领导地位，尽管时间不

长，对晋察冀是有影响的。譬如，在政权上来说，中央曾有同志反对过我们在晋察冀自己搞政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搞起来了，所以，还是继续在那里搞，并且我们取得了合法地位，所以我们没有被这个意见所动摇。假如这个问题^①早点发生，我们就要考虑。那时情况会怎么样呢？我们曾经接到过这样的电报，不同意成立晋察冀边区的政权。^②我们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觉得需要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那时候一直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电，我长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延安学习两条路线时才知道。一九三八年四月晋察冀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定。在这个会议上，有这样的话：不要强调民生问题。因为我同意这个话，所以也就把十二月会议这桶“冷水”冷冰冰地提到五台山上，并且冷冰冰地泼到刚发动起来的群众中间去。当时给予群众运动，特别是减租减息以一些影响。虽然四月传达，六月就纠正了，但是水泼下去了，要把火重新烧起来，总要费点劲。过去我们觉得，在晋东北群众运动刚刚起来了，忽然又低下去，认为是我们领导同志工作不深入，或者是山西老百姓没有河北的好；也曾经谈到是不是阎锡山统治比较厉害一点呢？我想，完全不是这样的。应该归根于我们泼的这桶冷水。水泼下去，火当然是灭了。这不能怪烧火的人不会烧，或者怪山西的柴不如河北的柴好，也不是阎锡山统治

^① 指 1937 年 12 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

^② 1938 年 1 月 28 日王明致电中共中央，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

怎样厉害。这样，群众运动是受了一个时期的影响，不管时间的长短。

这里，我想我们的民生问题与政权工作一样，影响基本上不大，而且也很快地纠正了。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路线的错误，并没有在民生问题上否定十二月会议。因此我们纠正这个错误还不是很自觉的。虽然以后我们又向对的方面去做，但这个错误没有否定，在思想上没有弄清楚。所以在思想上正确的路线和不正确的路线长期地纠缠在一起。这是在政治方面。

在军事上来说，我们执行的也是人民战争的路线。但是和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也是有偏差的。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到了敌后，曾经有好多同志讲：“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在我思想上是半斤八两，八两半斤。这样一来，在思想上把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降低了，运动战的份量增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洛川会议在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洛川会议在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呢？我想还要挖挖根，这个根就是内战时期的经验。虽然内战后期在战略方针上有过遵义会议的清算，但是整个内战时期的军事思想并没有清算，所以，毛主席的思想也就不能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自然的问题。因此，把自己过去的一套搬到抗日战场上去。当然内战时期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并且敌后抗战也靠这个本钱。我们很多内战时期的老干部在敌后坚持抗战，组织军队，以及各方面的成绩

都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因为情况不同了，我们还死搬内战的一套，我们就错了，这就是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但是我们在执行中间是不是完全的经验主义，完全搬内战的一套？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从游击战来说，也有新的发展。打过运动战，也不完全是内战的一套。内战时候粉碎了国民党对我们的“围剿”，我们曾经有过拿手好戏，就是集中优势兵力，袭击敌人的一点，打击他一路或几路，各个击破。粉碎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围剿”，就是很好的范例。我们到了敌后，对付敌人的“扫荡”，没有这样的雄心，想打垮他几路这样来粉碎“扫荡”，我们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一般的说，我们打运动战，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下，采取了这个战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有的。有人说，我们从平型关开始就打运动战，这是不对的。这也是运动战，那也是运动战，这样的看法，我不同意。如果说，我们在敌后抗战，所有的一切方针、方式都是运动战的方针、方式，那么我们是错误的。说我们同内战后期一样，内战后期国民党在战略方针上采取了堡垒政策，那个时候我们采取了所谓短促突击。假使短促突击有其战术的地位，那把它提到战略地位就错了。我们在敌后打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消灭了敌人，在战术上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搞运动战那一套就错了。我想，我们不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思想上是存在着运动战的思想的，过分地强调运动战，比如说运动战、游击战，游击战、运动战，这中间究竟哪个占主要的地位？把运动战、

游击战放在同等地位也是错误的。如果把运动战放得更高，就更错了。我们所执行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不错，十二月会议曾经提到了运动战，我们有运动战的思想，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怪十二月会议？我们打运动战的思想是不是由十二月会议来的？我想不是。如果政治上是由十二月会议来的，那军事上的错误就不是从十二月会议来的，是在自己脑子中有这个东西。名字是一样，内容不一样。十二月会议的所谓“运动战”，他是看不起八路军的力量，而是依靠国民党去打运动战。我们是另外一套，我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运动战。如果说十二月会议依靠国民党打运动战是右倾思想，同政治上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脑子里存在着内战时期的运动战思想，搬到抗日战场上去用，这是“左”的思想。不管怎么样，“左”的也好，右的也好，这两个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分清楚它们的来源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怪人家，要怪我自己。

我顺便在这里举个例子，也是在华北争论的问题，即“百团大战”的问题。我们晋察冀是百团大战的主角之一，正太路的两头，晋东南在西头，我们在东头。对百团大战大家展开的争论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认为是一个战役，或者仅仅是以一个战斗的得失来论是非的话，我认为不能这样看。就是说在晋察冀吃亏比较小，晋察冀就是对的；晋东南吃亏大就不对。我不是这样的看。不应该说吃亏就不对，不吃亏就对……尽管我们吃亏不大，而且也搞掉了一些敌人，打掉了堡垒，开辟了地区，但是不能因为有成绩，在晋察冀就没有错误，就没有关系，我也不是这样看。

法……怎么样说呢？在这里可以举几个理由：用百团大战反对东方慕尼黑；^①用百团大战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用百团大战打通晋东南和晋察冀两个地区的联系；用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晋察冀虽然开始在正太路上打了二十二天，但差不多整个华北都动作起来了。我看这个意图很大，不是仅仅从小小的战斗出发，很明显的是战略意图。^②但是，现在看，东方慕尼黑不是用百团大战可以打破的，反对是要反对，但不是拿百团大战来反对。敌人要进攻西北，也不是用百团大战所能破坏得了的。同样的，想打通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正太路破坏得差不多了，也是不能作到的。这些都是过低的估计敌人，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力量的结果。就拿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讲，这个百团大战也没有打破它，粉碎它。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也不仅是战术问题，而是属于战略思想问题。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打破了敌人的几个圈圈，打断了一些环子。以后产生了武工队的办法，还是以游击战争来打破敌人的蚕食政策、囚笼政策，不是用百团大战所能粉碎的，而是长期的斗争才能粉碎的。但是为什么产生了百团大战呢？我想

① 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当时的降敌暗流。

② 聂荣臻同志这里着重从执行人民战争路线，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角度，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4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战役是这样总结的：“我的看法是，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中也有较大的欠缺和问题。首先是在宣传上出了毛病。”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作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见《聂荣臻回忆录》1986年3月版合订本第508、509页）这是他对百团大战的全面看法。

还是挖挖根，仍然是由运动战的思想而来的，还是内战的一套。我们内战时期首先强调怎样破坏敌人？怎样调动敌人？这里一打，那里一戳，使敌人的计划不能实现。我们在内战中的一套，在抗战中间也搬来了。这个运动战的思想，是内战的根子，这个东西自然在我们看来，那是一个军事上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总结：因为百团大战有错误，便说军事路线是错误的。这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总起来看，由内战转变到抗战，在军事战略上的转变，我们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曾经这样估计过我们这个转变，是顺利的转变。我也同意这个估计。但是从上面这些东西看来，这个军事思想并没有搞通。如果抗战中间是两条路线，没有第三条路线，那么在这两条路线上，我们究竟所执行的是哪一条呢？我们所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但有错误有摇摆有偏差。在这个路线问题上，有教条主义的影响，也有经验主义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化合物，并不是变了质，形成了另外的路线。另一方面在自己脑子里有杂质，混在毛主席路线中间，因此毛主席整个军事思想体系没有在脑子里完全建立起来。这是在军事路线上我自己的一个反省，从路线方针到思想根源的反省。当时我们有许多错误，我不在这里一一的讲，我在这里仅仅提出这个根子，如果要讲的话，将来在别的会上讲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路线上的估计，我就讲这一点。

现在我讲下面的几个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和朱总司令的报告，在我们晋察冀

这个角落里联系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内战危险的问题。在毛主席的报告里，很清楚地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反动集团的本质；同时也指示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还要走一些曲折迂回的道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对的。我们不能对国民党反动集团有任何的幻想，也不能走一条直路，就是打内战。我对于国民党反动集团这个问题，是经过很长时期观察的。在我来延安之前，“七大”还没有召开，使我对于国民党，不能很好的认识清楚。博古同志那天的发言，我觉得是很对的。我曾经回想过洛川会议，由军事问题联系到很多问题，譬如对于在陕甘宁要留多少兵力的问题，出兵要出多少的问题，好象是技术问题，而实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我又回想到在这个会议上，曾经谈到军队出去后怎样发展的问题。我是搞军事的人，对这一点很关心。但是在这个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对国民党问题，今后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脑子里曾经想过：是否要在国民党里搞议会政策？但我是搞枪杆子的人，还是偏重在这方面。到十二月会议中间，很明显地形成了这条错误路线。博古同志的发言中已经把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很奇怪，洛川会议时，正是刚刚同国民党停止内战才几天，过去天天讲蒋介石是自古以来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但是现在马上变了，变成拥护了；拥护拥护，总而言之，拥护很多就是了。一直到六中全会才有了正确分析。就是说，毛主席分析到两党的合作，可能是像大革命时代的形势，有共同的

纲领。可十二月会议是另外的分析。我们得到这个报告之后，总觉得有一点困难。不久，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来了，正是针锋相对，我们就落了个空。毛主席的报告里也分析了这个问题。在长时期中，时局一下好转，一下又逆转。这样转来转去，始终不知怎样转法，很恼火。这就是仅看蒋介石的面孔的表面，他笑了，就以为会好一点，他发了脾气，就以为坏了。直到这次在毛主席的报告里说得很清楚：不仅看他的面孔，而且看到他的骨髓。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国民党认识清楚，不要等什么好转逆转。认识清楚，我们就有了方针。内战早已存在，不过是局部的。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之下，使内战仅限于局部。因为国民党的反动集团不放弃法西斯统治，内战是很难避免的。要把内战限于局部或者避免内战或者推迟内战，必要的妥协是需要的，对我们有利的。这不是幻想，因为我们看到他的骨髓了。可以使内战推迟、避免和限于局部的各种妥协是很重要的。因此，不管参政会也好，谈判也好，这些都是公开斗争的方式。主要的是我们要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

在我们党内有这样一些情绪，就是否认必要的妥协，要走直线。就是要打，要打蒋介石，否认必要妥协的意义。同样我感觉到在我们部队中间，有些同志对于内战，打国民党有很大兴趣，认为打日本总麻烦一些，打国民党好打一点，这也有一点内战内行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种是对内战厌倦的情绪。因为已经打了十年内战，觉得很麻

烦。毛主席已经讲过，我们是长期的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我们不能怕麻烦。如果内战真来了怎么办？要来，就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来了，我们就要坚决地打。只要我们思想上有准备，就能够打。这样，也许内战不会来。总之，来了我们就要彻底地揍它一家伙，或者也许是局部的，打一下就停止下来。不管怎样，我们应当有准备。不是怕，不是厌倦，不要怕麻烦，这种厌倦是不对的。革命就是麻烦，毛主席已经再三讲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有这样的态度。

第二，就整个国际形势来说，战后盟国间的矛盾会增加。因为大家都要争夺战后的果实。但可以这样说，矛盾是不会立即发展为世界大战的。从国内来讲，越接近胜利，内战的危险也愈大，为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国民党反动集团要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因此，我们应该有一切准备，不能使抗战胜利果实为国民党反动集团所独吞，而要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说到的我们的路线和我们的精神，就是为了胜利，为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第三，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要想使新民主主义彻底实现，一定要进行土地改革。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基础。只搞减租减息，还不能实现这个任务。但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用什么方法实现？这是个很复杂同时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要看整个形势的发展和我们的力量来决定。在毛主席的报告中，已经把这个原则提出来了。具体来说，现在还很困难。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还不是可以一气呵成的，先在某些地区取得胜利，而这样的地区现在已经存在了。在打败日本之后，农民斗争要转变过来，向地主要土地，特别是在有基础的地区。因为过去我们的土地政策决定是减租减息，是为了联合地主一致打日本。但是在将来，日本已经打出去了，那时已不必联合地主，农民就一定会要土地。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的注意。正因为这样，假如我们在局部地区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实行了土地改革，对于全国革命的推进究竟会起些什么影响呢？在全国来说，政治上的要求是成立联合政府，经济上是减租减息。这样，对全国革命事业的推进上可以减少些障碍。在全国经过减租减息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再转向耕者有其田是有利的。毛主席的报告中，我认为就有这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是对的。所以在根据地中间，我们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在全国农民中应该有这样的解释。不久以前我得到晋察冀的电报，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提出了二五减租是根据南方情况订出的，不合乎北方情况，因此二五减租是不对的。怎样是对的呢？就是要分土地。现在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我想到，在我们党内占大多数的人是出身贫农，就是说在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急于要土地的情绪。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想将来那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分歧。不过这种分歧，不是大革命时代农民要土地，我们给不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给的问题。过早了，战线扯得太宽，可能对我们不利。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注意。

第四，两个转变问题：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在抗战中间，由于思想没有搞通，特别是存在着经验主义，在转变中间非常困难，执行中间也有了偏差。在今后的转变上会有更大的困难，同样的，我们要搞通思想。不是过去我们没有转变，今后我们要来个转变这样简单的问题。由内战转到抗战，在基础上，物质条件上，我们有与此相适合的战略战术，是很相称的。但是要转变，还发生了困难，发生了偏差。如果在反攻的时候，我们的战略要适应于反攻，很明显，必须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但是如果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装备的适当改善，这个转变还是很困难的。我想到现在要准备打运动战。怎样打运动战？我想了一下，如果像内战中间那样，在长征到陕北中间，很多重机枪沿途都不要了，轻机枪又休息，步枪每枝只有十颗八颗子弹，有的甚至只有三颗子弹。粉碎东北军进攻，一直打到山城堡，每人只有十几颗到二十颗子弹，就解决了问题，把胡宗南打败，结束了十年内战。现在是不是还拿那么一点子弹来干呢？不是的。这不是一两个战斗，只打一下，打五分钟的事。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具体情况。在华北应当准备一下，到反攻一来，我们就打运动战。如果光有运动战的思想，而无具体准备，是运动不起来的，应该求得装备的改善。将来很可能来一个突变，所以我们要在技术上战术上有所准备，特别在干部上应该有所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光是思想搞通也不见得行。所以现在应该很好的准备。

关于城市问题，我很同意彭真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

的精神，就我了解的，今天把它提出来，就是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在夺取大城市的方针上，毛主席讲过，我们是和大革命时代不同的。当然大革命时代是有便利的条件，城市工作有基础，配合作了一些军事组织的准备。譬如上海暴动和广州暴动。但是上海的里应外合，是合给了白崇禧、何应钦。现在条件不同，城市周围是我们的。现在是与我们自己合，与乡村合。城市的工作基础是薄弱的，虽然过去撒下了种子，但只是等待主义，没有作内应的准备工作。所以在方针上是和过去不同了。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组织地下军。根据我片面的了解，敌人重要的据点，一般的说不是伪军，主要是日军。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到将来对重要城市，即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还是日军而不是伪军。拿今天来看，对付我们第一线的都是日军而不是伪军。因为敌人吃过亏，有经验，上过这个当。所以我们一方面不放弃争取伪军的工作，但主要的应放在组织地下军上，成功的可能性大。现在有时争取伪军效果大，但组织地下军工作较可靠。现在许多大城市的周围，都有民众武装，有很多的条件来进行这个工作。如派遣人进行各种组织的准备，派人运输武器进去，甚至到那时还可以组织临时便衣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可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形来决定。关于城市工作的组织，要采取平行路线，就是一方面暴动，里应外合；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其它工作，如产业、交通不一定完全做这个工作，但是配合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我想这种暴动组织的指挥问题，不应放在城市党里头，因为这有危险性，有时可能把我们的

党组织全部搞垮。所以，我们党的经常发展工作，搞据点和我们准备内应的指挥系统要分开。

另外一个问题，在夺取城市以后，毛主席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就是搞经济工作。这个问题很重要。假如我们进城以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要维持治安，建立秩序是不可能的。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广州暴动，暴动后三天，我们没得饭吃，有几个女同志把饼干厂没收了，才吃到了一点。现在进了城市，由于经过了战斗以后，城市是“死”的，所以要帮它复活起来。就是要有饭吃，有炭烧，要有生活必需品。进城后，不仅要自己吃饭，而且还有百十万的群众也要吃饭，那时是有些麻烦的，所以要把郊外的粮食、煤炭运进去，这是起码的，是个很大的问题。只要有饭吃，有炭烧，群众是会高兴的。至于进了城市以后的整个经济政策问题，在毛主席报告的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里已经提出来了。我想具体问题还有很多。举例子来讲，譬如最近上海、天津、北平的中等资产阶级，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晋察冀去，他们是来看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究竟怎么样。如果我们搞城市，这样的问题一下就会来的。譬如，沦陷的城市解放后，对伪币的整顿维持问题，对法币的态度，这是第一。第二，战后我国货出口与洋货入口，政府是否加以统制或限制？战后对沿海商埠，外国人之出入口商及其工厂，政府预备作何措施？第三，敌区内的私人企业，在敌威胁下及自愿协助敌人者，政府对之采取何种态度？第四，战后敌营工商业处置问题，是政府管理还是工商业家代管？第五，战后一切工厂是以私营为

主，还是以国营为主？第六，战后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由工商业家盲目投资？这六个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可以想想，提出正确的对策。我对这个问题还没仔细想。现在我们虽没有进城，但可以提出来想想。等到一进城，马上这些问题就来了。从这些中等资本家所提出的经济上的问题来看，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同时有它的政治意义。毛主席说，我们会胜利，资本家也说我们会胜利。如果我们不胜利，他找我们干什么呢？譬如我们在政治上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工作有资本家来找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找他们呢？所以这样看来，城市工作是需要有很多办法，而且要有很好的办法的。这是我对城市工作提出的几个问题。

最后几句话：毛主席在报告中对整个形势分析得很清楚。指出了胜利的道路，不管胜利坦途上有任何困难与障碍，我们都能够克服。我在胜利的前进中充满着这种胜利信心和愉快的情绪。在晋察冀应付这伟大的斗争，更正确地说，全华北将是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在华北处于劣势，当然国民党军队还很多，他是可以来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打败日本，不让国民党夺取胜利果实。如果说我们和新四军分工的话，那天陈毅同志已经讲了，他们可以破敌收复南京，那么华北党的任务就是决定破敌收复北京。我的话完了。

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

徐向前

编者按：这是徐向前同志 1990 年 3 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战略追击卷》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军在战略大进军、大追击中的宝贵经验，是一篇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现征得丛书编委会的同意，先在本刊发表。

1949 年 4 月 20 日，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正式谈判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拒绝。这就将面临土崩瓦解厄运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玩弄“和谈”伎俩欺骗人民大众，妄图借机取得喘息时间，巩固江南半壁江山，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的险恶居心暴露无遗。为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顽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 4 月 21 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百万雄师立即遵令出动，一举突破敌人的千里长江防线，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全面大进军之日起，疾若狂飚，势

若雷霆，所向披靡，仅至 1949 年底的 8 个多月内，即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整个战略防御体系。敌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 5 个重兵集团，以及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和阎锡山集团残部，悉遭歼灭。不久，我军又相继攻克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从 1949 年 4 月至 1950 年 6 月，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 308 余万人，解放 16 个省份，完成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的解放，也为日后向西藏和平进军铺平了道路。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标志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人民革命政权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大进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伟大成功，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也有力证明了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决策、方针、部署及战役战术指导原则是正确的。由于这是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后出现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战略阶段，是各大野战军首次进行的、全国规模的跨战区整体联合作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略大进军、大追击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因而它所提供的经验，尤为珍贵。重温这段历史，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在现今与未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我军指挥员特别是高中级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艺术，不断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无疑会大有裨益。

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驾驭战争全局的发展进程中，确定不同战略阶段的军事政治目的，规定战略任务，实施战略指导，必须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作根本出发点。1949年元旦，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将革命进行到底”^①的战略任务，并据此指导我军取得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就是全面而科学地观察、分析、判断当时的整个形势，抓住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的结果。

1948年冬至1949年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有利于人民力量的根本变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蒋介石统治集团及国民党军队，则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正如毛泽东所论断的：“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②

战争形势的总特点和发展趋向，是由已经形成的一些根本条件规定的。

国民党的政治威信丧失殆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则有了极大增长。制造内战、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蒋介石，可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11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7页。

以说是达到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初期和中期，从未达到过的极端孤立的程度。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于分崩离析、四面楚歌、无力自拔的政治旋涡中。例如，桂系头目之一白崇禧突然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鼓动伪湖北省参议会通电蒋介石“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寻取途径，恢复和谈”，逼蒋表态；蒋介石被迫抛出“和谈”声明，施放“和平”烟幕，旋又匆忙“引退”下野，幕后指挥，并暗地组织力量经营其战略退路（一为西南，二为台湾）；李宗仁出台“代理总统”，收拾残局，要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但起死回生乏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蒋介石的嫡系军政要员，根本不买他的帐；孙科公然与李宗仁南京政府唱对台戏，亲率行政院人马迁政府于广州，致使“立法院的 CC 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互相指责、倾轧、弹劾，犹如乱麻一团，弄得李宗仁“深感为难，以至不知所措”；^②等等。与国民党政府这种四分五裂、日暮途穷的状况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却如日东升，光芒四射，成了中国人民的最大希望。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革命的统一战线。大批大批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正纷纷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线方面来。中共中央于 1948 年“五一”节发出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 937 页。

② 同上。

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①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或正在成批地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心向背的深度和广度，是决定战略进程和战争结局的一个根本因素。敌我双方在人心向背上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是偶然的。“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②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蒋介石集团即将灭亡的命运。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两年半的战争中被严重削弱，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均远远超过敌军。1948年7月，当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365万人左右（头两年的作战，已被歼264万人，内有近200个正规旅），其中正规军285个旅（师）198万人。我军的总兵力则由原来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当时，敌分布于第一线的正规军为249个旅（师）174万余人，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已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49页。

正规战争，建军 500 万，歼敌正规军 500 个旅，5 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据此，中央军委确定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度内，歼敌正规军 115 个旅（师）左右。而事实上，形势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一年计划，半年超过。至 1948 年底，我军即歼敌 148 个师（旅），并解放了东北全境。这样，就使我党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①1949 年 1 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结束，我军又歼敌 80 个整师，和平改编 26 个整师，合计 107 万人。经过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决战，国民党的总兵力急剧下降到 204 万人。其正规军虽保持 227 个师的番号计 115 万人，但大部为新编成或是被歼后新补充起来的，士气沮丧，战斗力已大不如前。我军的总兵力则增至 358 万人，其中野战军共有 188 个师（旅）218 万人，士气高昂，武器装备获得很大改善，炮兵、工兵的数量也超过了敌军。我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精锐兵团，争取整师整军整集团的敌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这正是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敌军的明显标志。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柱。国民党主力在长江以北的各战场上被我军大部歼灭，所剩 100 多万正规军又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绵长战线和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1301 页。

广阔地域内，蒋介石集团要想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遏阻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保住他们的半壁河山，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支持战争的稳固战略后方和经济实力，而我军的战略后方却日趋巩固，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总崩溃的局面业已到来。战争的不断失败，江北经济战略要地的丧失，庞大军事费用的开支，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财富聚敛，各级官员中饱私囊的腐败风气，使国民党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累计高达900万亿元（法币）之多。市场混乱，金融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业经济凋敝不堪。蒋介石的经济支撑点是美援，离开美援便无法生存。但在这个时候，美国眼见国民党已“无力应付”倒台的危机，出钱就不那么起劲了。1949年3月，美50名国会议员要求参院外委会将增拨15亿美元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提案付诸实施未获通过，就是例证。这对靠美元急救的蒋介石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国民党滥印滥发“金元券”和强令人民用美钞、银元、黄金兑换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经济上的“倒悬”之危，反而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进一步把大批人民群众推向饥饿、失业、破产的深渊。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使各大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向国民党政权猛烈冲击。广大农民纷纷起来抗征兵，抗征粮，抗捐税；许多人加入我党领导的南方游击武装，活跃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

南等省，钳制了大量敌人，构成对国民党腹地的严重威胁。足够的经济力和稳固的战略后方，是支持战争的基础。基础崩溃在即，国民党政府言战言“和”，都失去了资本，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已！而在解放区，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党坚决地领导了老区和半老区的农村土地改革，使 1.4 亿多农民翻身，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生产、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为保证战争需要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地区还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的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组织经过改造，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兵队伍大发展，成为一支保卫后方、支援前线的伟大战略后备力量。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党派出了大批干部去加强领导，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接收沈阳的经验》、《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等文件，并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工作政策，在贯彻落实中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特别应当指出，我党巩固战略后方，增加财政经济力量，完全是建筑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坚实可靠得多。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困难，但这与国民党的困难性质不同，是能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克服的。

上述各方面的条件，反映了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和形势发展总趋向，规定了我党我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而党中央在制定战略决策和实

施战略指导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困难的一面，阻力的一面，即可能导致形势发生逆转和曲折的一些问题。如果不去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它们，就难以保证党的战略决策、战略指导的稳妥可靠性，就不可能统一革命阵线内部的意见，粉碎敌人的种种阴谋，中国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第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有顾虑，尤其害怕爆发世界大战。蒋介石和国民党更是寄希望于此，拼命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想靠世界大战的爆发来救他们的命。党中央和毛泽东从解放战争开始就不断地分析世界形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与必能克服战争的危险。从战争危险到发生战争，是有个过程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分布在世界各地，还没有造成打世界大战的成熟条件。敌人宣传大战就要爆发，是恫吓人民的，我们决不能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上他们的当。至于美国出兵干涉问题，党中央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帝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因此，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

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①

第二，国民党是真和谈还是假和谈？国民党反动派在处境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求和”，是党中央早就预见到的。在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的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出现“和谈”问题的两种情形，指出：不论我党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目的都在于揭露敌人，教育和引导群众。1949年春，美国官方人士和国民党果然急不可待地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某些“自由主义人士”也起劲地随声附和，劝告共产党和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全面和平”。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划江而治，搞个南北朝，以便“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②为挫败敌人的“和谈”阴谋，党中央一面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并决定组成中共代表团，在北京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一面连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等文章。这就擦亮了广大人民群众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14页。

的眼睛，使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缓兵之计无法得逞。

第三，“中间路线”有没有出路？我军节节胜利，战略上处于优势地位，迫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作战转变为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进行顽抗；另一手是在革命阵线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色彩，以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这种“反对派”，就是那些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走“中间路线”的人士。他们既同美蒋反动派有联系，又同革命阵线有联系，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颇有影响力。李宗仁上台后就看中了他们，想藉此“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①同时，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也分化出相当一部分徘徊动摇的人们。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又不愿“降共”，不愿向人民低头，而是希图摇身一变，“体面”地走第三条道路。美帝国主义这时改变策略，与这些社会力量的存在密切相关。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断送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走这样的道路。党中央在通过党内外、海内外各种渠道，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明确宣布：一切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力量，或是尚在动摇徘徊的人们，只能选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路，选择与敌人决裂、向人民靠拢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31页。

线’”。^①在中国，“第三条路是没有的。”^②

第四，如何解决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军队的持续作战，影响战略后方的稳固，影响整个战局的胜利发展。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和严重灾情，由于我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付烂摊子，又由于人民解放军即将向全国大进军，急需兵员和物资的补充，这就使人民负担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此，党中央发出了“生产长一寸”的号召，要求不论老区或新区、城市或乡村，必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争取工农业生产水平有若干增长。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性和计划性，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一切缴获要归公，机关开支要紧缩。解决军队兵员和物资不足这个主要困难，既要着眼于保障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不致造成人民的过重负担，引起城乡民生的混乱和生产力的破坏。鉴于有的大区参军、脱产人数已超过全区人口3%以上，毛泽东尖锐指出：这种状况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是和持久方针不相适应的，必然引起新的矛盾。限定各地区的脱产人数，决不能超过人口的2%或2.5%左右；军队兵员的扩充，着重靠留用俘虏。事实上，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三野各部队中的俘虏成份，已普遍达到60—80%左右，证明大量留用俘虏是可行的。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就是以俘获敌人的全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83页。

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要解决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胜利完成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任务，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第五，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政权？对此，有些人没有信心。他们虽然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能够胜利，但不相信我们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巩固政权，振兴经济，建设新中国。有人甚至预言，共产党将像李自成一样，胜利了也会很快腐化，落一个惨败的下场。其实，这个事关革命成果会不会得而复失的重大问题，正是党中央在制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策略时，通盘考虑过的。对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作了系统的阐述。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同敌人作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报告分析了胜利之后国内外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根据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和党内的思想倾向，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防止居功骄傲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65页。

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①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党中央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历史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十之六七规定战局发展的方向和命运，是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的决定性环节。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形成，一是要有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一是要有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气魄，二者缺一不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拨开层层迷雾，排除重重阻力，作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断，就是二者相统一的鲜明体现。正因为如此，它能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和人民意志的锐利武器，加速战争进程的强大动力，夺取全国胜利的明确指针。

大进军的战略指挥艺术

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更重要的是主观能力的竞赛。“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77页。

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①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进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全面胜利，是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超战略指挥艺术分不开的。

渡江战役前夜，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处于战略优势和主动地位的我军，决心发展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敌军，则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和残存兵力，组织防御，挽救危局。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兵力部署是：敌汤恩伯集团 19 个军 45 万人，布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白崇禧集团 16 个军 25 万人，布于武汉、长沙、赣州、桂林地区；宋希濂集团 6 个军 10 万人，布于宜昌、沙市及鄂西地区；余汉谋集团 7 个军 11 万人，大部布于粤北及广州地区；胡宗南集团 13 个军 20 万人，布于陕中、陇东地区；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 8 个军 17 万人，扼守甘、青、宁三省；陶峙岳部 3 个整编师 7 万人，驻守新疆；阎锡山集团残部 6 个军 7 万人，死守太原孤城；西南地区以及绥西、榆林、大同、新乡、青岛等据点，尚有 10 个军约 24 万人。总计敌配置的防御兵力，共有 85 个军另 3 个整编师 166 万人。国民党还在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设置了 14 个编练司令部，企图把军队再扩充到 350 万到 500 万人。同时，大力加强对华南、西南、台湾等地的控制，准备作为战略退路，必要时“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梦想熬到世界大战爆发，待机反攻。人民解放军经过整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458 页。

编，总兵力达 400 万人，其中正规军 4 个野战军 16 个兵团 51 个军 215.4 万人。第一野战军 2 个兵团 6 个军 15.5 万人，位于陕甘宁地区；第二野战军 3 个兵团 9 个军 28 万人，第三野战军 4 个兵团 15 个军 58.1 万人，位于长江北岸的宿松至南通一线；第四野战军 4 个兵团 12 个军 90 万人，除已抽出 2 个军组成先遣兵团（12 万人）南下豫鄂地区外，均位于平津地区；军委直属 3 个兵团 9 个军 23.8 万人，围攻太原、大同。另有正在改编的傅作义部 24 万人，驻北京外围；尚待接受和平改编的董其武部 6 万人，驻归绥、包头地区。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和部署情况说明，只要我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集中兵力消灭长江南岸的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等重兵集团，以及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国民党政权就会彻底灭亡。

任何一个大的战略阶段，都是由若干战略步骤和战役进程构成的。总揽全局，掌握关节，精心筹划，全面部署，引导战局一环扣一环地向着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是保证顺利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关键。这也正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大进军的战略指挥上，首先注重把握的问题。

1948 年 12 月，当淮海战役尚在进行时，党中央和军委就开始研究向全国大进军的部署问题，划分了各大野战军的任务和进军步骤。1949 年 1 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分析了总的形势和我军去江南作战的利弊条件，规定当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是：“应

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①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作了充分估计，提出了应付的对策。嗣后，又对进军时机、战略步骤、打击方向、兵力组成、战役顺序、战场选择、后勤保障、争取瓦解敌军的策略、对付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战略大后方的安全保障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问题，进一步通盘谋划和部署，并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其主要轮廓为：第一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同时以一部兵力入川；第二野战军协同三野占领华东南各省后，解放并经营西南云、贵、川、康、藏5省（原定二野、三野共同经营华东南地区，后作了调整）；第三野战军解放并经营苏、浙、皖、闽4省；第四野战军待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就绪后，南下解放并经营华中、华南的豫、鄂、湘、赣、粤、桂6省；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解放太原、大同后，以两个兵团去西北协同一野作战，一个兵团留守华北。战略步骤的实施，大体是按照先取华东，次取华中、西北，再取华南、西南的顺序进行的。

第一步，首战华东，围歼汤恩伯集团（4月至6月）。

首战华东的原因在于：一是位于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反共反人民的死硬派，我军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9页。

主要打击对象；二是该集团兵力最多，是防守华东的主力，消灭了它，华东各省我垂手可得；三是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能起到极大震撼、瓦解敌人营垒，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四是华东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被我军控制后，可以防止敌军从海上逃跑，也可以有力打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增援或入侵；五是敌人江防弱点十分明显，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的上海地区，南京上下游兵力空虚，便于我军突破；六是防守武汉的白崇禧集团正派人与我“挂钩”，是战是和，尚待观察。从4月21日我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跨江而进起，至5月27日解放上海止，敌汤恩伯集团基本就歼。此后，三野则长趋直入，向浙江、福建进军，并解放了山东的孤立据点青岛；二野布于浙赣线上，作战略预备队。军委3个直属兵团于4月下旬一举攻克太原，和平解放大同，已可抽出2/3的兵力去西北参战。一野进行了陕中战役，解放西安，并和平解放榆林。四野先遣兵团趁白崇禧集团南撤之际，渡江解放了武汉三镇；位于平津地区的四野主力也陆续南下，完成了在武汉、宜昌地区渡江的准备工作。

5月下旬，军委鉴于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对我进行军事干涉的危险，指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

陆军，向我后方袭击和扰乱。”^①具体部署为：以二野全部位于现地整训，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同时，钳制华中的白崇禧集团，准备以一部兵力适时渡赣江配合四野作战，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消失后，再向西南进军。三野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2个军；以3个军布于南京、镇江、苏州地区，7个军布于上海，3个军布于浙江；另以1个军开往青岛，夺取并守卫该地（后由山东军区部队担任）。四野留1个军位于河南，准备必要时增援华北。军委直属第二十兵团及四野炮兵纵队，调往秦皇岛、塘沽海口布防；第十九兵团协同一野歼灭胡宗南及“两马”主力后，留在宝鸡、凤翔地区，作机动力量。有了上述部署和准备，帝国主义不论从南方或北方进行军事干涉，我军均可应付裕如，不致陷于被动失措的境地。

第二步，夺取华中和华南一部地区，解放西北，重点围歼和打击白崇禧、余汉谋、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5个集团（7月至10月）。

在中南方向：5月下旬，四野主力部队陆续到达襄阳、樊城、孝感、浠水一线，准备略加休整后，按军委要求渡江南进，围歼白崇禧、宋希濂两集团于鄂境和湘粤桂边境，而后向两广推进。为配合四野作战，军委决定将二野之第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6月2日，军委指示：四野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后，即分两路或三路同时动作，齐

^① 参见军委1949年5月28日电。

头并进，务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象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①9月间，军委判断白崇禧集团极大可能不在湖南而在广西境内与我作战，以及我军及早占领广州，打通粤汉铁路，“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要求四野先以陈赓第四兵团、邓华第十五兵团与两广纵队等武装配合，南取广东，而后消灭缩至广西的白崇禧集团。从7月上旬至10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兵分东、西、中3路，连续发起宜沙、湘赣、赣西南、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了江西、广东全省（海南岛除外）和湖北、湖南大部，并争取了程潜、陈明仁部于长沙起义。因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力避与我决战，逃脱迅速，致使四野未能实现在湘境和鄂境围歼该两集团主力的战役企图。

在西北方向：7月初，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归一野指挥。一野兵力由原来的15万余人增至34万余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33万多兵力旗鼓相当，但质量上占优势。军委对西北方向的歼敌部署是：力争先后于宝鸡、扶风、郿县地区歼灭胡宗南兵力之半（5至6个军），但暂不占领汉中；于乾县、永寿、郿县地区或泾县、凉州地区，歼灭“两马”主力。尔后兵分两路，一路西取甘、宁、青、新，年底占领甘、凉、肃三州，翌年开春或夏季占领新疆；一路入川占领川北和成都。这一部署要点，也是从全局着眼的。争取在陕中歼灭

^① 参见军委1949年6月2日电。

胡宗南一部而又暂不占领汉中，是因为军委估计，国民党广州政府迁都重庆，当在9月至10月间，我刘邓大军入川当在12月间，“为使伪府放心迁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故我军暂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①而争取歼灭“两马”主力后，年底占领甘、凉、肃三州，继而占领新疆，系为了取得更大石油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②从7月中旬至9月下旬，第一野战军经扶郿、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全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并和平解放新疆。至此，西北5省除陇南、陕南一隅外全部解放，一野遂于10月间开始了向新疆的和平进军。

这一时期，三野猛打穷追逃敌，经福州、漳厦等战役，解放了浙江、福建全省，并攻占了舟山群岛的部分岛屿和闽南东山岛、渤海湾长山列岛等岛屿。绥远董其武部亦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党中央和军委鉴于上海、福州、青岛等地均告解放，帝国主义的舰队夹着尾巴溜掉，对我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遂解除二野的战略预备队任务，令其准备于9月间出动，向西南地区进军。10月间，三野第十兵团的3个多团渡海攻打金门岛失利，遭敌歼灭，令人痛心。军委通报全军：“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

① 参见毛泽东1949年6月27日电。

② 同上。

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在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①

第三步，解放广西、西南，围歼白崇禧、宋希濂、胡宗南 3 个重兵集团（11 月初至 12 月底）。

广东战役结束后，白崇禧集团的 15 万余人，会合逃往广西境内的余汉谋残部 5 万余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确保左右两江，不支时再向云贵方向逃跑。正如军委 9 月间判断和部署的：“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②“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我军应预作准备，适时切断其退路。^③11 月上旬，军委又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④这样，就布下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天罗地网。广西战役从 11 月 6 日开始，至 12 月

① 参见军委 1949 年 10 月 29 日电。

② 参见军委 1949 年 9 月 8 日电。

③ 参见军委 1949 年 9 月 9 日电。

④ 参见军委 1949 年 11 月 9 日电。

14日结束，敌除两万人逃往越南境内外，余均被歼，广西全境遂告解放。

关于进军大西南的部署，早在5月间，军委即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断其退路不可。”^①解除二野战略预备队的任务后，针对蒋介石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固守“西南防线”，与我“持久作战”的部署，军委又多次指示：二野主力应待广州解放和四野发起广西战役后，实施战略大迂回，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宜宾、泸州、重庆之线，断敌退往云南、西康的道路，再以吸引胡宗南部于秦岭地区的一野一部进军川北，与二野合力围歼胡宗南集团等敌。据此，二野主力与四野一部，从11月1日开始，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发起多路突击。首先重创屏障川东门户的宋希濂集团于鄂西地区，并解放贵阳，拦腰切断敌西南防线；继而占领重庆，争取了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郭汝瑰等部起义；最后在成都地区与一野入川部队合力完成了聚歼胡宗南集团40余万人的任务。至此，我军基本上完成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的解放，剩下的仅是战略扫尾方面的某些战役战斗了。

人民解放军在8个多月的时间内，以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解放16个省，大大超过原定1949年内争取解放9个省的计划，为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8页。

立奠定了基石。其所以如此，首要的因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确、英明而果断，全局在胸，调度有方，着着先机制敌，自始至终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剥夺了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渡江之前，我军就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迫使其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和被动状态中。利用这种有利态势，我军正确区分战略步骤，恰当配置战略打击力量，从大进军的开脚一步起，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先声夺人气势，对准国民党的战略防线和重兵集团，实施连续不断的突破、分割、追击、围歼，决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①我军决水千仞的强大攻势，愈加造成敌军在心理上、行动上的绝望、崩溃状态，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其行动自由权和抵抗力。特别是当我军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时，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所吓倒，而是一面做好应变的部署和准备；一面加速进军步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这不仅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出兵干涉，也使国民党靠美国武力援助或世界大战爆发来救命的梦想完全破灭。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人民的力量才是伟大的。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实施战略指挥的又一个关键问题。“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

① 《孙子兵法》军争篇。

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①我军的战略追击，虽然是根本区别于战略防御的战略进攻的继续，但与战略决战阶段比较，也有其明显特点。这就是我军以绝对优势和主动的地位，实施全面大进军、大追击；而敌军则以绝对劣势和被动地位，实行全线大退却、大溃逃。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略追击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作战原则，指导我军歼敌制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

第一，集中优势兵力，首歼敌人重兵集团。经过战略决战，敌精锐兵团大部被歼，所剩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宋希濂、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集团，士气不振，战斗力大为削弱，又分布在广阔领域内，已难形成有效战略防御体系。我打掉敌人一个重兵集团，敌就会失去一个战略支撑点，防御大厦顷刻坍塌一大片，根本无力修补。而且，我四大野战军在每个作战方向上，均能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具有歼敌重兵集团的强大战斗力。这与解放战争初期或中期那种先打孤立和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解决敌人的重兵集团，仍然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但集中兵力的程度，则视敌情、我力的变化而定，不必拘泥于每战以3倍或4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兵力临敌。因为这时敌人已经是溃败之师，士无斗志；而我军受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57页。

供给、兵源、分布留守等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拿出那么众多的兵力来。渡江战役是关系大进军战略全局的关键一役，围歼敌汤恩伯集团 45 万人。我集中二野、三野两支大军，仅形成 1 倍于敌的相对优势兵力，就突破长江防线，机动于苏南、皖南、浙北、赣东地区，打破汤恩伯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防御战线的企图，“瓮中捉鳖”，使汤集团基本就歼。在西北方向，一野加上第十八、十九兵团的兵力，合共 34 万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相等。由于采取了“箝马打胡”、“箝胡打马”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因而取得了全歼“两马”、重创胡敌、和平解放新疆的重大胜利。二野进军大西南，与协同作战的四野、一野各一部，总兵力不过 50 万人左右，但却取得了歼灭包括胡宗南、宋希濂两个重兵集团在内的 90 余万敌军的辉煌战绩。由此可见，在战略追击阶段，我军集中一定优势兵力先打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只要兵力使用得当，战术灵活机动，便能收避害趋利、事半功倍之效，大大加速战争的进程。

第二，先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后取广大乡村。国民党兵力有限，只能以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为基点布防，已无法顾及广大乡村；当我军打击来临时，则靠退守城市苟延残喘，靠铁路、公路、水路增援或逃命。我军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速战速决，就必须全力摧毁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战略战役防线，夺取这些城市，控制交通要道，使敌人无穴可钻，无路可遁。同时，我军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

要道，也更利于增强物资供应力和作战机动力，进一步加速歼敌的进程。“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①这与以往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尔后夺取大城市的情形，也是不同的。渡江战役中，我军兵分三路进击合围，以消灭汤集团和占领南京、上海为主要目标。第一作战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以控制江阴炮台，封锁江面，并切断宁沪铁路。第二作战阶段长驱直入，切断沪杭铁路、宁杭公路和浙赣大动脉，合围南逃之敌，占领杭州。第三作战阶段解放上海，并相继占领武汉、南昌。渡江之前，军委即电示四野组成先遣兵团南下，要求“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逼近汉口，休整待命，箝制白崇禧部，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②攻占上海前，军委又电示三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从海上大批逃走”，如上海有和平解放可能，力争和平解放，“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③渡江战役结束后，三野进军福建，径取福州、厦门，控制了从上海至福建的重要海口；四野进军中南、华南，直下长沙、衡阳、广州、桂林、柳州、南宁，打通并控制粤汉铁路；一野进军西北，相继占领西安、兰州，打通并控制西兰铁路；二野进军西南，先取重庆，抢占并封锁长江上游，继取成都；等等，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65页。

② 参见军委1949年2月12日电。

③ 参见军委1949年5月6日电。

无不都是在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同时，注重大城市和交通命脉的夺取，然后再腾出手来，收拾溃散在乡野僻地的残敌、土匪。贯彻这一作战原则，主要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迅猛强大的军事压力，或迫敌来不及破坏城市设施便弃城而逃，在追击合围中予以歼灭；或争取城市敌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只有在非攻坚城池不可的情况下，才以攻坚手段夺取之（如上海、太原、兰州）。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有利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

第三，以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形式兜住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敌人的防御体系支离破碎，后方空虚，薄弱环节甚多；各防御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只图自保；慑于我军强大声威，力避与我决战，以西南诸省和海南岛、台湾等地作战略退路，见机不妙即大踏步地后撤和逃跑。这些情况，决定了乍到敌占区作战的我军，在贯彻以歼灭战为核心的作战指导思想时，必须敢于打破常规，实行远距离的无后方的运动作战，用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的形式，歼敌制胜。渡江战役中，二野、三野总前委针对敌江防被突破后的混乱态势，机断决定放弃由两个野战军主力交叉运动进击南京地区的原定作战方案，改为以三野主力追歼南京逃敌，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猛插猛进，千里迂回，直下浙赣路的贵溪、横峰、上饶、衢县、金华、义乌一线，断敌退路，拊敌侧背，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防御集团的联系，从而扩大了战役范围，不仅为围歼汤集团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也迫使白集团不战

而撤，放弃武汉三镇，向后龟缩。这是一个创举，提供了战略战役大迂回的新鲜经验。因此，军委要求四野渡江后，亦应象二野一鼓作气打到浙赣线那样，各路“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①使白崇禧各部处于猝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的境地。此后军委根据白崇禧集团极力避战的特点，进一步指出：和白部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②“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③这样，敌人缓撤也好，速撤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均难逃脱被我军包围歼灭的命运。在这一作战原则指导下，我军车步并举，大胆分路穿插，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克服后勤供应不足和气候不适的困难，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广西白崇禧集团、四川宋希濂和胡宗南两集团，实施战略纵深大分割、大迂回、大包围，仅3个月的时间，即分别予以兜歼。这就使蒋介石集团退守西南、待机反攻的美梦彻底破灭。有作战经验的人都知道，敌我双方交战，最忌对方两翼迂回，拊己侧背，兜抄后路，大兵团作战更是如此。尤其象我军这种靠两条腿实行千里以上大迂回的战法，国民党将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因而一旦出现，也最容易获

① 参见军委1949年6月2日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9—340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2页。

得出敌不意、乱敌军心、一举歼敌的极大效果。

第四，在高度统一集中指挥下，实施各大野战军的战略战役协同。向全国大进军，我四大野战军全面出动，战线广阔深远，情势复杂多变，而且必须在短时间内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这就要求全军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和军委的集中统一指挥，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部署、作战方针和军事政策，密切协同配合。事实证明，各大野战军和各兵团在这方面是自觉的，坚决的，没有发生过干扰、影响党中央和军委既定战略部署、方针的现象，并积极发挥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机断性。这是保证战略追击迅速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战略大进军，实行全国规模的、跨战区的各大野战军之间的协同作战，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党中央和军委除明确划分各野战军的解放经营地区，协调各野战军的进军步骤、战役顺序外，为加强前线协同作战的指挥，还及时组织或调整战区领导机构和兵力组成。例如，由二野、三野领导组成的总前委，负责指挥该两部兵力及四野先遣兵团渡江南进；四野主力渡江前，由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华中局，负责领导中南区的党政军工作，并将二野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两广战役前，成立华南分局（隶属于中南局），统一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协调野战军部队、地方游击武装之间的关系，组织指挥了广东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在太原前线，由军委3个直属兵团的领导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部队作战，战后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往西

北，划归一野指挥；进军大西南，由二野领导和率第十八兵团入川的一野领导组成西南局，统一西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一野第十八兵团和四野第五十军、四十七军、四十二军暂归二野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宗旨一致，目标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具有积极协同作战的强固政治基础。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我军在战略大进军的一系列战役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这个优势，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五，保持强大军事压力，充分发挥政策威力，争取大规模瓦解敌军。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过去在敌优我劣的情势下，争取敌军整师整军的起义、投诚并不多见；整个集团军的起义、投诚，则从来没有过。解放战争中，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变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条件变化了，敌整师整军甚至整集团叛敌归我的现象，才逐渐增多起来。我军渡江前，毛泽东针对敌仅剩下 100 多万军队的状况预计：“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①并且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按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和平解决敌人的可能性增加了。战略追击开始后，为加速战争进程，减少部队伤亡，避免大城市遭受破坏，我军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原则，一面不断加强军事压力，坚决消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1362 页。

灭敢于顽抗之敌；一面利用敌人营垒的慌乱心理和各派系之间的矛盾，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政治攻势，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大力瓦解敌军。例如，当四野主力渡江南进时，军委认为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部有起义可能，如该部起义，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有极大政治作用。特电告四野：“现今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①在四野派人与程潜、陈明仁谈判过程中，军委又指示：该部起义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②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很快推动谈判成功，使长沙等地获得和平解放，有力震撼了国民党营垒。西南地区我军争取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两部起义，打破国民党残部退守边远地区的企图，也是一个重大成功。这一阶段，我军用和平方式先后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全省及四川西部等大片区域，加上其它城市起义、投诚的人数，共达102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1/3。事实证明，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大量争取敌军起义、投诚，进行和平改编，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

① 参见军委1949年6月2日电。

② 参见军委1949年7月18日电。

第六，形成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大兵团远距离进军作战的需要。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更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①我军过去的后勤保障，是以各大战区为单位自行组织、自行解决的，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指挥，已不完全适应战略追击阶段的需要。战略大进军，出动兵力众多，占400万人民解放军的90%以上，需要的粮食和作战物资的数量之巨，是空前的；要求部队猛打猛进，神速运动，实施远距离的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迅速包围和歼灭敌人；行军作战区域是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又面临极为复杂的地形条件，包括南方的崇山峻岭、水网交错地带，西北的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地带，以及隔海峙立的若干沿海岛屿等。这就大大增加了后勤保障的艰巨性、急迫性、复杂性。只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积极发挥各战区的能动性，真正形成强大的前后方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系，才能确保大进军战略任务的完成。为此，军委决定，将后勤工作由各战区独立自主、分散经营的方针，转变为全军统一领导、分区负责的方针。在统一集中方面，属于全军的后勤工作，由军委后勤部统一组织，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领导；划一全军供给标准；健全和充实全军后勤系统的编制，各野战军统一编设后勤分部、兵站、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0页。

院、辎重部队、汽车部队等专业部队；战略后方的军火生产和供应前线的重要物资，由军委后勤部统一安排和调拨；经军委后勤部申请，中央财经委员会拨出银元 2355 万元，供各野战军在新区使用等。在分区负责方面，由各大战略区和野战军组成各自兵站运输线；自筹大部粮食、被装、医药和作战物资；动员和组织民工、民兵支前；自行组织战勤支援和随军保障等。例如，在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四野从京津地区南下和进军中南，以华北、华中地区作依托，采用前方以汽车为主、后方以火车为主的运输方式，建立了北起京津、南至长沙的补给运输线；二野进军大西南，以华东地区为依托，建立了自南京、上海经武汉至岳阳、宜昌，以及经樟树、南昌至长沙、衡阳的兵站运输线。党政军民齐动员，前方后方同努力，战胜敌机的轰炸和土匪的袭扰、破坏，保证了这些运输线的畅通。在我军后勤机械化程度很低，各种保障手段相当简陋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后勤保障的最大优势。渡江战役中，地方党组织与部队配合，共动用民工 300 余万人，运送粮食数亿斤，筹集各型木船近万只，参战船工亦达万余名；山东、苏北还建立了 16 个民工团，随军服务，有力保障了渡江战役的作战需要。海南岛战役是一次大规模的渡海进攻战役，毛泽东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渡海部队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筹集了充足的粮食、船只和作战物资，弄清了海情、敌情，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大力配合下，一举摧毁敌人的现代化立体防御，渡海成功。战争伟力的深厚根源在民众

之中，我军后勤保障的前后方一体化，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踊跃参战、支前分不开的。

上述作战指导原则，在我军战略大进军的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新的战略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作战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战略指挥是把握战争全局的高难度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攸关战局胜负的核心问题所在。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针对战略全局的指挥而言。毛泽东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掉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①大量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面大进军阶段的战略指挥，无疑是娴熟驾驭战争全局，照顾好“最吃力的地方”的一个典范。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来就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的。它不仅是一支消灭敌人武装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一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改造社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60页。

会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阶段，全党面临着从夺取政权向巩固政权的过渡，从长年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过渡，从以乡村工作为重心向以城市工作为重心的过渡，要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要把各阶层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任务是极其复杂艰巨的。既肩负起战斗队的任务，又肩负起工作队的任务，是党中央和军委赋予我军的光荣历史使命。

1949年2月，毛泽东鉴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今后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接收和管理大城市及经营广大新区的重要性、艰巨性，将不亚于作战任务，因而在《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善于在城市中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付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动员和组织青年，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管理工业和商业，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①3月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又进一步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只要国内还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这支军队就仍是一个战斗队。人民解放军又是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44页。

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准备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开展了。”^①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是党中央和军委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实保证。

向全国大进军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的胜利发展，战役战斗的逐步减少，接管和经营新区便成为我军的主要任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打击敌人、团结群众、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有力武器。树立全盘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军胜利完成工作队任务的关键一环。不论在渡江之前的准备工作中，或是在战略追击阶段的工作进程中，政策教育始终是部队各级领导注重抓紧的主要课题。

这一时期，我军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项，接收和管理城市

从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至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为止，江南和西北的100多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福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桂林、贵阳、成都、昆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64页。

明、西安、兰州、银川以及山西的太原、山东的青岛等国民党长期盘踞的政治经济中心，均落入人民手中。接收和管理这些城市，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对于重要城市，我军入城后一律采取军事管制的形式，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中国人解放军布告》中宣告的约法八章^①行事。约法八章是党的城市和新区基本政策的一个缩影，简明易懂，威力甚大。事实证明，只要广为宣传，付诸实施，便能很快起到安定秩序、稳定人心的作用。属于原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各系统、各部门及官僚资本，一律由军管会派人接收和管理。大区、省、市政权机构的建立，采取先成立军政委员会或委任临时政府的办法，逐步向正式机构过渡。1949年8月，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市委、市临时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效果很好。毛泽东认为代表会议对于加强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发动群众协助政府克服困难，进行各项建设工作有重要作用，应予推广。并且指出：“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②接着，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请各地报告城市和农村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中央关于各地召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94—1396页。

② 见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等文电，推动了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普遍召开。在此基础上，全国于1950年就建立了华北、东北两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29个省及2100多个市、县的人民政府，使全国的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在镇压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人民的和平建设，支援大进军的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军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突出困难是金融和物价问题。一方面，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付烂摊子；另一方面，战争尚在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加上天灾匪祸等原因，使我们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赤字严重。资产阶级和社会投机势力乘机捣乱，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破坏民生，严重威胁经济的运转和人心的安定。上海市闹得最厉害，不法资本家要在经济上同共产党较量。6月间，该市军管会派出部队和公安人员，一举包抄了搞金银外币投机活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一批扰乱金融市场的主要投机倒把分子，给破坏人民经济生活的资产阶级势力以沉重打击。为稳定市场物价，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军与地方党组织相配合，从各地调运大批粮食、物资，于11月间在各大城市统一投放市场，按国营牌价出售，使物价下降率迅即达到30%以上，投机行业纷纷破产。从1949年6月到1950年4月，由于各大城市的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密切配合，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有关财政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因而有力打击了资本主义投机势力，平息了三次大的物价上涨风波，制止了

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人民生活趋于安定的好局面。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我军从接管城市起，就注意面向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保证其它一切工作均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国营工业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是各地军管会的工作重点所在；同时，注意发挥私营工商企业的积极作用。至1949年底，我们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已占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的40.3%，控制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棉纱、交通运输业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奠定了国营经济的主体领导地位。为保障战争的需要和经济的交流，我军的工程兵和新建立的铁道兵部队，在各地军管会、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抢修铁路、桥梁，保证了全国交通大动脉的畅通。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各地军管会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到工矿企业担任领导职务或军代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排解各种矛盾、纠纷（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工厂开工问题、工人失业问题、工人工资问题、劳资之间的关系问题、煤荒问题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学会领导生产，掌握生产。这样，我们就迈出了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的第一步。那时从军队输送到工矿企业和其它部门的许多干部，后来大都成为经济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保证。我军渡江之前，曾普遍而深入地进行过加强纪律性和城市政策的教育，因

而入城之后，各部队均能严格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行事，在群众中树立了纪律严明之师的光辉形象，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这是我军能够在城市中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也有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如有的部队擅自派兵进入外国使馆人员的住宅；有的擅自命令地方电影院、戏院、澡堂免费向部队开放；有的蛮横无理，违反铁路规章，乘坐火车；有的不经请示报告，随意处理军管物资；等等。这些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影响很坏。发现后，各部队均作了严肃处理，教育各级干部引以为戒，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第二项，改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及被俘人员

大进军阶段，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的数量猛增。在1年多的时间里，起义、投诚达102万余人，其中成建制的有8个兵团部、28个军部、7个军另130个师；俘虏113万余人，合计共215万余人。尤其在西南地区，数量最大，情况最复杂，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达90万人，其中有地方实力派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某些头面人物乘混乱网罗新扩编的部队，以及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等。对于这些人员进行改编、溶化、安置、处理，工作量大，政策性强，时间紧迫，弄得不好，就会造成破坏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我各大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包下来”的方针及有关政策，对起义、投诚、被俘人员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改造和处理。第一，对起义有功的高级将领，由党中央和中

央人民政府决定，安排适当职务。第二，属于成建制起义、投诚的部队，原则上一律调离海边防及重要城市，指定驻地，进行改编。改编时我军派军事代表团或工作队参加，宣布政策，调整组织，举办军官集训，在士兵中开展诉苦教育运动，务求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的全面改造。尔后，一部分成建制地编入我军（如陈明仁部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陶峙岳部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董其武部改编为第二十三兵团，张轸部改编为第五十一军等），或与我建制部队合编，大部分分散补入我建制部队溶化。第三，军官经教育改造后，按不同人员分别处理。凡起义有功人员，可在部队留用或去地方安排适当职务；青年知识分子类型的下级军官，有培养前途者，部队继续留用，或送专门学校深造；确有军事学识或专业技术（如各军兵种、通讯、医务人员等）为我军必需者，只要政治上愿意向人民靠拢，分配到军事院校或有关部队，从事教育工作、专业技术工作；要求回乡的一般军官及老弱残疾人员，原则上遣返回乡，由地方给予生活出路；作恶多端而又无立功赎罪表现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有些送司法公安机关处理，有些交地方由群众监督改造。第四，对于被俘士兵，一部溶入我军；一部遣送回乡，从事生产劳动。

改编国民党部队，特别是改造中上层军官，是一场严重斗争。必须坚持孤立和打击少数、争取和改造多数的原则，稳妥慎重，逐步处理，既不能和平麻痹，掉以轻心，又不能操之过急，蛮干胡来。对于有些反动军官阴谋组织

叛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应采取果断手段，及时予以揭露和粉碎；叛变发生后，则应坚决、迅速、彻底消灭之，否则就要吃亏。例如，程潜、陈明仁于长沙率部起义后，白崇禧趁起义部队情绪未稳之机策反成功，致使4万人叛变南逃；我军一部在追击中轻敌麻痹，遭敌伏击，损失800余人。傅作义部在改编中有1.7万人逃往绥远，给争取董其武部早日接受改编增加了阻力。原云南暂十三军1个团叛变，杀我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余人。贵州起义部队的叛变人数达2/5以上，与当地土匪合流，形成严重匪患。四川原十六兵团1个师叛变，经10天战斗方被我消灭。这些血的教训，说明和平改编并非完全和平。毛泽东说：“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①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项，剿灭土匪

我军进行战略大追击的过程中，以首先占领城市和控制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不可能完全顾及广大乡村。大批国民党残兵败将，乘机转入乡野山林，垂死挣扎。他们与地主武装、会道门组织、土匪队伍合流，象滚雪球似地发展起来，建立基地，组织暴动，武装游击，烧杀抢掠，妄图待机配合国民党残存兵力卷土重来。例如，仅贵州省就

^①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364页。

有 21 个边陲县城被土匪队伍控制，公然建立“政府”，发行匪币，与台湾国民党建立电讯联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举行反攻；大别山区的 14 个县，亦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溃散在青海地区的马步芳部反动军官，网罗散兵游勇，在大通、门源、湟中等 10 余县内组织暴动，企图消灭我驻守青海的部队；1950 年的头 1 个月内，华东的土匪袭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 100 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 120 名干部惨遭杀害。当时，我们的征粮任务极重。部队要吃饭，城市人民要吃饭，粮食来源只能是农村。但是，由于土匪活动猖獗，威胁农民抗拒征粮，大肆抢劫、焚烧公粮公盐，不断破坏铁路公路，致使我征粮任务的完成受很大影响，也严重障碍了城乡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至 1950 年初，全国土匪武装已发展到 150 万人，并有继续蜂起蔓延的趋势。其中华东地区 5.9 万余人，中南地区 28.8 万余人，西南地区 65.5 万余人，西北地区 4.2 万余人。不彻底消灭土匪，便无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社会的安宁。

从 1949 年下半年起，我军按照党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抽调了 41 个军部 140 个师共 150 余万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剿匪过程中，各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制定剿匪方案，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清霸镇反，深

人发动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地区情况不同，进度也不一样，但一般均经过以下步骤：第一步，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所谓重点，即土匪势众，为患极烈，严重威胁我交通命脉、腹地安全和粮食来源的地区。我首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以各大区为单位统一指挥，全力施剿。对某些小股土匪聚集的偏远贫瘠地区，留待以后解决，以免分散兵力。第二步，点面结合，分区驻剿。重点地区的大股土匪被消灭后，我军即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按部队驻地划分清剿区域，加强面上的控制，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进剿偏远山林地区的小股匪徒。由于土匪边剿边起，不断零星发展，且大都聚散无常，利用险恶地势与我周旋，因而这一阶段需反复进剿，象梳头一样，梳了又梳。进剿中利用大股土匪被消灭和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有利形势，加强政治攻势，瓦解土匪队伍。对省与省、县与县之间的接合部地区，相关的部队组成剿匪指挥部，统一行动，密切配合，以免使土匪漏网。第三步，结合减租、土改、镇反等斗争，深挖潜匿的匪首和骨干。在战略追击阶段中，我军主要是完成了第一步的任务，集中兵力进剿匪患严重的浙江、福建、苏南、皖北地区，鄂豫皖边、湘赣边、粤桂边、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的腹心地区，陕甘宁边、青海、宁夏地区。共消灭和瓦解土匪近百万人，使大股土匪基本就歼。同时部队还结合剿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乡村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二步、第三步的剿匪任务，直至1953年底才告完成。我军先后共消灭土匪260余万人，创造了在

中国大地上使土匪消失的历史奇迹。

第四项，向新疆和平进军

1949年9月，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我党积极争取下，宣布接受八项和平条件，通电起义。10月，我第一野战军一部（一兵团部及二军全部、六军两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开始向新疆进军，至1950年3月，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向我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地区和平进军，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向新疆进军，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多变，要穿过大片大片的戈壁荒原和沙漠瀚海，后勤物质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党中央与苏联联系，双方商定由苏联民航局派出30架伊尔运输机（后派出40架），帮助我们空运部分军队和物资进疆。中央军委又从华东军区抽调400余辆汽车，从华北军区抽调100余辆汽车，担任支援部队进疆及转运物资的任务。一兵团及二、六军的后勤部门自筹部分汽车，加上部队的原有车辆，进疆的汽车达700余辆。在河西走廊及各地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疆部队共筹集骡马、骆驼4400余匹，棉衣、皮衣、皮帽、帐篷和其它军用物资28.1万余件，粮食3.3万吨，基本上能够保证进疆部队的需要。进军过程中，经苏联民航运输机运送部队近2万人（从酒泉至哈密4000余人，从哈密至迪化1.5万余人），军用物资12.7万公斤，对我军争取时间进疆起了重要支援作用。车运、步行极为艰难困苦，是人与大自然的拼力搏斗。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戈壁、沙漠、迷路、暴风雪、

缺水少粮、腿脚浮肿、敌人破坏、伤病号增加等各种困难，行程最长达4000余公里，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接管了南疆、北疆、东疆的防务。

新疆的主要民族是维吾尔族，当时人口约300余万。他们拥有一支1.4万人的民族军，“在过去的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①党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及其他各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②据此，部队于入疆之前，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团结维吾尔民族军的教育；入疆之后，严格执行“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维吾尔民族军一道，紧紧依靠当地的各民族人民，及时平息了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少数反革命分子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发动的叛乱，团结教育了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稳定了新疆局势，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从此，新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人民当家作主和积极从事和平建设的新天地。

人民解放军执行工作队的战略任务，对国家、对人

① 中共中央1949年10月23日电。

② 同上。

民、对军队的自身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在革命大发展而地方工作力量奇缺的情势下，军队派出大量人员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确实起到了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干部，稳定全国局势，巩固革命成果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军队在直接面向社会、深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也接触大量新事物，处理许多新问题，从而不断提高着自身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力改善着部队的素质。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既能担负战斗队的任务，又能担负工作队的任务，正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之一。

全国解放战争后期的伟大战略进军，以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我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正确进行战略决策、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我军广大指战员连续作战、不怕牺牲、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节衣缩食、大力支援的结果。战略大进军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接管南京前后

宋任穷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我奉命进入南京，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同年9月，我又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现就我参加南京接管工作的情况作一回忆。

南京解放，军管会宣告成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我军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提出愿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我军虽然有足够的力量和充分的把握在不长的时间里全部消灭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但为了争取一切可能尽早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表示愿意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从4月1日起，国共两党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共同拟定了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当时，中央指示，如“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但着重强调“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一举渡江成功。”4月20日，

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充分暴露了他们阻挠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动立场，也充分表明，他们当初提出和谈建议，只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妄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翌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号召，我各野战军奉命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即1949年的4月，我奉命协助刘伯承同志接管南京。在进南京前，我们为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我们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入城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在学习中，强调了要防止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了使解放区干部了解南京的情况，我和张霖之、彭涛同志组织一些从南京来的地下党员编写一套介绍南京概况的资料。这些同志积极性很高，多方收集材料，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印出了介绍南京的土地、人口、风俗习惯，国民党的政

治、经济、文化机构，党派、社团、公共事业、工矿企业、手工业以及军、警、宪、特组织等情况的材料，供南下的同志们参考。

4月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摧毁了敌人认为难以逾越的长江天险。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由下关经挹江门开入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贺电说：“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解放全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4月25日至28日，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和我先后到达南京。

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如下布告：

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电令：“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并任命刘伯承为该会主任，宋任穷为该会副主任。”本会遵即于4月28日宣告成

立，本主任并于同日到职视事，奉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城市政策，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实施军事管制，特此布告周知。

此 布

主 任 刘伯承

副主任 宋任穷

军管会委员共 18 人，除刘伯承和我，还有张际春、李达、陈士榘、陈修良、江渭清、柯庆施、张霖之、周兴、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黄华、陈同生、罗士高、孔从周、刘宠光。

与地下党会师

南京地下党为迎接南京解放，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保护人民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和保证我军顺利渡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战火逼近南京时，地下党积极组织人民自卫队护厂、护校，英勇机智地防止和抵抗敌人撤退前的破坏，同时在各阶层群众中间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地下党还打入敌军警宪内部进行瓦解工作。由于地下党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军入宁后，水、电、通讯一日未停，学校始终未辍课，火车和市内公共交通很快恢复。

南下干部同地下党会师后，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乃是今后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是第一关键之工作。5月1日，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会师大会，来

自9个不同解放区的干部和地下党的同志共3000余人参加了大会。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都讲了话。邓、陈、刘3位都没有讲话稿，只有饶漱石1人照稿宣读。他们都强调要互相学习，以对方的成绩来勉励自己，各自克服缺点。会议提出不仅要实现组织上的会师，还要真正做到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会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下苦功夫，花大力气，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洋溢着团结、热烈、欢乐的气氛。

在会师大会上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榘、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远16人组成。刘伯承（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宋任穷（市委副书记）、张际春（宣传部长）、陈修良（组织部长）、陈士榘（南京警备区司令）5人为常委。此时，华东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皖北、皖南、赣东北3个区党委和芜湖市委的工作。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解放军南下干部同以胡明为首的地下党在皖南的会师是最成功的。

南下的同志和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和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过一些不够协调的现象。南京市委常委会对此作了认真研究，并于5月7日为纠正这些不协调现象作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南下同志与地下党同志共同努力，真正做到从组织、政策和思想三方面会师。5月23日，南京市委就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

毛主席看到此份报告后于当天电告华中局、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它工作中，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的关系有较大改善。

一个月完成接收工作

三十五军入城后，即将全部物资严密看管起来。会师大会之前，我们即对重要部门进行接收，会师大会以后，接收工作全面展开。在市军管会统一领导下，大致分为军事、行政、财经、交通、文教等几个接管委员会及公安部、警备司令部、外侨事务处等部门，分头进行。华东局专门派曾山同志来宁协助和指导南京的接管工作。

南京市委在总结初期接收工作的基础上，于5月7日发出《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明确作出4项指示：一、接管原则是行政方式的，但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接管方式是自上而下，但必须结合群众，联系群众。二、建立军管、党委统一领导的组织系统。军管会各接管部门的党委、党组（由军事代表、工作组组长与支部书记3人组成）到党的支部，统一贯彻接管的原则和政策，及时总结经验，互通情报，互相学习，统一步调，并有系统地向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以求得全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步骤上的一致。三、为加强党的领导，原地下党应做到大部公开，一般的做到公开70%。四、向全

党说明，接是短期的，管是长期的。先要接好，接着要管好。为搞好接管工作，要加紧学习有关政策，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风，以此为团结的基础。党员应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要发现人才，勿使物资流散和损失，以奠定生产、建设的基础，防止犯偏“左”和偏右的错误。

在接收工作中，时有敌对分子进行抵制和破坏。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军管会于6月初发出布告，宣布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为非法的反动组织，中统、军统及其所属组织为法西斯特务组织，一律予以解散，其所有公产、档案一律没收，并警告一切反动组织之一切人员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军管会将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之政策，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定严惩不贷。布告震慑了敌人，分化瓦解了反动阵营，挽救了一批愿意悔罪、走自新道路分子。同时，对于执迷不悟、怙恶不悛的反动分子抵制和破坏接收工作的罪恶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和打击，保证了接收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南京的人民群众多年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之苦，初获解放，热情很高，积极协助我们搞接收，同破坏分子进行斗争。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经各方共同努力，接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只用1个月的时间，全市原属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市系统的1000多个单位的接收工作便大体完成了。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南京未遭受过多的破坏与损失，为新南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我们的工作便由接的阶段转向管的阶段，即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把南京管好，全力恢复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把消费城市建设成为属于人民的生产城市，这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

南京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城市。这里拥有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遍布的衙门和公馆在全市房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横行无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城市，其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120万人口中产业工人只有2万人左右。我们接收下来为数不多的近代化企业，由于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员太多，无不亏损。私营企业800余家，除永利铔厂等几家外，其余均规模不大，且设备简陋，基础也相当薄弱，手工业生产更是破敝不堪。同时，我们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内外交流和城乡交流均受到极大限制，以致物价不时引起波动，大大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来要困难得多。我们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封锁与反封锁、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中进行的，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任务。

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有一点我们很明确：恢

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伯承同志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恳切谈心，并讲解党的路线、政策，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伯承同志5月9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这就是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

南京解放之初，只有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最为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物价、复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才能稳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也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联系广大群众。当时金元券不断贬值，严重影响群众生活，我们决定迅速排除金元券，发行人民币。5月2日公布了人民币和金元券的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几天时间，即完成了排除金元券的工作。同时，为防止银元买卖波动物价，加强了对银元市场的管理，允许银元持有者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但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物价虽然有波动，但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南京的物价还略低于镇江和芜湖。大批失业失学人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体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

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建设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工资问题，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的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的工资标准。在新标准未确定之前，5月4日和17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月按新工资发给，稳定了广大职工的情绪。初步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

伯承同志在一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提出要照顾到矛盾的8个方面。他讲：“公私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公，又要顾私；劳资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资方有利可图；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农村则供给城市的生活必需品；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既有对内的贸易，又要有对外的贸易。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伯承同志的论述，受到各界赞赏，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合理地兼顾城市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工人过高或过低的工资，适当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

发展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同时，大力增强农村工作的力量，占领农村阵地，努力促进城乡交流，打破封建势力的封锁。解放初期上海曾一度缺粮、缺煤，为了使这座大城市不断粮、断煤，我们努力向上海提供一部分粮、煤，满足上海的需要。自己不够，再设法从山东、芜湖、淮南等地调进。

伯承同志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他在一次报告中以安泰脱离大地母亲被人悬在空中扼死的神话，教育大家要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当他发现个别入城部队与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后，即于5月相继发出市军管会军字第一、二号布告，严令禁止上述行为，宣布除对违反者依法惩处外，给各部主管负责人以应得处分。伯承同志还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等现象，号召大家同这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积极进行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

在解放前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报刊、电台等各种宣传工具以至学校的教科书，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向学生和群众灌输反动思想，散布各种毒素。因此，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宣传余毒，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

艰巨任务，也是顺利进行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保证。

伯承同志和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6月下旬，伯承同志亲自宴请路经南京赴北京开会的沪杭宁文艺界代表团，并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生产建设也要靠文化界在文化建设上与之协同动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向反动文化作斗争，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

进城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为数不少的报纸（包括小报）起的作用很坏。为此，我们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并呈缴各该报纸解放前一年之合订本一份，解放后每日三份；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我们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了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同志主持报社工作。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伯承同志对报纸特别重视。他眼睛不好，指定我负责审阅《新华日报》的大样。每天清晨4时左右大样送到，对新华社发的消息我只看标题标得是否适当，对南京自己撰写的重要消息和文章我都过目，经我审定后才付印。为此，每天要花个把小时的时间。我后来视力不好，

恐怕与这一时期的这项工作有关。

南京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大中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等近百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遵照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宣告：“人民政府本着严格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的政策，对于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和专家的工作，一定帮助其有更大的成就与进步。对于原有教职员，除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以外，则采取团结与教育的方针，帮助其学习，照顾其生活。希望真正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职员、学生来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来推进南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我们废除了学校的反动训导制度，取消了宣扬反动思想毒素的公民课，革除课本中的反动内容，努力把教育机关逐步变成培养有用人才的园地。伯承同志还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同专家学者们诚恳谈心，交换意见。他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专家、学者对南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伯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表示热诚欢迎。伯承同志在南京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讲形势，讲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市委负责同志还向知识界及学校师生做报告，当时把这种听众人数多的报告叫做“上大课”，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政治经济学，讲党的

方针政策。尽管当时工作很忙，做报告的同志仍抽出时间进行认真的准备，报告的效果都很好。我也应邀到中央大学去做过一次报告。那天正下大雨，同时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获得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做报告时暗算我，建议取消这次报告。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准备长期潜伏的，不敢轻易在公开场合下手，我们不要放弃向青年学生做工作的好机会，决定还是去。听报告的学生坐满了大礼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讲学习问题，反映热烈，效果也不错。事实证明，不取消这次报告是对的。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但有些人对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优良作风，是否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存有疑虑。有一次，我陪同伯承同志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坚持 20 多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纪律和作风都很好，我们很佩服。但会不会像泡茶一样，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浓，很有味道，后来逐渐变了，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呢？我代表伯承同志回答说：这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共产党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向党员进行教育，必要时还要进行整风，如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不良作风，清除不良分子，并且按照党员条件吸收新鲜血液入党，我们党将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决不会像喝茶那样，越喝越没有味道。这点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登门拜访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上海解放

前，陈毅同志在南京曾亲自到中央科学研究院拜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等专家，同他们谈心，向他们做工作。陈老总知识渊博，风度潇洒，谈笑风生，专家、学者们对他很钦佩。4月底，毛主席曾致电二野领导同志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熊子容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愿向我们靠拢，嘱将他的复电转交熊教授。伯承同志派我持毛主席致熊的复电去拜访熊先生，复电是：“南京中央大学熊子容先生大鉴：邵力子先生带来3月29日一信及卯有（即4月25日）来电均悉。兄有所见请与刘伯承市长、宋任穷副市长接洽为盼。弟毛泽东 卯艳（即4月29日）”（当时我没有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是刘伯承，副市长是张霖之、柯庆施）。我转交了毛主席的复电后，熊先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意，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表示拥护和支持，并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向熊先生表示感谢，希望他今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拜访熊子容先生是不公开的，但第二天南京市的许多小报都发表了这个消息。

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进城不久，市委发出内部通知，为了缅怀先烈，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严格规定外来干部必须首先到大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壮烈牺牲的雨花台瞻仰，然后再到其它名胜古迹参观。同志们目睹被反动派枪杀的无数烈士的遗骨，悲愤流泪；受到了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

南京是各国大使、公使集中之地，涉外工作相当多。由于外事工作政策性极强，刘伯承同志除掌管全面外，亲自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特派外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的黄华同志任南京市外事处长，协助刘伯承同志处理具体涉外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第八条规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布告的规定，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一道向我军开炮，妄图阻止我军渡江，致使我军死伤252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被我击中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余3艘英舰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英国海军竟如此横行无忌，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各地，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也纷纷责备英政府，激烈抨击其错误。我党的原则立场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要求英方赔偿损失。英国当局曾派人与我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但采取狡猾态度，拒不承认错误。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的讲话中还造谣说，中国

军队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当谈判尚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于7月30日夜趁我一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竟开炮射击，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紫石英号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犯我主权的霸权主义行径。处理紫石英号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现了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其它众多的涉外事件中，在中央的及时指示及伯承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处理得都很得体。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以及外事纪律的教育不够深入，在这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三十五军入城的第二天，发生了我军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事件。三十五军一〇三师的一位营长带着一个通讯员，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司徒雷登住所，很快便退出。可是，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不久，又发生了南京电报局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的事件。中央对此类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十分重视，及时指示陈士榘、江渭清同志调查处理。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并批评说：“不但证明你们部队（三十五军）对如此事件不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而且证明关于外交问题你们对下级似

乎事前毫无教育，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中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请示”，郑重指出“我党政军人员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国记者和外国人谈任何事情”，并要求“各级干部一体遵照”。针对外事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应当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要只靠开干部会口头讲。口头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文电指示，中央告诫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

南京解放初期，我们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大家日以继夜地处理各条战线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是，同志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情绪十分高涨，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国民党军队不断被歼，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6月，中央开始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小平同志建议在南京、上海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西南服务团。6月下旬，伯承同志让我负责筹组，并任西南服务团团团长。7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从事进军西南的准备。9月份，我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调离南京后，由栗裕同志接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唐亮同志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二副书记。

陈毅在赣南闽西

蓝君文

“败军气犹壮”

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下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3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井冈山地区出现了他们18个团级番号。军事形势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经济极度困难。陈毅于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井冈山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1928年9月至12月4个月中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因有7月湘南远行的失败，远出游击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实现。至此，全军守在山上难以维持。后来，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明确表达：“……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

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四军、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出席了这一决定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原红五军的部队(此时四、五两军合并为红四军)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实施外线机动作战。这种将主力用于远出机动作战的思想，已含有崭新的军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离开井冈山地区，只作较近距离机动的常规。但此次远距离迂回的目的，还是为了调动围山的敌军，以坚持井冈山。

这就说明：经过新的实践，红四军的领导人对于坚持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对于开创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战方法，已有了新的感受。

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共约3600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陈毅作为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随军部行动。

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乃日夜兼程，向大余前进。敌人把正规军调到井冈山“会剿”，大余城无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占领大余城。

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带来了自己的“不意”。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里和近郊

开展群众工作。并规定：如遇紧急情况，部队到广东境内南雄的乌径集合。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这次会议对出现敌情时应予坚决回击虽已举手通过了决议，但行动上未严格贯彻。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即各管一段，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

陈毅以主要精力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上街向群众讲解刚刚张贴的四言 92 句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并联系他和朱德在 1927 年秋天经过大余和此次红军入城的种种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

陈毅主持召开了大余城的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章江畔大路边的广阔沙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会场。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大会后，当场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情沸腾。

但是，大余县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历史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没有人来向红军急报。李文彬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部队的急速后撤在城内引起惊乱。很快，城北街区出现敌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

陈毅从分发财物的地方赶回，在城边追上军部，只见毛泽东带着少数机关人员，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团部队，挡住敌人。林却说部队已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这一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被用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越大余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定到达乌径。

在乌径宿营不久，接到当地党组织的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厄运远未结束。部队日夜东行，想摆脱追兵。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又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后卫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实际上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屋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依依不舍地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再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快跑脱身。

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来支援，火力压住了敌人。

军部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军艰难。伍若兰却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

30年后，陈毅在接受江西省中共党史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蹶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直到2月1日，红军才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乌境内的罗幅障，歇脚一天。红四军前委在罗幅障开会，就这支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前委过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领导，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军队，现在暂时没有固定地区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工作，大家认为不需要重叠机构，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可以改为军政治部，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决定将红四军改编成两个纵队，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独立营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此事议而未决。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遂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拊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

井冈山的红军。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3000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

2月10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闻风尾随而来。陈毅、林彪命令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士俭率队阻击，使敌军暂时不敢前进。胡士俭却不幸牺牲。1929年2月10日，正是旧历除夕，然而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部队饥寒疲乏，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三十面对冷灶黑房，20多天郁积的烦闷恼怒简直要爆炸。有的叫“拼了算了！”

陈毅出席当夜的前委会。他见朱德在会上特别沉静。朱德引导大家分析敌我形势。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敌气焰骄横，必然轻进。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朱德、陈毅都了解他的战斗坚韧性不足。此次他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形有利。朱德在来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过周围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带有条件设置伏击圈。毛泽东微笑点头。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

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虽然力争弹无虚发，但仍显火力薄弱。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这是出山以来的首次胜仗，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准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将信将疑。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

宁都守敌吓跑了。2月12日，红军不战而进宁都城。红军得短暂休整和少量补给。数日后，赣敌李文彬旅3个团急急赶来，红军主动撤离宁都。

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坳，遭众多敌军截击。林彪指挥迅速突围，得以脱离。2月19日到达东固地区。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是5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

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江西工农红军第七、第九纵队。1928年9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段起凤)。1929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4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

抬着整猪，挑着成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2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同志们传达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的休整仅一个星期，赣敌李文彬旅3个团又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红五军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①

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实践证明，过去采取远出游击的办法，派主力下山打外线，还是守不住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过去那种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是在实际上认识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

^① 见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为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

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红四军全军约 3000 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原特务营、独立营人员，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彭祐，纵队长胡少海。

2 月 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蹊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免遭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

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 月 12 日进占四都。四都距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 80 余里。郭凤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 月 14 日，红四军向长汀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 3 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 2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

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人还领到 4 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陈毅有诗表达了 1929 年春天他们的心情：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此诗收入诗集出版时“败军气犹壮”改为“铁军真是铁”，实际上倒是“败军”一语更为真实更有豪情。

当时已查明，张与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蒋桂战争爆发的一个震波，整个战局必将大动荡，前委3月20日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同时已知红五军(此时又恢复了五军称号)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因此，会议作出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红二、四团密切配合。“以赣南、闽西廿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①陈毅参与作出这一决定并始终赞成。

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在汀州亲笔书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旗。自此，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就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在军政治部指导下，长汀相继建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分公开和秘密两种)。不久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部队筹款5万元。

^① 见毛泽东1929年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后在干都会议形成正式决议。

主持红四军“七大”

4月1日，红四军按3月20日的方案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月4日，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峻时写的，当时红四军主力早已撤离井冈山，正在遭追击受饥寒中日夜苦斗，随时有覆没的危险。所以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实际上，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于4月4日通过一信(4月7日发出)，指示红四军：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讨论中央的“二月来信”。会后他以前委的名义于4月5日起草了致中央的信。这信一开头就坦诚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列举4个方面的理由阐明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客观规律，表现出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很大的政治勇气。

4月8日，红四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在此，前委召开会议就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策略问题继续讨

论。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集中兵力向南昌吉安之间，逼近蒋桂混战的战区，及时夺取敌军辎重，促使蒋系部队失败并收编其队伍。另一种认为不宜把军阀混战估量太过，也不能有帮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思想，还应抓紧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于都前委会议通过了分兵发动群众的主张。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分兵活动。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当时，在红军中由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旧军队影响的存在和党组织对党员教育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滋长，日益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矛盾，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不断发生分歧和争论，妨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此时，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的介入，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渐趋激化。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据说还当过旅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军事，其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都有一套。他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重。前委任命他为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他的偏于军事、偏于一长制的观点却支持了部队中的错误倾向。

5月初，蒋桂之间在武汉的混战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赣南敌情又紧。此时闽敌主力正赴广东作战，闽西兵力空虚，于是红四军决定再次入闽。5月23日一举攻克

龙岩城。

在这些天里，由于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矛盾激化。

毛泽东在6月1日于湖雷市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写给中央一个报告，其中写到：红四军“党内现发生些问题正在改进中。”

刘安恭一主持临时军委就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下级党委(临时军委)擅自决定改变上级党委(前委)的职权范围，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6月上旬，前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意见不一致，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政治部主任一职后由陈毅接替。领导成员中的分歧扩大到了群众中间，引起了争论。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原来就存在的对一些问题的不同主张和分歧，由于在是否设立军委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而公开化了。

面对这种状况，陈毅同毛泽东、朱德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会议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于是，为了总结经验，克服错误倾向，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前委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6月16日，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3省边界

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趁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6月19日一举攻占龙岩城，歼敌2000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不振。环境又暂得稳定。

6月20日、21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七大”的工作报告。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最后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次会议，在党的领导、农村根据地、政治思想工作、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有的人忽视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有的人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主，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持错误主张的同志占了多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会议的肯定。红四军党内的一些主要分歧未能得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前委的领导力量受到削弱。陈毅为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努力，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会后，前委同意

毛泽东的提议，让毛泽东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闽西的工作。毛泽东乃于7月8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

党中央“训练班”

不久，接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

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在厦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接待，陈毅向省委作了汇报，并与之讨论了发展闽西斗争的问题。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

当时，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但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彼此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陈毅乘轮船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

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

章，气宇轩昂。陈毅衣着也得体，象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

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老兄们备好西装全套及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这位和他一同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听完便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次会见中，陈毅才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对红军农村武装斗争情况熟悉并有卓越见解的杨殷以及正与他们一起的邢士贞、张际春于8月24日下午4时许同时被捕。

陈毅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李立三在8月27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

8月2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所在召开。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3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

9月1日，陈毅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致。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从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他们都阅读了陈毅所写的报告，然后来和陈毅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几个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奕，空气更为闲逸。他俩和李、周都认识，或是法国勤工同学，或是黄埔师生，所以相见十分自然。

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它文件之后，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在李立三、周恩来、

陈毅的9月的讨论中，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

关于红军与根据地问题。1929年“九月来信”中写道：“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这种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认识，是在中央“训练班”集体总结前一阶段革命斗争过程中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问题。中央8月21日来信就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建军原则，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负有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执笔的“九月来信”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对于“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给予了有力的纠正。

关于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九月来信”指出：“应向着

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

关于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中央“二月来信”曾要求红军分散活动，6月12日来信则“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在“九月来信”中再一次肯定：“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

此外，“九月来信”还就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作了指示，并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的缺点及其危害。指出：“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一些同志)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

有使纠纷加重。”并决定：“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坚决纠正错误思想

10月初，陈毅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贯彻中央指示。他于10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他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绕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的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

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养病尚未回来。10月初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陈毅当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陈毅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他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

话，“这个检讨我来作”。前委及军部机关即随部队向梅县前进，陈毅随军南下。10月25日，红四军主力进占梅县。26日下午，粤敌蒋光鼐率3个团正规部队于3天前启程抵达梅县附近，其先头部队已向梅县猛扑。红军撤出梅县退入梅县南部山区。当晚再打梅县，战至清晨4时仍打不下。前委决心主动撤围，向敌兵力薄弱的赣南转移。

红四军经平远到寻乌，在寻乌赤色区域大田乡安置了伤病兵。此次梅县作战，伤亡200余人，而上杭补充的俘虏兵逃亡甚多。在寻乌，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并开始筹备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月18日，在上杭官庄的前委会议上，决定扩大闽西苏区，确定了建立闽西政权的有关政策。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

在占领汀州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同志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11月28日，在毛、朱、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3项决议：一、召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

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在同一天，毛泽东在写给中央和李立三的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但是，陈毅对于自己要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的决心却并不因此而减弱。他从12月3日随军到达新泉的当天起即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如何纠正错误思想和加强、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移驻古田后，工作更紧张，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调查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讨论和充实，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九大”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同时又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

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已回前委书记，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也已通过，陈毅回四军的任务完成了。今后怎么办呢？在上海时，鉴于他卷入矛盾很深，中央组织部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七军工作。他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如今，他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起自己的工作问题了，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便继续留在朱毛红军工作，至于干什么，他向来是不介意的。

25年后，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有陈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这个功劳除了朱德就是陈毅同志。第二，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路线的错误，但是如果他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第三次贡献是黄桥战役打开华中抗日局面。

罗荣桓同林彪的一次原则斗争

梁 汉

在军委常委会议上

1961年3月的一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罗荣桓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了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思。他联想起年初2月2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3月28日，这篇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的这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起到了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园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

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到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4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30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4月30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晌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乎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

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象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1975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9年的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

意见。”^①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的报复

林彪自从4月30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伸出右手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坐。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荣桓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1961年工作的中心是“四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5—36页。

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便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

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押在狱中。他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末，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4月30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①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1962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

^① 指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

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1965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

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3年，但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革”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1966年8月25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她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于是，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1967年2月14日，由叶群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发展到了最高潮。她亲自出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指责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被“彻底砸烂”。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林彪一伙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显现其璀璨的光辉。人们在十年动乱中见识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之后，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

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便更加怀念罗荣桓这一位曾经挺身而出，同林彪进行原则斗争的先驱者。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同林彪的分歧

罗荣桓同林彪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1960年9月，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由于“四个第一”当时已为毛泽东所肯定，并被写进了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所以罗荣桓只能尽力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和解释，力求赋予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义，从而减轻它对军队建设的危害。

到1961年夏天，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已经七八个月了。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这种贬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罗荣桓称之为“仇视专”。其表现是“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下降。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和一般化的作风大大

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解释和领会呢？他认为，关键是要运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1961年9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11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讲话中都做了这种重新解释的工作。

他怎样解释“四个第一”呢？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我们部队的高级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学校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个任务完成。”他赞成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提出的科技部门的党支部起保证作用的提法。他说：在科技院校和单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学研究项目的完成。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单位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

1961年8月罗东进回家过暑假时，罗荣桓和他谈话了解到，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中，学员们对红与专的问题认识相当混乱，片面强调红，

忽视专业学习。学校里还搞什么满堂红活动，各支部都做了一天读多少毛主席著作，多长时间通读一遍的计划，搞技术作业也要引两句毛主席的语录。可是认真说来，究竟什么是红，红又为了什么，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罗荣桓和罗东进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谈起了红与专的问题。他对这些青年人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拿出东西来。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到专业上。谁要是真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是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他再三鼓励青年们，一定要下决心努力把专业学好。

在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着重分析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在讨论总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时，他当场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红’要落实到‘专’”。他又要求负责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这一句话的段落读给他听。

他针对一些人丢下专业下农村的现象说：“军事工程学

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主要还是搞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他还批评了有些院校丢下专业，光学毛选的偏向。他说：“毛选一般都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专业，甚至象聂总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象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

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象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呐？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

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

由于林彪和罗荣桓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了。他终于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到了1963年，新华社要发表我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但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压，罗荣桓为了党的团结，可以忍耐，可以委屈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林彪三番两次打击罗荣桓，直到罗荣桓逝世后仍不放过他的原因。

叶剑英与我党我军历史科学的研究

范 硕

叶剑英是功勋显赫的共和国元帅，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诗人。他平生爱读史书，知识渊博，造诣颇深。特别是在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以后，同院内外的史学工作者一起，对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我党我军的历史以及军战史的编纂学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不仅在史学治学的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史学著述方面有新的开拓，桃李满园，硕果累累。

(一)

叶剑英对于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孜孜不倦”和“诲人不倦”。

早在中学读书时期，叶剑英就热爱文史古书，熟读《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自南洋投笔从戎后，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东征、北伐战争生活中，他结合中国近代史，潜心研究《孙文学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到香港，和聂荣臻一起研读太平天国史，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莫斯科学习归国，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境况

下，他从上海携带一批历史、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到中央苏区，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一些同志(包括中央领导人)常向他借书阅读。他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期间，亲自编写教材和讲课，提倡教、学员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历史知识，总结我军建军作战的经验，研讨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只要有机会，他就在总参谋部的机关干部和学校干部中，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讲述古今中外的历史和军史。他回顾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运动史，联系孙中山幻想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遭到失败的教训，联系我们党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而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历史，说明“枪杆子”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点。他说：“全党同志都要来研究环境，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党所造成的祸害。以后他在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期间，为搞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更是不遗余力。

不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时期，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都恪守“观今鉴古”的原则，坚持学史。时间不够怎么办？他给自己规定三句话：“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他勤政笃学，身体力行。在他晚年翠柏红枫的居处，藏有马列经典、中外史籍、诸子百家等各种书籍。从二十四史的“通史”到《孙子兵法》、《武经七书》、《诸葛忠武侯兵法》、《关帝全书》等“兵法”，他不知反复钻研过多少遍。

他不仅搜集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革命战争史进行阅读和研究，还注意研究外国的军事史和军事人物，阅读外国军政首脑人物的战争回忆录；他不仅认真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还反复阅读法国史学家福尔所著《论拿破仑》等著作。他读书非常认真，在他读过的书上往往是圈圈点点，诸多眉批。为了阅读外文书籍和报刊，叶剑英在百忙中坚持补习外文。到了晚年还专门请教员教他学英文。

叶剑英晓古通今，谙熟历史典故。他在讲话、作诗和著述中经常旁征博引，以古喻今。他知识渊博，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谈到“长沙水”、“武昌鱼”和“孙权迁都南京”的典故，突然想起辛弃疾的《南乡子》，问叶剑英是否记得。叶剑英不假思索，随即吟咏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听罢惊喜地当众指着叶剑英风趣地说：“此人有些文化。”接着他也吟哦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叶剑英在学习上从不自满，“不孤不空”。他经常向大家推荐新出版的史学著作，提倡“一人读书，众人受益”。他组织身边工作的同志作出计划，分头读书，然后集体汇报书的内容；同大家一起议论书中提出的问题，座谈学习收获。他勤于用脑，自己经常思索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将想到的问题提出来和大家研究。一次在武汉，他问身边的

研究人员，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没有，读懂没有。他和大家重温恩格斯的《步枪史》，颇有感慨地说：“恩格斯在那样的年代，条件那样差，还写了那么多军事著作。他甚至花费那么大精力对步枪的历史作了那么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从事军事科学研究，还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说来真是惭愧！”接着他又严肃诚恳地勉励大家，要以革命导师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精神，挤出时间下苦功夫读书，钻研学问。从叶剑英这一席充满感慨的话语中，大家意识到了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差距，受到了巨大的鞭策。

对待院外研究军事历史学的专家、学者，叶剑英也同样关心和支持。他热情帮助青年军事史学者李少一编著《中国军事战略史》，支持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郭汝瑰编写《中国军事史》。1964年郭汝瑰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组织起一个专门的编写班子，着手收集整理史料。经过“文革”浩劫，虽然遭到挫折，但在军委领导和叶剑英的关怀下，并未间断，现已陆续出版。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的这首《攻关》诗，生动地表现了他求知若渴、勇于追求、坚毅不拔、刻苦治学的精神。他的这种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同志们奋发、进取。

(二)

组织力量编修党史、军史，是中央军委赋予叶剑英的

一项重要任务。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说：“研究我们党的历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老同志如果不去研究，留给下一代更困难了。”

从50年代开始，叶剑英在主持军事科学院期间，就把军事历史学列为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内容，成立专门的部门，组织专门的人才，长期钻研军事历史这门科学。他认为，战争史、军事史是一门很复杂、繁难的学科。要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就必须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学术水平。为此，首先要做好理论准备，其次是做好史料准备。他要求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懂得马列主义，打定主意，定下心来搞，做这一行的专家。他动员大家下苦功夫读书学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学以致用。他指出，只有认真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进行正确的研究。在他的指导下，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军事文选，还编辑了一些有关史学的文摘和专题论述，供院内外研究人员学习。

叶剑英倡导举行军事学术讲座，规定每星期五开课一次，并带头参加。第一次讲座，讲“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他和宋时轮等同志到会演讲。他认为，举办讲座，提高军事科学知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不仅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克劳塞维茨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也需要学点我国古代的东西，接受古人的经验。

为了做好史料准备，叶剑英组织力量到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借阅和收集史籍和资料。在军事科学

院逐步建立起图书资料处、阅览室和图书馆，藏有古今中外军事书籍数十万册。

叶剑英在领导研究人员进行学术准备的过程中，一方面汇集已有的历史书籍，研究前人总结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他更重视发掘、整理、总结和研究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他说：我们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直到胜利，有许多经验教训。哪些需要坚持发扬，哪些不适合了，要进行总结，把它升华为系统的知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成为历史科学。有些人讲课：一讲起来就是库尔斯克、斯大林格勒，自己有经验没有？我们打了二三十年仗，经验多得很。就是一个小小战斗，也有真理性，可以上升为普遍真理。连日本人都说：中国军队经过长期的战争，能打仗，经验丰富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现在有个好条件，就是老同志还在。象树木一样，都到了秋天，果实累累，都成熟了，不收获果实就有失掉的危险。如果不趁现在老同志们在，把他们的经验整理好，再过几个5年，老同志不在了，就谈不上整理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战史的资料在保险柜里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在那些经过过去战争实践的人脑子里头。几十年来战争的经验在毛主席脑子里头，在元帅们、兵团、军的这些身经百战的同志们的脑子里头。这是历史文电资料上所没有的。老同志头脑里的作战经验象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玛瑙，不经过收集整理还是分散的。要把我军指挥员零星的、分散的有关战役、战斗的作战经验，系统地加以概括，上升为理论，用理论这条红线把老同志脑子里的“珍珠玛瑙”穿

起来。当然，要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论，还要经过“加工”的过程，就象纺织工人织布那样，从棉花到布，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把布织出来。

叶剑英多次强调向部队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强调收集整理老同志作战经验的迫切性。1963年10月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作报告时就大声疾呼：这项工作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现在要急赶直追。他要求高等军事学院每期请一些我军高级领导同志为学员讲战例，请各总部和军、兵种领导同志作报告，把这作为一个制度定下来。叶剑英说：“要采集资料，象李时珍上山采药那样，凡是对研究有用的就要采。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战史都要摸一摸，要摸清楚。”他同几位副院长多次组织研究人员深入部队取经“探宝”，整理我军著名战例和战役战斗经验，总结了我军资料9万多件，并邀请老红军、老八路座谈体会，撰写文章。早在1959年，就编印了四大本包括各个野战军一些战斗总结的参考资料；后来又准备了70个战例，180件附图，还有战例注记、经验摘编等。

(三)

在研究军事历史中，如何对待中国历代的军事遗产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叶剑英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坚决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

叶剑英指出：“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遗产。我们要吸收

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彩。”他经常对大家说：“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确实有东西，许多原则至今还适用，对于提高我们有帮助。《孙子兵法》虽然距今很久了，外国人还在摸。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解剖古代的东西，给以批评的总结。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说得很好，我们要重视军事历史遗产的研究，使历史为指导现实服务。

1958年4月，他向军事科学院各研究部的同志说：范文澜写了个材料，主张“厚今薄古”。我们研究工作也要把握这个方向。过去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孟子主张事事博古，事事要按照古人所办过的那样去办。荀子反对这个东西，提倡启发于后，启发于现代。“厚今”还是“厚古”，今天看来，还是荀子的方向是对的。研究过去，研究古代军事史是为了解决现代战争问题，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博古是为了通今。在研究工作上，一定要掌握这个方向，不然就会走弯路。

在叶剑英的指引下，军事科学院根据“古为今用”的方针，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编辑了《古代兵法选辑》、《孙子兵法新注》，译注《武经七书》、《投笔肤谈》等；在古代战例方面，编写了《中国历代战争战例选编》、

《毛泽东军事著作中若干战例简介》、《我国古代以弱胜强的战例》等；整理编印了《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等。在赋予下级研究任务时，叶剑英每次都要交待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一再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对历史问题要进行概括，要有分析，避免一钻就钻到古书里，只搞材料堆积。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通过对古代军事理论和历代战争战例的研究，探索了战争的一般规律的军事思想，探索了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军事原则，对指导研究现代战争很有价值。

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需要，叶剑英还规定了许多专题研究项目，如“关于河西走廊的兵要地理”、“我国沿海岛屿作战”、“北方沙漠、草原地区作战”、“古代突然袭击战例”以及“兵器学史——从戈矛到火器的演变”、“古代官吏致仕(退休)制度”等等，为我军的军制和作战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历史参考资料。

在研究中国历代军事遗产的同时，叶剑英注重研究世界各国古代和现代战争，探讨外军在战争中的行动规律和作战特点，做到“外为中用”。

“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叶剑英要求研究人员注意向外军学习，向敌军学习。他说，我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经验，因为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适合我国的情况与特点。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一切有益的经验，不能狭隘保守。一切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指导外国军事部集中力量翻译苏联、美国、日本、英国、德

国、法国等军队的历史和现实的资料。除了译出一部苏联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军事学术史》外，还要求把外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役、战术以著名战例汇编成书。到1962年，编辑和翻译出版外军资料425期，军事著作61种，发给本院研究人员、军委总部各机关和各部队进行学习参阅。1965年又汇编敌我友军资料240种，计1190万余字。

在开展外军历史研究中，叶剑英经常提醒研究人员，一定要坚持为国防建设和战备服务的正确方向。无论是研究外国的历史或现实，还是研究美军、苏军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历史，都要紧密结合我军建设和作战的需要，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他多次强调指出，要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有益的经验。要摆正研究外军历史与研究外军现实的关系。1972年，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研究的重点在现实，为了论证现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历史。叶剑英还多次与外军部研究人员说，你们要有大一点的企图，不要只写点内容简介，而是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落脚于研究；译完一本书，就要整理出一个材料，搞出一个研究成果。多年来外军部一直遵循他的指示去做，取得了丰硕成果。

(四)

在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史料准备的基础上，叶剑英集中组织力量编修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的历史。他多

次接见战史部的领导同志和研究人员，亲切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听取研究人员的想法。他说，研究战史要抓住关键，要有思想性和战斗性。除了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党史外，还要吸取全军各单位编写战史的经验，学习古今中外编史方面的知识，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知识。占有史料是编史的物质基础。因此要集中主要力量抓资料。随着编史工作的进展，他指导一部分人继续搞资料，一部分人搞研究，把各单位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研究。根据他的要求，战史部很快整理出一本《我军三十年大事记》初稿；经过5年努力，研究汇编出我军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史料16期，为编写我军战史作了充分准备。

对于如何编人民解放军的战史，叶剑英有许多宝贵的意见和设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他指出：“毛主席领导我国军民打了几十年的仗，进行数百次大的战役和数万次大的战斗，用劣势装备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内外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奇迹。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得心应手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战争，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完整体系。”要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统一我们建军和作战思想，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要通过编写战

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二)关于编写的目的对象。他说，我们编写的战史主要是给我们部队做教材，同时也是留给子孙后代学习和供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作参考的。因此，他主张战史的体例分两种：一种作为史书留存，一种作为教材。

(三)关于战史的内容和范畴。他主张战史要体现党对军事、政治各方面斗争的领导，要反映军队如何执行党的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总结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基本经验，探索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四)关于如何处理史学分类中几个关系的意见：一是战史和党史的关系。叶剑英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战史是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写好战史，对于编写党史是不可缺少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是战史和军史的关系，亦即我军战争史与军队发展史的关系。我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战史中如何反映？叶剑英说，这里有一个战史和军史的“分合”问题。过去有人是分开单写的。我们是否分开写？我考虑从“一切服从战争”“一切附属于战争”的观点出发，军队的发展与作战是很难分开的。可以在写战争过程中把军队发展反映出来，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战争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这些都是分不开的。战争，具体来说，就是战略、战役、战斗。我们的战史要体现出战略、战役、战斗中的经验教训。三是通史、全史和简史的关系。叶剑英指出，历史有

全史和简史之分：二十四史是全史，苏共党史是简史。还有通史：范文澜在编书，是通史。他编通史也是从鸦片战争写起，先搞近代的。我们编战史，要搞什么样的东西？是编全史还是编简史？我认为，目前还是先搞简史。史是越简越难编，简史比全史更难编。先搞30年简史，一段一段地编：抗美援朝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是从今到古。不是从黄帝打败蚩尤那个时候写起，也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写到抗美援朝。为什么这样编？主要是从军队的需要出发，首先是院校的需要。是否是先搞个简史，还是写段史、通史、简史、全史？确定如何写法，要研究请示。

(五)关于编史的组织领导。叶剑英认为，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导下编写战史。1958年1月11日，他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上提出：编战史是全党的工作，不完全依靠我们的“研究车间”，要依靠党中央。他多次建议党中央组织一个战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重大问题请中央点头。战史部可成为中央编写全军战史的“秘书处”。确定编史的目的、方针、对象，制定编史的蓝图和具体方案计划，都要向中央和军委请示报告。他建议全军成立战史编写单位(战编室)，组成一支编史队伍。原则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军以上单位，都要成立“战编室”，着手编写本单位的战史。各编史单位，请各位老师直接掌握。各编史单位的经验、总结、对编写中有争论问题的结论，要收集起来，作为学习材料。他还建议各编史单位完成初稿以后，留个精干的加工组，集中到军事科学院综编全军战

史，由中央战史编委会直接领导。

谈到编史队伍，叶剑英主张搞个基本队伍和临时队伍。基本队伍组织就绪，就开始一个一个时期写下去。临时队伍是临时调一批人员参加写一段。他说，战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要有一批专门的人材来写，人不要太多。写的人多了，写出的东西象和尚的袈裟，东一块西一块，各色各样，不好统一。

(六)确定编史的科学程序：学习、研究、“生产”相结合；先学、再研究，再写。订出计划，先纲后目，先总后分，先整后零。要解决一个总纲，没有整体观念，会造成返工。可以先编一个各个历史时期的部队组织序列表。具体步骤，设想两个方案，一案是几个时期全面铺开，同时并进；一案是逐段“蝉联”，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逐次编写。逐段“蝉联”，可以节省些人材，有一部分人写前一个时期，另一部分准备下一时期的史料，搞粗坯工作。

(五)

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叶剑英重视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挥笔著文，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解决党史、战史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和疑难问题。

他一生经历了清代封建王朝、旧的和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个历史时期。青年时代投笔从戎，身经百战，有着极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叶剑英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

革命武装斗争史和我军军、战史方面的论著，如《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伟大的战略决战》等等。这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地阐述历史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学习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探讨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叶剑英还针对各个时期存在的史学问题发表一些有关党史、军史、战史专题论著，如为纪念古田会议决议 30 周年而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辽东半岛演习总结中所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等等，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的典范。

在研究党史和军事史中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如何突出各个历史时期的重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史学界的认识不完全一致。叶剑英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充满着政治斗争。这一时期应当抓住的主要矛盾是：是先夺取乡村，还是先夺取城市；是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还是保持旧军队的一套，以及要不要开辟和建立根据地等等。如果在史学著述中不能突出这些问题，并通过战争历史实际来加以解决和证实，那就不能体现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战争的主要问题是：是采取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还是正规战、运动战；是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还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通过国民党。他指出，突出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有思想性和战斗性。抗日战

争时期有一些路线性、政策性问题要弄清楚。党的“七大”以后，全党思想趋于统一。解放战争也有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来，就小一些了。

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叶剑英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对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问题、长征路上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问题、红军到达陕北后：是先巩固后发展，还是发展中求巩固的问题、胡宗南进攻陕北后党的战略方针问题，等等，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抓住问题的实质，加以科学论证。

叶剑英不但注意解决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还不辞辛劳，亲自指导研究人员编写历史专著，认真研究，反复修改。对于《论游击战》一书，在写法上，他强调指出，应当抓住每个主要问题写清楚。如根据地的问题，不仅要把建立根据地的意义、条件写清楚，还要写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根据地不能随意丢掉。这方面，中国革命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为了使人能看懂，不能只写几条原则，象条令那样，人家啃不动，看不懂，要举例说明。如我们过去战争中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外国人看来，就很不好理解。他说，这本书可以以独立领导游击队的干部为主要对象，着重解决领导游击战争的一些基本问题。具体战斗方法，可以不过多论述，那些都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去创造的。

1971年，林彪叛逃后，叶剑英亲自组织起草《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曾3次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审查、修改这个

材料，并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审查这个材料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清除林彪的流毒，搞好这个重要材料，他先后接见军事科学院参加起草的同志，具体指导怎样撰写和修改，多次在深夜一两点钟打电话给他们，了解材料修改情况，提出具体要求，给予具体指示，并且派人送来有关材料。每一次修改稿，他都逐字逐句地看，还亲自动手改。哪个问题要保留，哪个问题可不写；对某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怎么写、怎么批，大小标题应该怎么出；哪一句话要修改，要加一句或减一句什么话；在哪里要加注，等等，都指示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甚至连要在文章里注明“见附图×”都想到了。原稿写的是“批判林彪修正主义军事路线，”他指示改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写批判林彪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时，他指示要先把王明路线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写清楚，然后再说林彪是支持王明路线的。在写批判林彪在遵义会议以后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时，他指出，先把红军四渡赤水的概况写清楚，然后再写林彪当时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一再提醒大家：四渡赤水毛主席的得意之笔，是毛主席的杰作，这段很精彩，一定要很生动地写出来。要突出毛主席在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中如何调动敌人，摆脱敌人，打击敌人。在写毛主席指挥红军从贵阳至龙里之间插过去时，要说明贵阳至龙里只有60里，要把蒋介石当时在贵阳点出来，不然人们以为蒋介石还在南京。在修改过程中，有的问题由于执笔人对历史情况了解不够，写得不够准确，不够清楚，他就把他了解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党内斗争情况

讲给大家听。不但在文件内容上逐段逐字逐句地推敲，反复修改，在文件的写法、结构上，他也精心指导，严格把关。原来的稿子是先写结论，后作分析，议论的话比较多。他耐心地开导大家说：你们现在是采取先结论，后作分析的办法，不是先摆事实，后作结论。当然，先结论，后分析也可以，但帽子不要太大，要让事实去说话，议论的话可尽量少说。通过这个文件的产生、修改加工的过程，使同志们再一次感受到叶剑英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六)

从事党史军史这门学科的研究，需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叶剑英同研究人员一起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

一、“勇敢参加积累”。他十分强调知识积累、占有资料的重要。他说：马克思没有前人智慧的积累，就不可能有马克思。马克思研究很多东西，对几个国家的文字、历史、经济都有研究。没有积累不行，不然文化停顿、不能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言中说：“研究应该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其发展的各种形势，搜集其内在联系。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才能妥当的描述实际运动。”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自己一个人的发现，有很多理论前人已经发现了。他的经济学的理论不是亚当斯密、李加图他们已经发现了吗？辩证唯物论你们不是读过

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吗？唯物论在一两千年以前，德谟克里特他们都称唯物论者。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积累的过程。积累，积累，一直积累到马克思的时候，把它加以科学的整理，把黑格尔辩证法合理的部分吸取了，不合理的部分扬弃了，把费尔巴哈合理的部分吸取了，不合理的部分扬弃了。这就是科学整理工作，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本草》，就是当年李时珍上山采药写出来的。他这个也采，那个也采，采了许多拿回家进行选择工作，好象农民选种一样，哪个该留，哪个该弃，不经过一番研究是不行的。实践同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人类智慧是点滴积累起来，再经过科学的整理，才能成为理论，才能成为普遍真理。

二、深钻探宝。叶剑英说，研究历史好比地质的钻探一样，从一点上深入：针对一点，深入钻研下去，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宝藏。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原来就有些基础的人，事先也应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知识。“钻，就是对占有的大量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综合研究。钻的时候，不仅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地去钻。还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选择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一个一个地排列，找出问题的关键，否则就会陷入复杂的资料迷雾中一无所得。”要“一抓、二钻，三产”。“抓”，就是抓资料，这是钻的前提；“产”，就是创造新的产品，这是钻的结果。要把调查研究，刻苦钻研，加工制造几个环节结合起来。

三、发扬学术民主。叶剑英说：“学术民主、学术争鸣

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争辩，才能显现真理。真理愈争愈明。”在学术研究中要贯彻群众路线，造成一种钻研学术的空气。他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实行“七分民主，三分集中”，“要有科学研究的民主”和“坚持真理的集中”。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研究的民主和坚持真理的集中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军事历史科学的发展。叶剑英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为大家带了个好头。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参加会议讨论问题，总是耐心听取各种意见，耳听手记，凡是有价值的，都注意吸收采纳，并给以鼓励。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做到“守常应变”，坚持原则性，注意灵活性，同下边的同志讨论问题，要谦虚谨慎，不能强加于人。有几次讨论问题，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他提出停下来，进行“冷处理”，要双方找根据，查资料，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

四、合力攻关。他劝导大家，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之间要团结、协作，合力攻关。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要互相帮助，要团结。同志之间，处与处、部与部、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他引证古典说：“满招损，谦受益”，老子教训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一个人力戒骄傲，才能把人家的一点一滴加进你的“罐子”里去；时刻感到不足，才能欢迎人家对你的批评与建议。骄傲自满是不能团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人一定要找与自己同样高大的人才交朋友，自己就孤立了。结果矮子进步了，自己又高又大的还在后面。我们研究人员，研究机关，各有千秋，不相上

下。如果自满起来，学术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成为一塘死水。叶剑英本人就非常谦虚，经常表示愿意向大家学习，和同志们共勉。他说：“我这个院长，实在惭愧，肚子里一点科学也没有。怎么办？要么爬上琅琊山，要么退休，解甲归田。还是爬山，科学的大山要爬。马克思已60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战斗、前进的人生。”

叶剑英已经离开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治史思想和宝贵经验，将促进我党我军历史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说明：文中有关叶剑英的言论，引自叶剑英多次内部讲话材料。）

海外同胞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黄慰慈 许肖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日益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严格来说，中国人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同样地，中国人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并非在国内。

海外同胞，包括华侨、外籍华人以及留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海外同胞早期向中国人民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实践者，海外同胞创建党的尝试，在侨居地创立共产主义小组，进行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一、俄国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在中国创建党的尝试

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苏俄。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已经存在并参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活动。它提出了在中国的建党任务并为完成这一任务进行了大量

的活动。考察成立时间最早、成员最多的海外华人共产党组织——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系统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华人无产阶级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参与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旅俄华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苏俄十月革命前夕，旅俄华工数量相当大。据有关文献记载，从19世纪末大批华工进入俄国开始，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募工，至十月革命前，旅俄华工至少有50万。旅俄华工具有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他们旅居苏俄各地，深受沙俄与资本家的压迫与残酷剥削。他们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遭到酷似中世纪的非人的奴役。华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1918年10月16日，乌克兰盖特曼政府的通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华工帮助他们搜集重要情报，并积极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伟大的十月革命，使旅俄华工获得了解放，给旅俄华工以极大鼓舞。他们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唯一来自人民并为人民的政权。”^①广大旅俄华工将自己的命运与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积极参加苏俄人民的政治活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俄面临着协约国武装干涉的

^① 《全俄中央执委会公报》(1919年9月22日，俄文版)。

严峻局面。前线急需大批兵员，应征入伍的华人达5万人之多。华人支队、华人排、连、营、团在苏俄红军各个方面军中相继出现。这些军事单位的组织者与指挥员，相继被吸收入党，成为旅俄华人中最早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为首的俄共(布)的关怀与指导下，各地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先后成立。1918年12月1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在该组织的成员中，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支部。这是旅俄同胞在苏俄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此后，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堡、上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亚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华工联合会分会也都建立了华人共产党支部。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该会党组织建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局，以统一领导整个苏俄境内的华人党组织。6月25日，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局成立，并给列宁写了信。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局(简称俄国共产华员局)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党组织的统一中央领导机构。该局接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设委员5名，候补委员2名，这些委员均由旅俄华人共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须经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俄国共产华员局在自身的组织建设、制定任务、特别是对华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和对中国的宣传工作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俄国共产华员局的成立是旅俄同胞共产主义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是旅俄华人共产党章程规定

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旅俄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中，有“祖国本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部分，它明文规定：“(1) 华人共产党员认为，在中国所有地区实行社会革命——组织工人阶级，是自己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承担的直接任务；(2) 凡在祖国有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地方，均建立党支部……”^①章程中还明确表示，共产华员局只是暂时设于莫斯科，而将来“须移至中国”。俄国共产华员局还以“莫斯科共产党总筹办处”的名义出版了《震东报》。华员局明确规定：各地方分局“须领导在中国劳动群众中所开展的宣传鼓动工作，促其掌握革命思想，为他们举行群众集会，安排各种会议，举办有关中国、有关中国革命运动的演讲等。”自1920年5月至11月，仅阿穆尔地方分局就散发了旅俄华人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及传单23000份，中文版宣传小册子5000本，《共产主义之星报》58000份。华员局还组织力量将一批马列著作、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决议译成中文，以便于广大华工的学习以及向国内输送。

1920年秋，华员局建立了远东华员组织局，由赵永禄任主任，连昆任书记。该局隶属于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并同其协调工作，以加强同中国本土的联系。北洋政府驻赤塔领事管尚平报告说：“此间设一中国工会党，会长、会员半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总部派来，半由当地无业侨民充任，凭借党势，任意横行……并用汉文散布共产主义报

^① 转引自苏联《近现代史》1959年第5期。

纸。”^①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远东华员组织局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为了加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华员局还派出一批干部分赴各地，协助各地进行组织建设。所有这些措施，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为在内地开展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俄国共产华员局进行国内建党尝试的一个方面，是与国内革命团体建立联系，积极进行建党的探索。1920年底，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将在国内建立党支部的问题提上日程。12月6日，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直属“中国共产党组织局”研究了关于在中国“建立支部的必要性和在上海、天津的青年团建立联系问题。”^②据当时掌握的情况，1920年，中国本土学生团体的总数已达193个，这是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因此，共产华员局决定派刘谦回国3个月，到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联系当地革命团体，探讨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可能性。共产华员局在《现有力量分配计划》中指出：经苏俄的塞尔巴拉金斯克派出了顾鸿宾等3人前往中国；还派出了基穆·切尔洪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当时共产华员局的基本战略意图是：把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工业无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城市，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祥地，实现该局“组织中国工人阶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宗旨。但是，由于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和远东局势的变化，俄国共产华员局的建党努

① 《中俄关系史料》(民国十年)第48页。

② 转引自苏联《远东问题》1988年第2期。

力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尽管俄国华人共产党组织在国内的创建党的尝试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成效，但它作为“联系中国当前和未来革命运动的纽带”，其意义是深远的。

二、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旅俄同胞在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旅俄同胞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

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无法直接与中国革命党派和革命团体取得联系，无法由国内派出代表的情况下，旅俄同胞的代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重要的国际会议。

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小组的代表和一些国家的观察员。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张永奎应苏俄外交部的邀请，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大会，并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3月5日，刘绍周向大会宣读了祝词，他说：“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①旅俄同胞的代表以中国无产阶级组织代表的面目出现在国际无产者大会

^①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111页。

的讲坛上，不能不引起大会的关注。他们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联结起来，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从共产国际成立之日起，就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响应者，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00多人出席，代表37个国家的67个共产主义组织。由于中国国内仍然未能有代表参加大会，因此，旅俄同胞的代表再一次履行他们的责任。俄国共产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以“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即俄国共产华员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在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形成方面，出席大会的华人代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了研究东方人民革命问题，大会专门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由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是委员之一，他参加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罗易的《补充提纲》的研究和讨论。

7月28日，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刘绍周作了系统的发言。在谈到中国问题时，他分析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介绍并充分肯定了五四爱国运动，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

要的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亚洲，并将其帝国主义阴谋扩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目前，唯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就是中国劳苦大众强有力的革命运动。”^①这是中国代表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第一篇系统介绍中国革命的报告。它对于共产国际制定正确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于扩大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促进各国无产阶级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重视、支持和帮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怀与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和共产国际通过各种渠道派代表来华，广泛接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传播十月革命思想，培养干部以至建立共产党的最初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旅俄华人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重要角色，在促进中国共产党诞生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4月，杨明斋随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他是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会谈时的翻译，在上海，他陪同维经斯基访问了陈独秀及《新青年》、《星期评论》及共学社等杂志和社团的负责人。后来，他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一栋楼房，以此为基地，开展

^① 苏联1920年7月30日《消息报》。

了一系列工作。为了传递信息，互相沟通，他创立了中俄通讯社，亲任社长；1920年5月，他和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是发起者之一，在陈独秀离开上海到广州之后，他协助李汉俊主持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经常陪同维经斯基往返于上海、北京之间，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决定，在杨明斋指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渔阳里六号成立。随后，各地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

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选送他们赴俄深造，杨明斋还在渔阳里六号办起了外国语学社，亲任校长并主讲俄语。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组织从该社学员中挑选了一批团员，由杨明斋分批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汪寿华、柯庆施等等。

1921年春，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全国建党的条件日趋成熟。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明斋带张太雷赴苏，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情况。他们就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与远东局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经反复讨论和研究，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中国支部。6月，杨明斋和张太雷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关系，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关心、支持、帮助和指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史实表明，旅俄同胞在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中起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旅俄同胞中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旅欧华人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的活动与旅欧党组织的建立

海外同胞参与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其最有成效、最具影响者，为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旅欧华人先进分子。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旅欧华人的创建党的活动，是从对建党理论的探索开始的。从1920年8月开始，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和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建党思想；周恩来、赵世炎等在从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主张。旅欧华人先进分子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迫切需要。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旅欧华人先进分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苏俄建党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中国要建立一个与苏俄一致的党。这个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旅欧华人先进分子建党理论的提出和逐步系统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组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旅欧华人进行创党活动的另一个方

面。在创党期间，由旅欧华人先进分子组织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主要有旅法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

旅法新民学会是由原新民学会赴法留学的会员所组成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的有 18 人，他们大多数居住在法国蒙达尼，并以此为中心，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旅法新民学会在蒙达尼召开会议，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代替原“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会上，蔡和森主张激烈革命，提出要仿效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虽然没有在会上一致通过，但获得许多会员的支持。会后，会员们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研究。与此同时，还积极进行创党的酝酿和讨论。蔡和森与部分会员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世界社等团体的成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在法国旗帜鲜明地成立一个共产党。

工学世界社是由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瓚等人创立的革命团体。原名勤工俭学励进会，1920 年 8 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吸收了新民学会以外的 10 多人参加。九十月间，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会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会后，会员们将主要精力转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方面。

劳动学会是由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等发起建立的

有留学生和华工参加的无产阶级群众团体，成立于1921年春。该会成立后，积极从事旅法留学生的的工作。1921年3月28日，以劳动学会为核心，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是会员。与此同时，劳动学会还积极在华工中开展工作。为了工作的方便，该会将原来的活动中心，由里昂转移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由于学会成员经常深入华工之中，与华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旅欧华人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旅法华工的结合，从而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这就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作了政治上与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三四月间，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由在国内入党的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和到法国后才入党的刘清扬、周恩来5人组成。旅法小组成立后，为推进党的事业，一方面继续在留学生和旅法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筹备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一方面积极参与和领导旅法华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实现党对旅法华人的政治领导。

二八运动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和领导的第一次群众斗争。1921年1月，主管旅法留学生事务的华法教育会宣传同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经济上之援助。”中国驻法公使馆中断发放给勤工俭学生的救济金。中国驻法公使陈篆根据北洋政府关于将“无力自给者”分别遣送回国的指令，成立了勤工俭学善后委员会，要把

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生存权与求政权。经过斗争，驻法公使馆被迫答应延长发放救济金的时间，华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周恩来曾把这次斗争的经过写成长篇通讯寄回国内发表，揭露中、法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欺骗与镇压。

拒款运动是旅法小组参与和领导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群众斗争。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和交通系头子吴鼎昌到巴黎，以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条件，向法国借款。周恩来获悉后，立即同赵世炎、蔡和森等一起，联合巴黎各华人团体，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6月30日，旅法华人召开了300余人的拒款大会，一致通过了要求取消借款的决议。在群众的压力下，中、法之间的借款谈判被迫改为秘密进行，并于7月25日草签了借款合同。周恩来等及时地予以揭露，旅法华人团体纷纷发表通告、通电，宣布：“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①8月13日，旅法华人召开了第二次拒款群众大会。会上群情激愤，当场狠狠地痛打了陈篆的代表王曾恩，迫使他代表陈篆在反对中法借款的决议上签字，拒款斗争取得了胜利。

旅法小组参与和领导的第三次群众运动，是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拒款运动结束后，中国驻法公使馆与法国当局串通一气，实行报复。公使馆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

^① 1921年9月30日天津《益世报》。

持费，取消送勤工俭学生入校的许诺。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就学问题而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也以进行入学考试为借口，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与此同时，又从国内招收了100多名豪绅子弟入学。于是，引起了勤工俭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成立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展开了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9月20日，125名勤工俭学生组成先发队，展开了进驻中法大学的斗争。陈策与法国当局串通，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拘禁了这批学生。周恩来、王若飞等设法营救，未获成功，除赵世炎等少数人逃脱之外，蔡和森、陈毅等104人被押送回国。这次斗争终于失败。

旅法小组参与和领导的这三次群众斗争，锻炼了旅法华人。经过斗争，不少旅法勤工俭学生认识到：不推翻现存的黑暗社会制度，中国就永远没有出路；当务之急不是谋个人出路，而是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因此，觉悟了的旅法爱国青年，开始把斗争的目标，从单纯争取求学权、生存权转变到反抗罪恶之源的社会制度方面。一大批旅欧的爱国青年在群众斗争中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就为旅欧华人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后，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得到中央通知，知道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此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与党中央保持着密切的组织联系。1922年春，中共旅法小组进一步发展与加强。二三月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相继由

法国迁居德国柏林，与已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会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党小组——旅德小组。旅欧党组织分别由赵世炎、张申府担任驻法、德的通讯员。1922年7月，廖焕星由国内启程赴德国时，中共中央给他两封介绍信，一封给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赵世炎，一封给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这说明，旅欧党组织与党中央已有正常的密切的组织联系。

1922年底，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统一组织了中共旅欧支部。第二年春，在旅比利时的勤工俭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他们的活动也属于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是旅欧华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协调和统一了旅欧华人各方面的革命步调，从而大大推进了我党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旅日中国留学生也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活动较少，影响不大。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俄国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中的一些成员，对于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桥梁纽带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中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国外侨胞的这些活动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对华侵略干涉的失败 和我解放战争的胜利

翁 仲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出钱出枪出主意，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殖民地政策又动员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对它进行反抗和斗争，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失败，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战后美国对华侵略的过程及其特点

从 19 世纪末起，美国就以极大的兴趣倾注于远东，尤其是中国，但限于当时的实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只能以“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一道在中国分享特权。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与中国的抗日战场发生了密切的

联系。它当时在远东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打败日本，其后粉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清除出去，同时借英法陷于欧战之机，将英法在远东的势力抑制到最低点，从而由美国来支配中国，控制整个远东及亚太地区。由此，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基本对华政策。所谓“大国”政策，就是让中国（以蒋介石为核心）与美苏英同为世界四大强国，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远东局势的“警察”。罗斯福曾特别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①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国”政策和对中共无法以武力消灭的事实，产生了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并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干涉深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所曾达到的程度。它对中国的侵略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4年多时间里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胜利到马歇尔调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中国战时的盟友，其对华政策面临三种抉择：“（1）完全摆脱一切牵连；

① 韦尔斯：《影响历史的七项决定》第186页（纽约，1956年版）。

②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

(2) 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3) 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①美国没有采取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又不敢采取，因此，美国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即对中国实行反革命两面政策，一方面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另一方面高举“和平”、“友谊”的旗帜，以“调处”为名，使国共双方在妥协基础上联合，达到不战而控制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美国采取的实际行动是：

(1) 支持蒋介石单独受降，帮助蒋介石占领阵地，与蒋介石共同利用日伪军抵制中共。从1945年12月22日到1946年6月底，美国运送国民党14个军共41个师，另外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54万多人到内战前线。从1946年1月到6月，美国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军队25个师，训练国民党军队15万人。美国还派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来中国，渗入国民党各部队进行控制，协助指挥国民党军队打内战。美国驻华军队，协助国民党防守战略要点和交通线，驻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等地的9万多美军均参加了行动。

杜鲁门曾回忆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

^① 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为公布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

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①

(2) 延长《租借法》，递交《军事援华法案》，以援助国民党。按《租借法》规定，美国给盟国的租借物资只供战时打击共同敌人之用，战争一结束，军事援助即应停止。8月21日，杜鲁门宣布停止向一切盟国运送“租借”物资，包括英国、苏联，但对中国例外，自1945年9月起，一再延长。据杜鲁门自供，1946年1月到6月，美国援蒋物资达13.35亿美元，为抗战期间援华物资的两倍。1946年6月14日，得到马歇尔支持的贝尔纳斯国务卿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军事援华法案》，这一法案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蒋介石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旨在使助蒋内战合法化。

(3) 马歇尔使华，进行“调处”活动。在开始阶段，马歇尔不得不以“公正”面貌出现，以欺骗中国人民，然而，马歇尔的“调处”方针是很明确的。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提出，“如果蒋委员长不作合理让步，而使政治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放弃支持委员长，接着来的悲剧性的结果，中国分裂，俄国人得到满洲的权利。两者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目标归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马歇尔）是否能继续支持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

委员长运兵到华北，而这样做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咽下它的尊严和政策。”杜鲁门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或蒋介石不肯作出“合理的让步”，即使责任只在蒋介石，美国政府只能放弃调处政策，而不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继续支持。^①

马歇尔调处最终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一面援蒋，一面又想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这种政策其本身的内在矛盾。1947年1月29日，美帝国主义抛弃了其伪装公正的假面具，宣布撤离其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退出“调处”，采取了更加公开的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4) 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和协定。1946年11月，美蒋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之后，又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中美海军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铁路交通和内河航行权等，直至任意屠杀、奸淫、侮辱中国人民而不受任何惩罚。

第二阶段，从马歇尔调处失败到1948年上半年。

当时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已不可避免，美国必须在进退之中作出抉择。这时，美国的决策者们把目标明确定为：“尽力阻止中共统治中国”。其实际行动是：

^①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VⅡ，第761-770页。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347页。

(1) 策划拉拢扶植第三势力。这一做法是美国对华总政策的组成部分。马歇尔退出“调处”后说：“我最后的希望是第三方面或许能觅取某种和解的基础，那样比由美国人进行调停更可取得多，因为那将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①他还向蒋介石说：“这第三方面的出现是目前局势中唯一的希望”，应“尽量重视他们，作些让步以建立他们的威信”。^②美国企图利用第三势力，拉拢他们参加国民党的“伪国大”及其政府，幻想为国民党政府增加一点民主政治的色彩，从而达到孤立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就范的目的。为此，马歇尔抓住和中国小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交谈时的一切机会，强调小党派团结起来并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势力的必要性，并督促蒋介石促成小党派的联合以形成一个自由派政党。马歇尔离华后，司徒雷登又继续了他的工作。利用每一个机会强调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认为“中国政府只有经由这种行动，才能成功地迎接中共的挑战，才能防止浪费自己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运用美国的援助”。^③当事实回答了他们的失败之后，他们又寄希望于青年知识分子，然而1947年3月8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总会的行动，又一次宣告了美帝的失败。

(2) 重新放宽运送军火的限制。1947年5月26日，

① 《马歇尔使华》第356页。

② 《马歇尔使华》第362页。

③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美国国务卿正式发出指示，取消1946年7月29日关于向中国运军火发放许可证的禁令，允许中国政府在美国军火市场进行“正常商业性采购”。同年底至1948年春，美中双方又多次签订合同，美国同意将“剩余”弹药和战斗物资售让给中国。^①

(3) 加强美军顾问团并扩大其权限。顾问团的工作从原来在高层次充当“顾问”，逐级向下延伸，不仅向蒋介石提供关于作战的意见，而且监督美援军用物资的使用，为国民党训练军队，直至直接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讨论。顾问团的人数也从原来的750人扩展为1236人。

(4) 1948年4月2日正式通过包括军事援助的《援华法》，继续供给蒋介石政府4.63亿美元之所谓“经济与军事援助”，其中1.25亿元为“特别赠款”，名义上由中国政府自择用途，实际上则供给国民政府采购军需用品和装备。《援华法》的通过，表示美国公开援蒋的合法化。

(5) 魏德迈来华，其任务是“建议适应美国的全球计划，并以此为基础，予目前中国政府以有条件的监督与援助”，^②以便进一步援蒋内战，并借此获得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国。

第三阶段，从1948年下半年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

在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对是否继续援蒋产生了动摇，并考虑逐步从中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992—999页。

② 194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国内战中“脱身”，但又不甘心，遂形成了把大陆与台湾分割开的政策思想，把原来“阻止中共统治中国”的政策目标改变为“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阻止中共取得台湾”。这一阶段的实际行动是：

(1) 继续扶植“第三种”政治势力，包括国民党在华南等地区的地方势力，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组织反对派，以破坏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抗衡。

(2) 唆使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以图取得喘息机会，重整兵力，卷土重来。由于美国不敢公开出兵对国民党政府予以军事保护，于是策动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1月8日照会苏、美、英、法要求4国进行“调解”。苏联政府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认为“居间调解是不适宜的”，“恢复中国之作为民主的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无需外国的干涉。”^①英国政府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出头。美国只得以“调解”很难“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为辞表示“拒绝”。之后，美国又指使澳大利亚外长提出由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

(3) 敌视新中国，在外交承认问题上举棋不定。南京解放，要不要在外交上承认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了美国决策者的面前。美国为了“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向他们提供

^① 《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备忘录的答复》，见1949年1月20日《东北日报》。

一个商讨与美国关系的机会”，^①决定让司徒雷登留南京。司徒雷登声称，他将告诉中共领导人：如果中共学苏联，建立一个“极权国家”，就将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将援助中国的反抗运动，“用我们拥有的一切资源重新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②6月16日，杜鲁门指示美国国务院，对中共要“极其谨慎，不能对共产党人表示任何软弱”。^③当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时，艾奇逊给司徒电，称“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④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艾奇逊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⑤并表示美国将“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新中国建立后，10月12日，艾奇逊给美驻外使馆指示，称美国目前不想讨论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12月，艾奇逊处心积虑地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他对印度大使表示：“民主国家应当一致在承认问题上实行国际性的延缓行动。”^⑥当英国准备与国民党政府正式断交并承认新中国时，艾奇逊又对英国大使说：“我们不相信急急忙忙的承认会给承认这一

①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五十年》。

②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中英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41页。

⑥ 《杜鲁门文件》，1949年12月6日《与印度大使谈话备忘录》。

方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所以，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做，美国将不仓促行事。”^①

(4) 建立“防御体系”遏制新中国。新中国的建立使美国统治者感到面临危险，艾奇逊宣称：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蔓延”。为了遏制新中国，美国竭力制造了一个对新中国的包围圈，拼凑了一支妄图抵消新中国在远东影响的“平衡力量”。他们一方面大幅度地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地区对付共产主义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前，第一批给越南保大政权的援助已在途中。

(5) 阴谋策划分割我国领土台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其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削减对大陆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把重点转移到台湾；争取国际支持，实现台湾“托管”等，但这些方案都没行通。1949年10月间，美国政府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于是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当天，美国军方立即要求艾奇逊进一步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加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5月3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交给艾奇逊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应当在台

^① 《杜鲁门文件》，1949年12月6日《与印度大使谈话备忘录》。

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台湾“中立化”。驻远东的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考虑美国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执行的是区别于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它除了继续使用旧的殖民主义手段（即直接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经济控制）外，还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间接的方法来维持或扩大其殖民统治，因而更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在政治上标榜“和平”、“民主”、“友谊”；在经济上标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在军事上标榜“援助”，“不干涉中国内政”；在文化上标榜自己“办教育”，“推广慈善事业”，“加深友谊”。然而，这一切，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①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

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来看，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对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0页。

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争取美国中立。但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对美国扶蒋溶共、企图不战而控制中国的政策，保持清醒的认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进行严正的批评、交涉和坚强的抵抗；另一方面，在美国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他与我合作。具体表现为：

针对美蒋加紧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力争和平、民主，同时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对美国的所作所为，中共及时进行了揭露。1945年8月15日朱德为受降问题致美英苏三国说帖、11月3日新华社发表《美军武装干涉我国内政真相》、11月4日朱德向魏德迈抗议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1月6日新华日报社论《美军应立即停止参加中国内战》，指出了美国正在积极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要求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重申为了保持中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希美国立即采取妥善步骤，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均由美方负责。

针对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表示欢迎。对于马歇尔在调处前期的一些活动，取得的最初成果，如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五项协议的达成，《整军方案》的出台，接收赤峰和多伦的公允解决，限定国民党向东北运兵数额等，中共均给以肯定的评价。中共在战略上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术上承认马歇尔调处的“公正”，从而

在谈判中为自己争取了有利的地位。在马歇尔调处的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愈来愈需要加强中国的实力地位，因此加紧援蒋内战。中共对此加以批评和谴责，指出：“美国政府有两个政策，一个是援蒋内战，这是基本的一个，一个是劝蒋停战，这是陪衬的或装饰的”，由此，蒋介石“接受了美国的大炮而轰走了美国的鸽子。”^①虽然如此，中共对美国仍然力争，只要美国尚未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就不和他弄僵。至于对马歇尔本人，中共还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留有余地。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恩来与马歇尔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使之在客观上产生有益于中共的政治效果。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批判美国的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揭露和抗议美国的全力援蒋内战政策，组织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进行独立自主的斗争。具体表现为：

针对美国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以及鼓吹的“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论调，毛泽东提出了3个主要的理论观点：（一）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也必

^① 1946年8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

能克服战争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时，“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三）“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②“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③毛泽东的上述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反对了那种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不敢斗争的错误思想。

针对美国的扶蒋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给予揭露和抗议。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援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④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时，又指出美国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的力量，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0—10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9页。

③ 同上。

④ 1946年6月17日《解放日报》。

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毛泽东强调：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周恩来代表中共及解放区 1.4 亿人民，于 9 月 14、15 两日，连续致马歇尔备忘录两件，反对美国对国民党援助，致使中国内战空前扩大，并通过马歇尔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美国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冻结剩余物资，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12 月 28 日，周恩来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政府这种露骨的援蒋内战政策，其目的在想压服中国人民，将中国完全变成美国附庸。”“从最近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航空协定及美国军事顾问团与各种军事训练的协定看来，即可证明蒋介石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的行径是与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相适应的。不管杜鲁门如何强辩，说美国政府‘避免牵入中国内争’，实际它已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鼓舞者。”^①这种揭露和批判，实际上又动员了人民起来斗争。

1946 年底，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威廉士·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此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在中共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全国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

^① 1946 年 12 月 28 日《解放日报》。

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爱国民主运动磅礴全国之时，中共中央又及时地发布了《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蒋运动的指示》，指出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这标志着全国性的高潮已接近。中央要求全党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美帝国主义要和蒋介石共同统治中国，蒋介石要独裁，而中国人民一定要反帝反封建，这三条都是确定无疑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革命高潮就不可避免。中国时局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发展。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一方面继续与之开展斗争，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反对美国援蒋内战及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美国援蒋政策的动摇，注意在对美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尽可能减少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194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美帝对蒋介石的每一援助，要动员国内外人民起来反对，来阻止或减少他的援助。利用美帝内部及美蒋之间的每一矛盾，来动摇和推迟他的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既便于逐渐提高人民觉

悟，形成反美斗争力量，又利于孤立敌人，各个击破。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蒋介石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确定了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一）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必须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决议》还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减少。（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确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新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一方针的目的是甩开历史的包袱，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不急于得到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承认，不急于和他们建交，而是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加以清除，以免留下他们阴谋活动的余地。

为了贯彻上述基本原则和方针，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下各项政策和措施：

在军事上，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趁美国举棋不定，集中主力，先东南沿海，后西南、西北，大纵深迂回，抢占

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进军战略。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很快解放了南京。5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意见》，指出：第二野战军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28日，军委又发出《关于预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对策》，其要点是：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力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准备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袭击和扰乱我后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正确部署下，自渡江战役起，半年内，连下上海、青岛、福州、广州等地，完成了上述战略任务。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扩大和巩固反对美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针对美蒋的和平阴谋，1948年7、8月，中共中央就曾多次告诫全党，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国民党统治区一部分人民中尚存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发动假和平运动，以便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中央指出，在这一活动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之内，避免彻底的改革。也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倒蒋之后会有和平。因此中央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应笼

统地反对和平，而应根据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不断地揭露美蒋阴谋，有说服性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使群众不受骗，并利用各种矛盾分化反动统治者，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正的和平运动。中央强调，必须注意，对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我们就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党的原则是既要保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又要保证一个包括全民族极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揭露了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严正地向“民主个人主义者”敲起了警钟，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共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6月和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扩大了统一战线，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在外交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即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个原则反映在处理外交关系的具体政策上，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

民对待。但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对一切外侨和外国领使馆人员，首先是英、美外交人员进行保护；在军事上不挑衅，对外国军队和军舰，不主动进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避免同外国发生冲突，避免扩大事端，不给他们以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鉴于当时大多数干部和党员都来自农村，缺乏外交经验，因此，在对外事务方面，党中央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外交决策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负责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联系，尽管我们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但不拒绝同他接触，尽可能地坚持了对美政策的灵活性。毛泽东于4月28日电示总前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交的问题。过了两天，中共又通过《李涛声明》把这一精神明告给美、英等西方国家。为便于和司徒雷登接洽，中共还派出了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的黄华出任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并特别指示他，接洽时不要拒绝司徒雷登要想继续出任驻华大使的愿望。当得知司徒雷登欲赴北平谋求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会晤时，中共又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于6月16日写信给司徒雷登，并由黄华于6月28日会见司徒雷登，向他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同意他去北平的意见，并表示，如去，一定能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此行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了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表明了中共外

交政策的基本倾向。

在思想上，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美国《白皮书》展开了批判，从思想上对美帝国主义长期散布的恶劣影响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同时也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所抱的幻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也对《白皮书》展开了广泛评论，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对《白皮书》的批判，加强了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同美国的影响拉开了距离，进一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在解放战争各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其所以正确，根本之点在于它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愿望。中共通过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揭示了美国侵略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揭示了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欺骗性和侵略性，从而教育了人民，动员了人民，终于打败了美蒋反动派，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任群众，紧紧

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战胜任何困难的。

黑龙江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元 仁 山

黑龙江省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根据 1896 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20 世纪初沙俄在黑龙江修筑中东铁路，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黑龙江与外界的通商贸易急速发展，哈尔滨、齐齐哈尔等新兴城市建立，并相继出现了经营制油、制米、制粉、制材、玻璃、铁工等民族工商业，全省知名的一些“老字号”如双合盛、同记等均在此期间创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趁帝国主义之间忙于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之机，有了新的发展，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如哈尔滨市油房由大战前的 3 家，增加到 18 家。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14 年之久，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建立其殖民地经济体系，全省重要的企业和较大的工厂、商店都被敌伪所独占。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伪政权对民族工商

业的原料、商品实行定量配给，限价出售，民族工商业者失去了生产和贸易自由，只是靠给敌伪加工和出售配给品来勉强维持。如果民族工商业者稍有违反敌人的经济统制政策，就以所谓经济犯、暴利犯、政治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轻者罚款，重者扣押拷打、服劳役，直至折磨致死。黑龙江民族工商业倍受摧残，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黑龙江省各地相继解放，成为新解放区。解放后，在现黑龙江省境内曾有五省一市^①，在解放战争时期，五省一市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45年光复到1956年末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对私人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植和发展的政策，使其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服务；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私人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使其走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轨道，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服务，为抗美援朝战争

^① 五省一市指黑龙江省、松江省、嫩江省、合江省、绥宁省、哈尔滨特别市。黑龙江省成立于1947年9月，1949年5月与嫩江省合并，称黑龙江省；1954年8月与松江省合并，称黑龙江省。松江省成立于1946年5月，1949年5月与合江省（成立于1945年9月）合并，称松江省。嫩江省成立于1945年11月，1947年初与黑龙江省合并，称黑龙江省；1947年9月恢复嫩江省；1949年5月与黑龙江省合并，称黑龙江省。绥宁省成立于1946年4月，同年9月改为牡丹江地区；1947年9月改为牡丹江省，1948年7月撤消。哈尔滨特别市成立于1946年11月，1949年5月划归松江省。

服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其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

(一)

1945年10月，东北局要求各省市“迅速接收尚未接收之各级政权，开展群众反对汉奸特务运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根据这一指示，在黑龙江省建立了以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根据地，并开展了土改运动和反奸清算斗争。在清算斗争中，党及时地纠正了侵犯民族工商业的错误，实行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1. 反奸清算斗争和“砍挖”运动中保护民族工商业

五省一市的反奸清算斗争，从1945年12月开始到1946年末结束。前半年，由于政策界限不够明确，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进行宣传教育不够，发生了一些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有些工商业者万分惊恐，逃往外地，有的转移资金和财产，有的坐吃山空，等待挨斗，因而影响

了民族工商业经营，影响了市场。鉴于这些情况，从后半年开始，一方面向群众进一步讲明反奸清算斗争的目的、意义以及斗争范围和斗争方法；另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向民族工商业者讲清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鼓励他们安心经营、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完成支前任务。彭真、张闻天等同志分别在哈尔滨和佳木斯直接领导反奸清算斗争，很快制止了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收到较好的效果。他们明确提出：在城市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的目的是清理敌伪残余，没收汉奸、特务、恶霸的工厂、矿山、商店及其财产。对其它配给店和加工业，只是没收其不应取得的不义之财，限制其过于苛刻的额外剥削，对其不能采取消灭政策，对一般工商业者不清算。经过政府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保护民族工商业，不仅使原有的民族工商业者能够安心经营，而且增加了新的工商业户，逃往外地的资本家也回来了。如佳木斯市私人工商业由解放前的 810 户，到 1946 年 12 月发展为 2836 户，逃走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 9 名资本家重返该市，重整旧业。

1946 年 11 月，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后，在全省很快掀起了以“煮夹生饭”为特征的土改运动。在土改运动中，从 1947 年 5 月到 1948 年初，为了解决农民在生产 and 生活中的困难，开展了“砍挖”运动，即砍倒地主、大恶霸，挖出地主隐藏的金银等财物。在“砍挖”运动中，大批农民进入城镇抓地主，挖浮财，封闭了地主经营的工厂、商店，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地主兼工商业者或工商业者兼地主及与

地主有牵连的工商业者终日不安，怕工人、店员起来斗争，放松了厂店的经营管理。有些资本家则缩小经营、冻结资金、分散隐藏资金、招“好汉股”或逃往外地，私人工商业户数减少。如齐齐哈尔市被斗的工商业户共有 112 户，占全市私人工商业户的 4%，被侵犯利益的工商户占全市私人工商业户的 2.4% 左右。在佳木斯市，私人工业 1947 年 9 月共有 806 户，到 1948 年 1 月减至 683 户，下降 15.3%；私人商业 1947 年 9 月共有 1647 户，到 1948 年 1 月减至 1546 户，下降 6.2%。

上述侵犯工商业利益的倾向，到 1947 年 8 月开始得到纠正。各省委和市委发出指示：凡农民进城抓人，没收底产，事先要经县委同意，并报省委批准；对工商业者兼地主，以工商业为主的，只没收其土地；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其在城市的工商业一律不动；凡在土改前从事正当工商业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护；对过去有错误，而现在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的工商业者，除使其政治上坦白外，不能借故没收其财产或任意进行罚款；对于一般住在蒋管区的正当工商业者，保护其继续经营。各地贯彻这些指示精神，制止了农民进城随意封闭厂店、侵犯工商业的现象，并且在纠偏工作中，对侵犯的工商业，政府采取折股、购买、出租、退还、代营、减税或免税等方法退补。因而私人工商业得到保护，并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恢复和发展起来。

2、扶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黑龙江地区解放后，民主政府没收敌伪资产和官僚资本，清理敌伪储存和散失在各地的武器、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建立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经济生活，供应军需物资，政府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扶植民族工商业。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并规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此后，黑龙江地区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帮助工商业者解决原料、动力、运输、产品销售等方面所存在的困难，鼓励他们积极经营，为战时经济服务。

第二，保护工商业者的生命财产，允许工商业自由贸易，简化办货路条手续。

第三，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除了少数出厂税、面粉税、酒税等外，只收营业税，取消县与县之间的过境税。

第四，对于有发明创造的厂家，政府酌予减税、免税或者给予一定时期的专利等特权。

第五，根据战争的需要，对有些工厂给予贷款或加工任务。

东北民主联军从1947年5月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以后，私人工商业者人心渐趋稳定，经营积极性提高，同时部队迅速扩大，需要大量军需物资，因而铁工、

火锯、纺织、洋铁、杂货等业有了迅速发展。如齐齐哈尔市私人工商户由解放前夕的 1640 户，到土改时已发展为 3547 户，被服业增加 86.8%，粮米加工业增加 45.8%。牡丹江市解放前私人工商业共有 53 家，职工 188 人，到 1948 年 11 月发展为 1490 家，职工增加到 3692 人。哈尔滨市从 1946 年初到 1947 年末，私人工业由 2784 户，发展到 12631 户；私人商业由 3563 户，发展到 89951 户。佳木斯市 1948 年 1 月末私人工商业共有 2002 户，到同年 11 月末发展到 3146 户，增加 57.1%。

3、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解放初期，黑龙江地区因处于战时经济状态，金融不统一，财政极为困难。政府为生产军需民用产品和解决政府机关的财政困难，采取了公私合营、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委托私商代销等形式，组织生产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管理，这就产生了早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

合股制，也叫公私合营。如 1946 年 3 月，牡丹江军区军工部和牡丹江私营天发东铸造铁工厂合资办厂，厂名定为“公私合营天发东铸造厂”，军工部出资 300 万元^①，

^① 解放战争时期，在黑龙江地区同时使用多种货币，即满洲中央银行券（俗称伪满币）、苏联红军票（简称红军票）、东北银行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和 12 种地方纸币。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使用东北币、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东北币使用到 1951 年 3 月；1951 年 4 月至 1955 年 2 月使用旧人民币，旧人民币与东北币的兑换率为 1: 9.5；从 1955 年 3 月开始使用新人民币，新人民币与旧人民币的兑换率为 1: 10000。由于在解放战争时期涉及的货币较复杂，在资料中又没有明确表示币名，因此无法在此稿中注明币名。

利用私方的厂房设备生产出手榴弹壳，产品由军工部包销，军工部派去干部当经理，私方出副经理。这是全省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48年6月，在哈尔滨组织了公私合营企业公司，到11月份资金总数达350亿元，其中公股占57%，私股占43%。企业公司下辖三个分公司，三个行业联合公司，并经营汽车修理厂和哈尔滨百货商场，总理由政府派去的干部担任。据1946年7月统计，佳木斯市有公私合营厂店31家。

加工制。加工制是在国营经济的统一计划的指导下，私营企业为政府承担加工任务，其原料由政府供给，产品交政府，私人企业只获得加工费。据哈尔滨市1948年9月份的统计，在全市31个行业中有2700家私人企业承担加工任务，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9%，总资金为270亿元，占全市私营工业资本的50%。到1949年末，哈尔滨市私营工业为政府加工订货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9.34%。

订货制。订货制是政府委托私营企业生产某种产品，并按预订数量包销其产品。如哈尔滨市以订货的形式让私营企业生产出肥皂、牙刷、牙粉等产品。

代销制。代销制是在政府统一安排下，私营商业承担某些商品的销售任务。如哈尔滨市，1946年9月市场粮价急剧上升时，北满贸易公司和民生公司通过10家私营商店抛售大量粮食，及时煞住粮价上涨风，打击了投机商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违法行为。

4、提倡劳资合作，实行分红制度

经过反奸清算斗争，工人和店员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积极参加工会组织和店员联合会，在政治上要求翻身，在经济上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实行分红制度。由于资本家沿用旧的经营方法，不解决工人合理的要求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人的要求过高，一度造成了劳资关系的紧张，直接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和政府提出劳资合作、发展生产、实行分红制度的方针。一方面教育资本家积极经营厂店，提高盈利，改善职工生活；另一方面教育职工努力生产，实行10小时工作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工资，同时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东北局经过在哈尔滨市老巴夺烟厂和同记商场的试点，确定从1946年7月起，在私营企业实行分红制度。实行分红制后，职工的工资由工会代表与私方合组的委员会重新评定，工人和店员参加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分红一般四六分，即东六西四（资本家分60%，职工分40%），个别的对半分。如哈尔滨市天兴福第四制粉厂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作分红契约，规定从纯利中抽出12%为奖励金，剩余按东六西四比例分红。哈尔滨市同记商场在制定劳资分红制度时，规定把利润的9%作为奖励金，剩余劳资各分50%，并且让店员参加商店管理。实行分红制，减轻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仍有利可图，使劳资双方都关心生产。

此后，各私营厂店又普遍建立劳资协商制度，劳资双方共同决定辞退工人、店员，进行审帐工作，讨论增减工资等问题。在实行分红制过程中，也出现过片面强调工人

福利，制定过高的工资而影响生产发展的现象。党和政府从1947年末开始纠正了这些现象，并保障了资方的合法经营权。

5、加强管理，取缔惩办投机倒把

1948年7月下旬至8月3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纲》指出，东北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等5种成分构成。今后应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依靠群众的合作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根据上述精神，黑龙江省积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此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强管理，制止其投机倒把活动。

解放后，由于金融不统一，货币发行过多，物资奇缺，政府财政困难，私人工商业者乘机渔利，使市场物价持续处于波动状态。1948年东北各地相继解放，军需民用物资增加，市场扩大，大批私商乘机倒卖粮食；较大的杂货业、食品业的私商跑老客，大批倒卖食盐、豆油、豆饼和布匹；许多私营工厂囤积或倒卖原料，参与商业活动；使物价波动，市场混乱，情况更趋严重。因此，东北全境解放后，从1949年1月开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

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工作，公布了工商管理暂行条例，对经纪人（交易员）和私人工商业进行了一次审查登记工作，取缔并严惩了投机倒把活动。仅佳木斯市就处理严重违法案件 40 余件。通过这次整顿工作，使大多数工商业者转向正常的经营，稳定了市场物价。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使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使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四面八方”方针，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1、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扭转私人工商业萧条状况

从 1949 年 4 月开始，黑龙江私营工商业出现萧条、停滞现象，到 7 月更为严重。企业的废业、停业数量急剧增加，以 5、6 月份为例，佳木斯废业 612 家；哈尔滨市私营工厂废业 393 家、停工 2602 家、半停工 630 家，占私营工厂总数的 56.7%；齐齐哈尔市在 1949 年上半年歇业情况也较严重，其中纺织业的 14.6%、卷烟业的 36%、皮革业的 12.8%均处于歇业状态；6 月份，牡丹江

市私人企业减少 82 家。私营商业的销售量也下降，火碱、颜料、针织品、皮革等产品降价也卖不出去。私营工商业者也不积极经营，有的分散资金，缩小经营规模；有的在暗中把资本转移到沈阳或关内；有的拍卖机器度日。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由于东北全境解放，大军进关南下，东北局所属机关及其附属企业迁至沈阳，因而供求有了变化。许多军工军需工业产品销路锐减，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销售量也减退。如哈尔滨市在 1949 年上半年，4000 多家与军工军需有关的工业中，有 63% 停工、废业或半停工；被服、纺织、军鞋等 19 个行业停工或减少加工任务；车辆制造、印刷、制板等 8 个行业萎缩或者停滞。

第二，由于沈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交通恢复，大批优质、廉价的轻工商品涌进黑龙江，使与之相比低质、高价的本地产品的市场缩小。

第三，由于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逐渐发展，私营经济所占比重相对减小；货币回笼，国营商业扩大零售，使私营经济的活动范围缩小，零售额下降；在工商管理中限制过严，处罚过重，因此资本家得不到暴利，欲求新的生意环境，并且想法摆脱限制，消极对抗。

第四，劳资关系逐渐紧张，公债负担过重。劳资关系紧张，是由于有的工人和店员过高地要求提高工资、加班费，改善福利待遇，有的企业把奖励金变成分红，有的要半年分红一次，因而加重了私营工商业者的负担。由于私营工商业者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遵守劳资合同，延长

工时，随意解雇工人，影响了工人店员的生产品积极性。私营工商业者的公债负担也过重，如佳木斯市私营工商业担负的公债占私营企业总流动资金的30%以上。由于这些原因，不少私营工商业资金不足，周转困难。

第五，干部和工人中，对私营工商业存在着任其自生自灭，“挤垮一个少一个”的“左”的情绪，有的甚至随意征用或占用工厂、仓库，不付代价。

为扭转上述局面，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私营工商业者深入宣传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在资金、原料、运输和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除修改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的不合理管理条例外，主要是调整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引导私营工业面向农村，生产农村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国营企业把一部分加工任务转给私营企业，银行拨给必要的贷款。在军工军需任务大减的情况下，允许有些企业转业。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主要经营布、粮、油、盐、煤、煤油等6种商品，但其中少部分也让给私商收购或推销。国营商业把大部分百货、土产的销售和收购让给私营商业。如3000多种百货品种中，国营商业经营1/3，私营商业经营2/3。国营商业又适当增加了对私营商业的批发量。为了处理好劳资关系，签订或续订了企业的劳资集体合同或劳资契约、行业的劳资集体合同，并且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执行合同检查委员会”，监督实施劳资集体合同。1950年下半年又实行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如松江省到1951年末，签订或续订企业劳资集体合同9件、行业劳

资集体合同 45 件、劳资契约 3 件，45 家企业和 41 个行业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政府又制定了劳动法；改组或改选了各地工商联组织；加强了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企业中发展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通过实行这些办法，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职工的生活，及时解决了劳资纠纷等问题。贯彻劳动法，体现了平等、民主、劳资两利的新的劳资关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到 1951 年末私营工商业又开始发展。齐齐哈尔市到 1951 年末私营工商业户数发展到 4633 户（不包括富拉尔基、昂昂溪区），比 1949 年增加 9.2%，私营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提高 170.6%，私营商业零售额比 1949 年提高 1.3 倍。哈尔滨市 1950 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64.7%，到 1951 年占 70.7%，提高 6%；1951 年私营商业销售额比 1950 年增长 51.8%。

2. 开展“五反”运动

在全省开展“五反”运动之前，齐齐哈尔市从 1951 年 11 月开始配合“三反”运动，在工商界开展了反拉拢、反行贿运动。在运动中，共收到近 800 份坦白书，查出奸商周龙川盗窃国家财产 20 亿元的巨案，依法逮捕了 26 名奸商。

1952 年 1 月 26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后，从 2 月到 9 月在黑龙江省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

运动。“五反”运动先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较大城市进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纷纷检举揭发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事实，许多私营工商业者也坦白了过去所犯的违法行为。如哈尔滨市私营聚兴成铁工厂在1950年为部队加工油罐时偷工减料，致使油罐漏油，损失14.4亿元（东北币），贿赂干部非法获利15055万元（旧人民币，下同）。齐齐哈尔市50家纺织业从1949年开始承担加工任务，3年来共盗窃国家45614斤洋纱。佳木斯市据1952年3月统计，在129个行业里，2763户私营工商业中查出偷税漏税322亿多元，盗窃国产财产215亿多元，偷工减料67亿多元，行贿29亿多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9亿元。

“五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阶段后，按照中央提出的“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对私营工商业户进行核实定案，并仿效北京市的做法分5类进行处理。据1952年6月25日东北局的统计，哈尔滨市私营工商业违法所得总值达1900亿元，占所得总值的40.1%，在私营工商业总户数中守法户占10.48%，基本守法户占71.25%，半守法半违法户占14.62%，严重违法户占3.15%，完全违法户占0.5%。在定案后处理时，贯彻“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

在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小城镇，政府要求私营工商业者开展自我批评，改正过去所存在的“五毒”活动。对

“五反”运动中曾出现的逼供信、打骂、体罚等现象和计算违法所得时偏高等问题，黑龙江省委和松江省委按照中央制定的政策及时给予了纠正。

“五反”运动后，出现了私营工商业停业或要求废业的现象。有的私营工商业者认为国营经济发展了，私营经济没有前途，因而未经批准，折卖家底自行废业；有的怕“树大招风”，化整为零，要求缩小经营。据松江省对8个市、县的统计，到1952年9月底，废业者617户，要求废业者2000余户。据黑龙江省33个市、县的统计，自1951年末至1952年4月，私营工业总户数的9.03%废业，私营商业总户数的9.95%废业。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制止其错误的做法。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私营工商业：第一，扩大私营商业经销范围，明确私商收购农副产品的品种，以“扩大批发，巩固零售”为指导思想，扩大私商贩运、推销商品的批发；第二，调整批发零售差价和地区差价；第三，调整公私商业网点；第四，对私营工业扩大粮米、机铁、翻砂、弹棉等加工任务，扩大包购包销的范围；第五，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新税法，放宽开业、转业、废业以及兼业的批准。由于政府多方面的努力，1953年上半年情况有了好转，黑龙江省1953年上半年私营经济的零售比重比1952年同期提高21%。黑龙江省和松江省1953年的私营工业总产值为29276亿元，比1952年上升18.6%。

3、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黑龙江成为这场战争的后方基地之一。各级党委统战部和工商联组织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时事政策学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全省各地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提出的号召，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军事加工订货委员会，制定了爱国公约。工商界还组织爱国公约检查组，保证爱国公约的实施。各级工商联组织工商业者为抗美援朝斗争开展捐献活动，仅以4个市为例：哈尔滨市捐款315亿多元，折合战斗机21架；齐齐哈尔市捐献飞机3架、大炮1门；佳木斯市捐献飞机1架、大炮1门；牡丹江市捐献飞机1架、高射炮1门。各地工商业者积极完成军需加工任务，佳木斯市仅1951年11、12两个月就完成了加工粮食304万斤、棉大衣3720件、战士服500套、布袜子1.8万双、背包和手榴弹袋以及子弹袋各1140个、面袋4万条的任务。各地工商界派出铁工、修理工等到前线维修车辆、枪炮，较好地完成了战勤任务，并经常派代表到后方医院开展慰问活动。

在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还深入进行了遵纪守法的政策教育。各地工商联组织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交假帐、补报营业额活动。黑龙江省在一个半月内，即有私营工商业478户交了假帐，补报营业额约7亿元。这一活动，不仅协助政府完成了税收任务，而且制止了投机倒把活动，稳定了市场物价。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到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排挤批发商，改造零售商，扩大加工订货

按国家“一五”计划规定，黑龙江省属于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国家在黑龙江建设的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工程较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重要工程中，22项在黑龙江。由于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就业人员剧增，工资总量增加，许多商品供不应求。许多私商利用这个机会，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尤其是批发商活动更为严重，不少坐商也兼营或转为批发商。如齐齐哈尔市百货批发商启新商店1953年1月至7月卖钱额比1952年同期增加2.4倍。有些批发商的资金周转每月一次还多。批发商急速增加并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调整公私关系和产销关系后，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过大。批发商不仅可以从外地大量进货，而且用出厂价进货，赊帐进货，任意提高批零差价。第二，实行新税法后，私商按自报纳税。第三，由于取消议价制度，私商随意定价，并且由于银行押汇解款，使批发商大为方便。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4年初开始，国营商业加强了

对市场的领导，对私营批发商采取坚决斗争和限制、排挤、淘汰的方针，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控制货源，调整价格，割断工业品批发商与零售商的联系。对在省内短途贩运小土产的私营批发商，根据需要保留一定数量。对私人零售商，由于人多店多，经营复杂，分散面广，并在商品流转中还有一定作用，主要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通过使其在当地国营公司进货等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变为国家的代销店。对私营工业，采取扩大加工订货、包销代购以及公私合营的方针，逐步纳入国家计划之内，使其按照国家要求进行生产，割断私营工业与私营商业的联系。

到 1954 年末，经营主要行业、主要商品的私营批发商已基本上被国营商业所代替，剩下只是经营次要行业、次要零星商品的小批发商和从事城乡贩运的小商贩。全省私营批发商只剩 938 户，比 1953 年减少 1573 户。1954 年私营批发商卖钱额绝对值比 1953 年下降 57.19%。

在排挤私营批发商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盲目排挤和宁“左”勿右的情绪，缺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被排挤的批发商没能及时安排，而且过早地排挤掉了某些城乡之间的小批发商，因而出现了失业现象和城乡物资交流“大通小塞”等问题。又由于对国营经济的发展没有贯彻好中央关于要“踏步”的政策，某些商品的批零差价偏小，地区差价偏紧，加上私营工商业者消极经营，甚至用各种形式抽逃资金，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呆滞、萎缩现象。1954 年和 1953 年相比，私营商业总户数下降 10.69%，从业人员减

少 14.79%，资金下降 18.9%，卖钱额下降 34.23%；私营工业总户数下降 23.15%，职工减少 11304 人，产值下降 43.94%。

在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本省实际，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对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安排，并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对城市私营批发商采取“留、转、包”的方针，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一时无力或暂时无法代替的，让私营批发商继续经营，对已经挤掉的私营批发商，用转业、为国营代批发、吸收录用的办法进行安排。对城市私营零售商采取“总的踏步，着重市场安排”的方针，加强批发业务，改善经营管理，组织私私联营，维持其生活。对城市摊贩进行整顿，停止发展，扩大批销业务，为国家经销、代销。对农村小商小贩，防止排挤、打击的错误作法，除了让其转业外，按行业成立合作小组，逐步转变为供销社的分销店、门市部、售货小组或收购小组。国营商业调整了 1322 种商品的批零差价，调低了 500 种商品的批发起点，在城市和少数县对文教用品、新药、百货、煤炭、茶叶等进行了全行业的经销。哈尔滨百货公司还试行“联购联销小组”的办法，把服装摊贩组织起来。对私营工业贯彻“统筹兼顾，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的方针，国营工业让出一些任务，进行协作生产，国营商业加强加工订货计划工作，合理安排生产任务。在私营工业内部，合理安排生产任务，防止互相排挤或盲目生产，有条件的进行并厂、联营。允许私营工厂自

产自销或转业、下乡组织生产。对有困难的私营工商业，银行给予贷款，使其维持生产。

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9月，不仅扭转了萧条现象，安排了生产，安排了人，而且公私合营企业和行业也有增加。1955年5月全省私营大型工业总值比1月增长37%。到1954年末，在全省私营工业总产值中，为国家加工订货的占79.41%。到1955年9月，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已有42户，其产值占同期私营工业总产值的36%。在零售商的销售额中，经销、代销和批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比重占36.78%。棉布业（包括服装业）已全部为国家经销；烟、酒、茶、陶瓷、燃料等5个行业已全部为国家批销；百货业的主要品种70%以上由国家进货；以新药、茶叶、煤炭、食肉、工业用脂等5个行业为重点，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

2、整顿与健全工商联组织，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对旧工商联已进行改组。在这个基础上，1953年上半年，各市、县改选了工商联组织，并成立了省工商联组织。在这次改选的工商联组织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委员占全部委员的20%左右。各地改选工商联组织后，修改了工商联组织章程，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建立了各种制度，同时派党员干部加强了领导力量。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后，1954年9月成立了黑龙江省工商联筹委会，刘佩芝任主任委员。

各地工商联都建立学习委员会或学习小组，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共同纲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爱国守法觉悟，使其明确自己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地工商联为了协助政府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1953年10月至12月领导工商业者开展了“端正经营作风，防止重犯‘五毒’及纠正各种不良倾向”的自我教育运动。“五反”运动之后不久，在私营工商业者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偷税漏税、投机倒把、偷工减料、抬价压价、以假充真、不服从国营经济领导等违法行为。黑龙江省1953年偷税漏税的私营工商业占全私营工商业的85.2%。通过这次自我教育运动，工商业者批判了自己唯利是图的思想 and 行为，很多工商业者提交保证书，表示要接受政府管理，依法纳税，端正经营作风，积极接受改造。在自我教育运动中，工商业者用自查自报的办法，补交了税款。黑龙江省补收了税款127亿元。此后，工商业者响应政府“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号召，开展了集体纳税，及时入库，提前完成国家税收任务的竞赛，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1955年上半年政府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后，有些工商业者错误地认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变了，过去是限制，现在是“纠偏”；有的工商业者产生了“生产靠工会，安排靠政府，资金靠银行，任务靠公司”的消极依赖思想；甚至有的工商业者提出“三大要求”，即税收低点，利润高点，管理宽点。针对这些问

题，工商联组织对工商业者反复深入地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消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旧习。从这些事实中，各地工商联组织进一步认识到过去只重视企业改造，忽略人的改造的危害性。从此，进一步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一方面在工商业者中培养出一批进步分子；另一方面在各级工商联组织中多配备干部，充实党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工商联的领导力量，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教育。在全省 1329 名工商联干部中，党员 228 名，团员 189 名，占干部总数的 31% 多一点。据 1955 年 10 月统计，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代表共有 1008 名，他们在后来带领工商业者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3、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 年 10 月，黑龙江省委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作出了进一步搞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在私营工业方面，将大型户全部进行公私合营，对中型户通过联营并厂，基本上达到公私合营，对小型户有的走合作化道路，有的采取联营并厂办法，发展为公私合营。对个体手工业，组织生产合作社、供销生产小组或供销生产合作社，使之达到 70% 以上。对私营商业，将发展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之达到 90% 以上，并发展一批公私合营商业。对农村小商小贩，将通过各种合作形式，使之逐步纳入合作商业的轨道，使之达到 90% 以上。为实现这个

目标，成立了省私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了1355名干部，经过培训，从事私改工作。

同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以后，全省的私改工作进入新的转折时期。12月9日至14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县（旗）、镇主要负责干部和省直单位、业务单位的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草案》和毛泽东的指示、陈云的报告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专题发言。会议根据这些精神，讨论修改了10月份省委制定的私改规划。修改后的规划要求：到1957年底，在私营工业方面，对大型户除了特殊情况外，全部完成公私合营，对中型户到1958年底基本完成公私合营，对与主要行业有关的部分小型户，在这个行业合营时吸收参加公私合营，其它小型户引导其走合作化道路。对个体手工业，到1956年，80%的人参加合作组织，其中高级社占60—70%，到1957年，90%以上的人参加生产合作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城市私营商业，到1957年，90%左右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其中资本主义商业全部完成公私合营。对农村小商小贩，90%以上通过各种合作形式，改造为合作商业，到1956年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过渡成为供销合作商业和合作商业的代购、代销员。为了完成上述规划，省委要求各市、县（旗）成立私改领导小组，并设办公室。商业方面的私改工作，除由国营专业公司负

责外，成立福利公司负责生活服务业的改造工作；工业方面的私改工作，要成立专业公司或综合公司来负责。各市、县要在12月份抽调并训练好私改干部，全省再增加2—3千名私改工作干部；1956年1月份着手进行一两个行业的全业合营。会议认为，在全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新高潮的影响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到来，而黑龙江省工作尚处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被动局面中，要迅速扭转。

1955年12月10日至23日，省工商联筹委会也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私改工作的指示和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会议精神。与会人员中有72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表示要带头接受改造。会后，各市、县（旗）工商联立即贯彻了会议精神，广大私营工商业者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政治表现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1个市、县的统计，工商业者中的进步分子由运动前的20%左右升到60%左右，中间分子由运动前的60%左右下降到30%左右，落后分子由运动前的20%左右下降到10%左右。

这两次会议以后，全省各地工商业者纷纷酝酿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搞合作化的问题，不少工商业者自动行动起来，要求政府派人去领导。哈尔滨市私营工业有9个行业、商业有11个行业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佳木斯市20个行业要求全行业合营、并厂、并店，组织合作。勃力县52个行业中，有29个行业自动结合，联名提出申请，要

求组织合作社或公私合营。依安县工商业户要求改造的占总户数的 98%。全省 2 万名手工业者未经批准即自己组织手工业“自发社”，人数比正式批准建社的（19000 人）还多。

在这种形势下，省委来不及修改 12 月份制定的私改规划，立即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采取全面铺开，发动群众的办法，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高潮。全省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了三种形式：

第一种，采取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行业申请，分期批准，生产照旧；第二步是用资本家自清、自点、自做、自报，工人、店员监督，行业审核，政府批准的办法进行清产核资；第三步是人事安排和改组并厂或并店。

第二种，采取分两批进行的办法，第一批是在 1955 年改组并厂、并店的基础上合营；第二批是先批准合营，后进行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和并厂并店。

第三种，采取先清产估值和改组并厂、并店，后宣布合营的办法。

1956 年 1 月 15 日，听到北京市各界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的实况广播后，黑龙江省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高潮达到了顶点。哈尔滨市 1 月 15 日当天就有 33 个行业的 1159 户自动申请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在私改高潮中，全省共抽调 5163 名干部参加私改工作，省妇联和省团委也积极配合省委，动员私营工商业中的团员和工商业者的家属，支持私改工作顺利进

行。另外，组织工人、店员突击队、工商业者工作队和工商业者家属工作队，促使私营工商业者投入私改高潮，参加公私合营。1月22日，哈尔滨市20万人集会，庆祝全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同一天，齐齐哈尔市15万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1月24日，佳木斯市各界群众6万人集会，庆祝全市私营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晚上还举行了有3500多人参加的提灯晚会。1月25日，牡丹江市举行了完成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庆祝大会。

1956年1月27日，黑龙江省宣布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实现公私合营。其中公私合营的占72.3%，并入地方国营企业的占12.4%，通过合作化改造的占11.6%，并入老的合营企业内的占3.2%，淘汰的占0.5%。个体手工业有96.7%的户数进行合作化。全省55144名私营工商业者分别纳入国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对私营工业，除了少数纯属手工业的小型户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外，全部进行公私合营或与国营工厂合并。在个体手工业中，1.7%被吸收到工业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县城以上的私营坐商（包括饮食业和服务业）全部进行改造，并有一部分摊贩也被吸收进来，其中公私合营占24.23%，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占57.42%，经销和代销占16.35%，国营商业直接吸收的占2%。对农村私商（包括所有摊贩），除了少数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对总户数的96.3%进行了改造，其中直接吸收为供销社营业员的占总人数的65.9%，参加公私

合营的占 5.3%，参加合作商店的占 2.3%，代购代销的占 24.8%，经销的占 1.7%。全省各市、县建立的工业和商业的专业公司共有 84 个，商业总店有 354 个。国家派出公方代表 1868 人，安排私方人员 4874 人。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对私营房产和私营船舶运输业以及私营汽车运输业、私营兽力车、客货运人力车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市、县和集镇的私人房产总面积约为 1097 万平方米，占公私房产总面积的 44.4%，其中房主自住面积占 57.2%，出租面积占 42.8%。在经营方式上，除哈尔滨市有两个私营房产公司经营外，其余多由房主自营或兼营。对私营房产的改造采取了三种形式：第一，凡以出租为主要目的，出租面积超过三五间或百平方米者，原则上采取经租定息的形式；第二，对暂时不实行经租定息者，则采取只经租不定息的形式；第三，对出租面积不超过三五间或百平方米者，仍由房主自行出租，但要服从政府关于租金标准、房产修缮等规定。对原有管理私人房产的所有从业人员，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原则，安排其工作。对房产的估价一般高于市价。从 1956 年 1 月至 3 月末，全省基本上完成了经租定息的改造工作。据 1955 年末统计，全省约有各种私营运输业船舶 661 条（其中小汽船 25 条，木帆船 522 条，搬推及舢舨船 114 条），运输能力约占国营运输能力的 22% 左右。1956 年以前，对私营船舶实行了统一运价、统一配载、统一调配的办法。到 1955 年末，已有 69 条木帆船组织 2 个互助组，14 条小汽船组织了 4 个互助组，91 条横

渡船组织了4个互助组。在这个基础上，对小汽船基本上实行了公私合营，对木帆船、搬推船和舢舨船基本上实行了合作化。对全省私营汽车运输业，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对私营兽力车和客货运人力车实行合作化，其中一部分参加农业生产。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也有个别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大哭。但是，绝大多数资本家还是拥护和平赎买政策，积极接受改造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广大工人、店员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生产。佳木斯市光华玻璃厂公私合营后，职工在6天内提出44条合理化建议，每月节省70多吨煤，废品率由过去15%下降到3%。据牡丹江市15个公私合营工厂的统计，1956年1月至5月产值比原计划完成100.85%，财务比原计划完成141.8%，成本降低8.37%；铁铸件成品率由合营前的60%，提高到90%；油厂的出油率由合营前13.6%，提高到14.2%。

4、纠正偏差，宣布实行定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1956年2月17日至2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第三次私改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段私改工作，部署下步工作。会议认为，全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正常的、健康的，成绩是很大的。会议指出，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也存在着急于搞经济改组、动用资本家帐外资金、注意改造和生产两不误不够等缺点和问题，应在今后工作中注意解决。

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来势很急、很猛，时间短促，再加上全省各级领导部门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不够，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急于搞经济改组工作。由于很多市、县随着申请批准就进行清产核资，紧接着又搞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等工作，等接到中央关于改造后半年内原封不动一切照旧的指示时，在全省已经把经济改组工作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市、县为了赶进度，急于求成，在清产核资工作中估值偏低，在经济改组中曾发生过某些混乱现象。如饮食业、服务业和一些小商小贩的合并过分集中，造成群众生活不便。有些行业采取统一核算，影响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些采用“一步登天”的办法，不应直接变为国营商店的门市部或推销员的也直接变成国营商店的所属单位或职员，因而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在小商小贩的改造中，对代购、代销的形式注意不够，改为合作门市部的较多。二是对资本家增资问题一时处理不当，因而有些地方把资本家增资多少作为批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条件，甚至号召资本家通过增资问题争取建立社会主义之功。三是在公私合营高潮时，把相当一部分城乡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吸收到公私合营后，视同资产阶级分子对待。对此，1979年11月至1981年11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79〕84号文件精神，在参加公私合营的原工商业者20922人中，把19422人区别为劳动者（占92.8%），没有区别出来的有1500人（占7.2%）。四是对资本家及时安排、使用不够。对存在的上

述缺点和问题，有些在当时及时制止或解决了，有些在后来逐步得到纠正或妥善处理。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黑龙江省根据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精神，确定私股年息为5%的利率。私股股东领到股息后说：“政府说到哪，办到哪”，“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太好了，定息比‘四马分肥’好的多，过去‘四马分肥’不挣钱就分不着，现在不管挣赔都发给我们定息。”有的资本家领到股息后，全部买了公债。

在全省基本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一方面发动工商业者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另一方面对工商业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资本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提高原工商业者的政治思想素质，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协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对原工商业者的教育规划。各市、县（旗）也相继举办工商界政治学校或讲习班，组织原工商业者学习《工商界政治常识课本》、《企业管理基础知识》以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收到良好的效果。

黑龙江省自1945年9月至1956年末，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改革开放方针形成的历史考察

孙 大 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改革开放方针，是我们党经过近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加深认识，长期进行探索的结果，它反映了国内外客观形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这一方针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一、最初的设想和尝试

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比较多地照搬了苏联的现成经验，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基本适应建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情况的。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特别是到了“一五”计划末期，由于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和国家对企业管得太死，给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从 1955 年底起陆续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和初步方案。

1955 年 11 月，陈云指出：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

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这个事实。^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②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草案确定：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业和事业，应尽可能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推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初步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

同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陈云就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和流通问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观点。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1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创见性的主张为正在酝酿中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57年，党和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等方案。这些方案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基本通过，并于11月经国务院通过后正式公布。这些方案已开始触及到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经济体制的一些通病，提出了体制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一次探索性的尝试。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错误的干扰，上述改革尝试还未来得及展开便被打断了。

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又开始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1963年3月，中央决定试办托拉斯，逐步改进企业管理体制。当时首先成立了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托拉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赞同刘少奇关于建立托拉斯企业的设想。指出：目前这样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要吃饭的，要消耗的，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管理？为什么只

能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①

1964年8月，中央决定再试办11个托拉斯性质的公司。这些托拉斯的试办，不但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1966年3月，毛泽东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设想，^②主张进一步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但是，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上述改革探索不得不再度中断了。

在进行改革探索的同时，党中央面对帝国主义势力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也曾努力创造条件，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并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这是最初的对外开放。

在建国初期和50年代，我国主要是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1953年5月，经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决定由苏联政府帮助我国新建、改造141项重要企业（包括1950年签订的50项）。1954年10月，又商定增加15项。这就是后来通常说的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也帮助我国建设

① 引自石仲泉《艰辛的开拓》，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371页。

了68个工程项目。与此同时，我国还先后派出大批留学生、实习生到苏联、民主德国、捷克等国家进行学习，培养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才。

在吸收大批援建项目的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逐年发展。195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2年增长62%。^①这里不仅有对东欧和苏联的贸易，而且还包括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例如，1952年至1957年11月，我国通过“民间外交”的渠道，先后同日本签订了4次贸易协定，1次民间渔业协定。尽管这些协定金额有限，而且还由于日本政府的破坏而中断，但是它却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扩展了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渠道。

这一时期党中央还提出了一些对外开放应遵循的原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②“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③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1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阐述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并且宣告：“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①，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姿态。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仅停止了对我国的援助，而且还用逼债、撕毁合同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利用我国的经济困难加紧对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援助已不可能，而且对其它方面的开放和合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党仍未放弃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努力。

例如，在60年代，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主持下，我国先后从日本、西欧引进了84个建设项目，填补了我国一些行业在技术上的空白。1962年3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同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②按照这一精神，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推动下，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还于1962年商定了用“积累渐进”方式，从贸易入手打开中日关系的方针。1963年6月，我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引进成套设备的合同。1964年1月，毛泽东还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③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3页。

② 《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第85页。

③ 引自石仲泉《艰辛的开拓》，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在国际环境显然不利于我的形势下，能够作出上述努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所具有的开放和探索精神。

总而言之，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我们党已经多次提出过改革和开放的主张，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改革的探索屡次被“左”的错误所打断，开放的努力又被国际上的条件所制约，因而改革开放的方针还不具备形成的条件。

二、曲折中的探索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陷入了一场持续 10 年的大动乱。这场动乱不仅导致了我国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而且也使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和开放尝试因失去必要的安定环境而不得不中断。但尽管如此，我们党仍未停止对改革开放问题的探索，而且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尽力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探索主要有：

1. 以企业下放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

1969 年，动乱的局势稍见稳定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被重新提到日程。在 1969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讨论了《中央各部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下放的初步设想》。根据这个设想，凡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企业实行一元化领导；面向全国的关键性企业、事业单位，暂仍由各部直接管理；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设到厂矿去。1970 年 6 月中央指示：在落实国家计划的工作中，国务

院各部、委要正确处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各部、委所属企业、事业单位，除极少数一时不宜下放外，一般都应下放；大多数完全下放给地方，少数实行双重领导，其中多数地方为主，少数中央为主；下放工作在1970年内，应逐步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完毕。截止1970年9月，中央工交9个部已下放企业2237个，占总数的73%。^①

此外，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中央还要求从1971年起实行以下改革措施：（1）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2）物资分配大包干。（3）财政收支大包干。（4）扩大地方权限，实行“块块为主，各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②

实施上述改革措施的目的，是想通过扩大地方权力，探索一种能够较好地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但是，在当时那种混乱局面和“左”的思想的干扰下，这一目的是难以实现的。对企业下放，周恩来虽曾多次指示，要有步骤地进行，不可撒手不管。但实际上是一哄而下，带来了不少问题。如：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分工不清，造成各关心各的，两个积极性拧不到一起；由于仓促下放，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了一些老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央对经济全面的指导没有相应跟上，使各地方自成体系，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相当严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372页。

②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380页。

重，造成很大浪费，等等。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体制改革措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2.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实行对外开放的努力

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变化。世界战略格局由美国称霸逐渐演变为苏美争霸。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破产。美国已没有力量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得不修改其早已行不通的孤立中国的政策。

面对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坚决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方针，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2月，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些外交成就的取得，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根据这种形势，我国政府从1972年起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3年，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用43亿美元从日本和西欧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增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

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个世

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辟了道路。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工作给予了肯定和支持。1975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建议建立石油和煤炭出口基地，换进外国的成套设备。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对此建议表示肯定。8月18日，他在《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专门指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①同月，国家计委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也专门提到：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用我国生产的石油、煤炭来偿还。这实际就是后来实行的“补偿贸易”。

由于当时整个工作处于动乱的环境中，因此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工作也不能不受到动乱局面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1974年以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为了打击坚持同他们作斗争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别有用心地制造了所谓“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把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当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页。

作“崇洋媚外”来批判，攻击国务院的领导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爬行主义”等等，使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很难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交往。这不仅干扰了正在进行的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工作，而且也为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设置了严重障碍，使得我国在日趋活跃的国际经济活动中闭关自守，缩手缩脚，陷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机，极大地延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人们不可能对以往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及时地加以正确总结，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在“文革”中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探索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说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和贯彻只有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和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后才有可能。

三、新时期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和提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得“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10年的动乱终于结束，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进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1977年党的十一大又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正确政策。1977年到1978年，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有了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方针进行了充

分的酝酿。

1.改革方针的酝酿

新时期对改革方针的酝酿始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这次会议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表现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它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讲话中。

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李先念指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过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

关于改革的任务。李先念指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便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特别要

坚决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关于改革的突破口。李先念提出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自主权，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企业的主张，从而为历史新时期的企业改革把扩大自主权作为突破口提供了指导思想。他说：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在企业中劳动的全体职工或社员是直接的生产者，只有充分尊重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生产才能高速度发展。把各企业当作任何行政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推动的算盘珠，这种管理思想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机器都要自动化，何况是人，何况是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和由他们组成的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他们能够根据经济本身的需要，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厉行经济核算，降低经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经济效果。这就需要在经济管理中充分注意企业的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充分实行按劳分配，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不要滥用行政方式，不要用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的框架去束缚经济的发展。

李先念还总结了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改革结果也往往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这次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

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大企业和大专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使我们的管理水平尽可能适应高速度发展工农业的需要。

这篇讲话是我们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改革问题，是党正式确定改革总方针并开始历史新时期改革进程的一次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这篇讲话在党内立即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中央决定，把它提交到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并作为会议的三项议程之一。

同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进行了改革的思想动员。他指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①

上述情况说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方针和决策已经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酝酿成熟。

2. 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与决策

70年代末期，国际上出现了对我国更加有利的形势。资本主义各国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打击下，相继陷入了经济危机，此时正处在危机后的萧条状态，工厂设备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6页。

开工不足，资金和技术找不到出路，产业结构急需调整。据我国冶金部 1978 年派人赴西欧考察了解，当时欧洲共同体国家的钢铁设备开工率只有 63%。而且预测在 1985 年前不会有什么好转。为摆脱这种停滞状态，美国、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看中了中国这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市场，争着同我国做买卖。与此同时，国内已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备了同国外开展正常经济交往的条件。党中央利用国际国内这种有利的形势，积极恢复并扩大了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1977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提出了“十个要不要”。其中第九点就是：“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①

同年 7 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 8 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原则批准。这个规划提出，在今后 8 年中，再引进 65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②

同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指出：在发展我国自己科学技术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作好新技术的引进工作。特别是在今后 5 年到 8 年内，我们要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时机，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运用更加灵活的方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 578 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 583 页。

式，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把学习和独创很好地结合起来。^①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5月和7月，他在两次会见外宾时谈到：现在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有很多重要的条件作为根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

同年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讲话中也指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对于引进的东西，要努力去消化它，发展它，创造出新东西。如果只引进不创造，那就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永远不能赶上和超

^① 转引自阎建琪《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发展》，见《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同上。

过，那我们就是笨蛋。那种什么都想买，一直买下去的懒汉思想，是一辈子也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的。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78年内，我国先后同国外签订了22个引进成套设备或机组的合同项目。其中包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上海宝山钢铁厂，5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4套30万吨合成氨装置及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等项目。

同过去相比，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具有3个显著特点。一是通过活跃的外交活动为引进工作创造有利条件。1978年中，我国领导人先后出访了亚洲、欧洲及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反复表明了为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愿同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愿望，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引进工作的规模大、气魄大。22个引进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5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①这虽然暴露了我们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和引进工作中经验不足的缺陷，但也确实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气魄。三是引进的方式比过去灵活多样。不仅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而且还包括引进国外资金，进行补偿贸易等内容。1978年11月，李先念在会见外宾时，就引进外资的方式提出：可以用贷款买设备，或由外商出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610页。

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也可以考虑两家合股经营工厂。^①初步提出了建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设想。

3. 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形成

在经过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党中央于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其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围绕关于实行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为推动讨论的深入开展，开阔大家的思路 and 眼界，党中央还专门向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如何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材料，作为会议的参阅文件。这对于与会同志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方针，起了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

与会同志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改革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意见。

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集中，把什么都统得死死的，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二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吃大锅饭。因此，计划体制、上层建筑必须作重大改革。否

^① 转引自阎建琪《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发展》，见《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1期。

则，章法不变，经济改革也搞不好。

东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用齐头并进的办法，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在讨论中，大家比较多的意见是：当前应着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尊重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应该改变，实行政社分开；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

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打破过去那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框框。现在国际上情况和过去不一样了，各国都看到中国市场大，争着借款给我们，我们应该欢迎。

王震也在发言中提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加快四化建设是极为有利的。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过剩，新技术、成套设备和资金急于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我们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政策下，搞补偿贸易、合营企业。也可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于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和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科技都会上得快一些。他还建议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

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中从指导思想支持了大家的上述意见。同时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

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讲到体制问题时，他还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全会公报提出：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要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在经过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的《1979、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还确定了在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工作，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

国际市场这方面来。^①

上述文件标志着，在党中央的决策上，已正式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而且，随着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指导思想的逐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四、改革开放方针的发展和完善

从1979年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得到巩固，使得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同以往相比，不仅没有因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而中断，而且还能够一次次地克服阻力，使过去没有条件实行的一些设想付诸实践，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方针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取得了突破。1979年1月，安徽省凤阳县和肥西县农村，率先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揭开了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由安徽向全国农村扩展。到1982年，全国农村已普遍建立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这一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又进一步向其它方面扩展。1985年，开始了以改变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内容的第二步改革。1986年，又完成了政社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605页。

分开、建立乡政府、改变人民公社领导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建立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使我国的农村经济获得了迅速振兴，并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农村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逐步地开展起来。1979年1月，四川省在6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基础上，决定把扩权试点扩大到100个企业。7月，国务院决定把试点扩大到上海、四川的1600个企业。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大中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商业体制、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劳动就业体制等领域。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全面展开。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在计划体制方面，逐步改变了国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企业管理方面，逐步实行了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等不合理的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上述改革给我国的经济不断注入活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3月提供的资料：我国国民总产值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年均9%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世界3-4%的平均速度，10年共增长了1.36倍。^①

① 见199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在对外开放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继续积极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且还不断地为开放政策增添新内容。1979年7月，党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改称“经济特区”。中央指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在试办特区取得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5月，中央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央又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布局。1987年，中央又决定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特区，从而显示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扩大的势头。在开放地带不断扩大的同时，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式、数额也在不断增加。不仅引进了一批成套设备和技术，兴建了新企业、改造了老企业，而且还兴办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吸取外资的规模逐年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截止到1990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680亿美元，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达上万项。^①到1991年，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累计已逾26000户。^②

① 见199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② 见1991年3月5日《经济日报》。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在理论上也逐步地明确和完善起来。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了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实施指明了方向。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确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的同时，继续强调了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方针。在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还向当时的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了试办特区的设想。他说：就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根据邓小平的谈话，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和9日写出了关于在对外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特区的报告。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的文字表述。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是把改革和开放作为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途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1980年8月，邓小

平又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从而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是党自建国以来首次提出的新任务，它为改革方针增加了新内容，反映了党在改革问题上认识的深化。

1980年12月，在决定进一步实行调整方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方向上有任何改变。同时，“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推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①这是在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为使改革开放的工作顺利进行，邓小平同时还提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反对崇拜资本主义和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1年11月3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将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和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作为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②这里使用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概念，是对当时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总概括。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59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又把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的思想进一步作为整个历史新时期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这样的方针，全党同志必须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丝毫含糊。^①从而使改革开放的方针更加全面。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勾画出了在我国进行全面改革的蓝图，对改革的必要性、目的、任务等作了全面阐述，指出：改革不仅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面对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和挑战的迫切需要。改革是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应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同时还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关于改革的理论已经开始系统化。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页。

设，一手抓法制。”^①这是对“两手抓”方针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一提法标志着我们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此后，党中央开始用“改革开放”的提法代替“开放、搞活”的文字表述来概括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

1987年10月，以加快和深化改革为主题的党的十三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样，改革和开放就被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方针总政策而确定下来。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上述事实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在实践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方针政策上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92页。

基础和保证的改革开放方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形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强国之路。它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在党的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将经过不懈的努力，克服艰难险阻，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史料三则

马 贵 凡 译

译者按：研究中共早期历史，不能不涉及1922年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对中共革命纲领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有关这次会议的中文资料寥寥无几，而外文资料又多未译成中文，因此研究者很难就这次会议对中共的影响问题作出全面的评价。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从苏联远东研究所1986年编辑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中选译了三篇有关这次会议的重要文献资料，以供参考。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
就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一事致中共
中央、日共中央和朝共中央的信

(不迟于 1921 年 10 月 15 日^①)

亲爱的同志们!

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将于 11 月 11 日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以掩饰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暂缓现代帝国主义主要动力（即昨天战胜德国政治集团的英日资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一场大战的到来。

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所谓太平洋沿岸国家领土不可侵犯的虚伪口号，以及“门户开放”和似乎为发展这些国家的生产而要均等使用资本的口号，来麻痹它们的牺牲品的警惕性，进而准备对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新一轮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英、美、日强盗一方面在加紧为他们之间将到来的争斗作准备，彼此在扩充陆海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不间断地建造一批又一批新的无畏舰和战舰，不断地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试图用裁减军备和保持政治均势的口号来欺骗本国劳苦大众和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东方各国人民。

同志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你们附上共产国际执

① 此日期系根据刊登这份文件的杂志的复印时间确定。

委会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提纲，该提纲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做了分析。书记处要求你们主动召集你们国家将出席 11 月 11 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在干：

1. 揭穿世界帝国主义在华盛顿策划的反对东方各民族的阴谋的真正实质。

2. 把这些民族团结在一个真正是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司令部的中心即苏维埃俄国的周围。

同志们！你们应当立即着手在你们国家广大群众中广泛开展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揭穿华盛顿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的实质。我们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奴役东方劳苦大众，进而加强其同世界无产阶级和工农苏维埃俄国作斗争的阵地的企图。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针对华盛顿会议。

同志们！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要求你们为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广泛开展强有力的宣传运动，宣传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同为使人类摆脱世界资产阶级锁链而斗争的唯一积极的斗士和领导者——苏维埃俄国结成反帝同盟的思想。

打倒世界帝国主义！揭穿世界强盗反对东方劳苦大众的新阴谋！打倒华盛顿会议！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先锋队——苏维埃俄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决议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和远东形势》(节录)

(1922年1月30日)

1.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是，美、英、日、法在远东建立了（不十分稳固的）四国同盟。这次会议清楚地表明，目前远东问题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焦点。人口稠密的中国的丰富原料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储备，朝鲜、蒙古、远东共和国和苏维埃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所有这一切，对于不能恢复资本主义体系以前的均势而打算到远东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世界帝国主义来说，乃是一大块肥肉。

华盛顿会议暂时延缓了帝国主义争霸太平洋的战争的再次爆发，这是靠牺牲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试图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奴役而取得的。华盛顿会议只字未提多灾多难的朝鲜，而正在奴役印度和埃及的英帝国主义，早在1911年就从英日条约中勾掉了朝鲜这个名字，因此日本从自己方面答应支持英国的殖民统治。美帝国主义强盗式地占领了菲律宾，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它对朝鲜人民的命运也漠不关心。至于法国资本家和军阀，俄国沙皇倒台后，他们一直是日本强盗同苏维埃俄国作斗争的盟友，也是日本强盗在受法国“俄亚银行”控制的中东路地区捍卫其“特殊”利益的盟友。正是为了执行华盛顿会议决

议，日本才对远东共和国发起攻势。

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协议，表面上是对帝国主义强盗在掠夺中国问题上享有同等权利的承认，而实质上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竞争对手日本的。作为补偿，日本可以占有它以前所占据的区域即朝鲜、山东和满洲，并可以（借助张作霖）向自治的蒙古方向和苏维埃俄国方向扩大领地。

华盛顿会议必定会消除最近产生的一种幻想，即朝鲜、中国和蒙古的人民群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指靠帝国主义的援助。这次会议必然会使这些群众完全相信，他们只有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维埃俄国联合起来，同一切侵略者进行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取得独立和自由……

2. (略)

3. 拥有 4 亿人口的中国，实际上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华盛顿会议确定了中国的这种地位。

列强对中国的征服始于它 1839 年至 1841 年对英作战的失败，当时英国资本家靠使用武力将运进鸦片自由强加给中国人民。1858 年，又将确保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特权的治外法权原则强加给中国。列强对中国的每一次新的进犯都要从中国人民身上勒索赔款，索取新的租界和特权。随着外国商人、战舰和军队的到来，中国人民在本土上渐渐变成了奴隶：欧、美、日外来者占领和瓜分了中国的所有港口、水陆交通枢纽和行政政治中心。1901 年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是英、俄、日、德、美讨伐军公开进犯中国并把中国划分为势力范围的信号。

如果说 1911 年革命以前，帝国主义强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反人民的清王朝，那么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他们则把赌注押在中国军阀集团身上，试图使其成为他们手中的驯服工具并使中国变成接连不断的内战的策源地。日本帝国主义利用 1914 年帝国主义战争暂时吸引开欧美资本家对中国的注意的时机，通过实行军事、外交讹诈和收买中国军阀，迫使中国将原德国占有在华租界（包括土地肥沃和矿产丰富的山东省和胶州半岛）的一切特权转给它继承。1915 年，日本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了臭名昭著的 21 条。实行这 21 条必然会使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行政方面完全依附于日本。华南也会象华北一样必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外交家们还把对世界大战的虚构参与强加给中国，其目的在于更自由地剥削中国。

美帝国主义在凡尔赛会议上同日本未达成协议后，试图通过银行团在中国推行其经济政策，使整个中国屈从于美国在其中必然充当领导角色的银行托拉斯的统治。银行团企图奴役中国农民，掌握土地税征收权，扼杀中国工业，攫取向所有中国工业企业提供资金的垄断权。

如果说日本未能完全实现其 21 条，而美国未能组织起银行团的话，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你争我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的一致抗议和华南革命者的斗争。

如今在华盛顿，美国再次试图诉诸银行团，这次有很大的成功希望，因为它借助四国同盟孤立了日本。现在具

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已被卖身投靠的督军弄得四分五裂。在北京左右局势的是外国使团。大部分中国工业、林业租让企业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的中国革命的南方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威胁之下，不取得全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指望牢牢地巩固住自己的地位。中国农民、中国工人和苦力，都是外国资本的失去自由的奴隶。中国人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受东京、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指挥。他们摆脱不了中世纪的野蛮残杀，因为他们的畏缩、软弱和无组织，给帝国主义掠夺造成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列强政策的真实内幕。中国劳苦大众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除了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首的、起来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众之外，已不对任何其他盟友寄予希望……

4. 4个帝国主义强盗在华盛顿策划的阴谋，把远东各民族的命运彻底连结在一起。中国、朝鲜和蒙古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日本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以苏俄工农为首的国际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所有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4个吸血鬼在远东策划的阴谋应当受到整个远东工农革命同盟和远东劳动者同国际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结成的同盟的抵制。

远东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只有破除帝国主义的压迫网，建立以工农兄弟联盟为基础的新制度，才能摆脱奴隶地位

和享用自己国家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建设经验证明，苏维埃制度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它可以为劳动者实现最充分的真正民主。在日本、中国和朝鲜，农民群众都同样过着可怜的半雇农半佃农生活，经受着无地和大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盘剥的痛苦（在朝鲜，主要是受日本大地主的剥削；在中国是受外国大庄园主和租让企业主的剥削）。没收不劳而获地主土地的口号在农民群众中必定赢得广泛的响应。中国农民饱受国内战乱和繁重捐税之苦，他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廉价的维护他们利益的民主政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纳税制度和很好组织起来的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朝鲜农民的主要敌人是外来侵略者，这不仅是他们的民族压迫者，而且也是他们的阶级敌人。

在日本，无产阶级在最近就应当成为或将成为自己政治命运的主宰者。在中国和朝鲜，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的力量，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在这里，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乃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劳苦大众的重要条件。

远东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己内部和同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合作关系，才能利用现代科技成就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

通向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独立的唯一道路，只能是远东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远东千百万工农大众是“人类的最后潜力”，他们的革命觉醒是对整个世界压迫剥削制度的毁灭性打击。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宣言
《告远东各民族书》（节录）

（1922年2月2日）

远东的劳动者们！

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太平洋群岛、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的工人们和农民们！

远东各国被奴役的人们！

你们受欧美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和野蛮统治已经几十年了。日本强盗使整个朝鲜到处都在流血。日、美、法、英强盗正在吞并和瓜分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试图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建造他们的天堂。他们不把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当人看。他们需要的是黄灿灿的金子、利润和资源。为此他们不惜葬送千百万人的性命。在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汉城和仁川的外国租界里，中国人和朝鲜人同狗一样不准进入公园和其它公共场所。在这里，靠别人的血汗养肥的外国资本家，出门乘坐人力车，对车夫棍打脚踢。最受世上富人蹂躏和压迫的奴隶——中国苦力，要为这些寄生虫勤苦到死。中国农民每天从事16到18小时的繁重劳动，腰被压弯了，但劳动果实却都归外国高利贷者和吸

血鬼所有或流入其卖身投靠的走狗的腰包。朝鲜的穷人无地种粮糊口，土地都集中在日本庄园主（地主）和资本家手里，他们用刺刀和枪驱赶执拗的人们去为他们干活。在菲律宾、台湾、印度支那、荷属印度群岛，任何抗议言论，每声绝望的叹息，都要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在早已成为3亿人民可怕地狱的相邻的英属印度也是一样。数百万劳动人民在水稻、咖啡、棉花等庄园耕作，被残酷的剥削压得透不过气来。

蒙古只是在昨天才摆脱日本和白匪的压迫。

在日本，统治阶级是臭名昭著的远东刽子手，这里的工人在工厂里，农民（半雇农）在租种的田地里实际上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到处可以听到成千上万受奴役人们的痛苦呻吟。强盗们不希望听到任何关于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关于他们的人权的声言。

不久前，这些强盗聚集在华盛顿美国交易所，策划对远东各国的进一步掠夺。他们缔结了四吸血鬼同盟，把朝鲜、俄国远东和满洲让给日本去大肆抢劫。他们通过了掠夺中国的利益均等原则，让美国资本家在这种卑鄙的勾当中充当领导角色。1918年由美国组织的银行团试图把中国所有农民变成美国资本家的农奴式进贡者。这样中国则要向美国银行家交纳巨额捐税。中国工业则要成为美国工业的附属品。但是由于侵略者内部有分歧，中国人民大众又一致抗议，这种企图在1918年就遭到了失败。现在这帮强盗又想建立新的银行团（即国际商行），要从军事、财政和工业方面掠夺中国。日、美、英、法暂时延缓了为

争霸太平洋而行将进行的战争。它们是延缓，而不是放弃。延缓之目的是为了再共同掠夺一段时间。

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消耗了世界强盗的實力。在欧洲，在他们犯下杀人罪行的地方，工人革命扼住了他们的咽喉。苏维埃共和国是所有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天堂，他们同它较量4年，现在不得不公开承认它的實力，承认自己无力战胜苏维埃。在远东，他们指望靠牺牲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劳动为代价，恢复其被动摇了的势力。

他们要给我们远东受奴役而又忍耐的各民族带来新的锁链、新的恐怖和新的更可怕的奴役。

这种情况不应出现，也不会出现。我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再不充当你争我夺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手中的玩物。

共产国际向民众发出了伟大号召：

各国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我们要把这个口号传遍我们贫穷的农村，传遍遭受奴役的庄园，传遍工厂、学校和兵营！

我们聚会在莫斯科，在彼得格勒，在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红色都城，是为了从这个世界讲坛上发出我们的声音，反对世界刽子手，反对四吸血鬼在华盛顿结成的同盟。

我们是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受压迫民众的代表，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革命民族组织的代表，我们代表国民党，代表华南，代表湖南、山东、安徽、广东、浙

江等省和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太原、杭州、唐山等市革命组织，代表“少年中国”民族革命会、各工会组织、铁路工会、中国共产党和妇女联合会，代表以《民国日报》和《太平洋》、《新中国》杂志为代表的民族报刊。

我们是帝国主义日本受压迫劳苦大众的代表……

我们是解放了的蒙古的代表……

我们是受美、英、荷帝国主义压迫的荷属印度劳动者的代表……

我们要求平等、自由和独立！

我们号召进行神圣的斗争，号召所有未背叛自己的民族、珍视受压迫人民切身利益和本身是奴隶而不愿再当奴隶的人们走上正确之路！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从刽子手手中等来自由！

我们知道：争取解放的斗争是艰难的。

但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用武力夺回完全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是多数，我们有千百万，我们的力量是团结一致的！

我们要同日、美、英、法和所有其他世界强盗决一死战。我们要同卖身投靠奴役者的中国走狗决一死战。我们要同虚伪可恶的美帝国主义和贪得无厌的英国侵略者决一死战！

让他们从中国和朝鲜，从太平洋诸岛，从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滚出去！从远东滚出去！

日本工人阶级向中国和朝鲜的劳动者伸出了兄弟之手。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将会被日本无产阶级折断！

从今日起，我们缔结远东劳动者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的牢不可破的同盟。

我们一定要取得自由！我们要推翻强盗，建立一种公正的劳动制度，要从不劳而获者那里夺回土地，让我们工农执掌政权！

组织起来吧！加入我们的战斗队伍吧！建立工农同盟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吧！准备斗争吧！

打倒华盛顿的阴谋家！打倒四吸血鬼同盟！

远东劳动者同盟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各国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党的各级委员会制度在军队的恢复

瞿定国 周炳钦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一项根本原则。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是贯彻这一原则的重要措施。在我军历史上，党的各级委员会制度，曾经历了一个建立、中断、恢复和发展的过程。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率先在部队中恢复各级党委制，并取得了经验，这对于当时我军中断了十余年之久的党委制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的建立，始于“三湾改编”。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①这是我军建立各级党委制的开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分连支

^①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①并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核心。

红四军建立的各级党委制，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2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②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及12月红四军根据中央9月来信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进一步总结了红军中实行党委制的经验和问题，明确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③强调军队中的各级党委要成为“领导的中枢”，“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④并要求各级党委“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⑤此后，党中央多次推广红四军的经验，指示各地红军仿效。实践证明，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和党委制，是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红军得以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给其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他们又推行了一条错误的组织路线。取消我军行之有效的党委制，就是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重要表现之一。王明上台后机械地搬用苏军经验，反对在红军中建立的各级党委制。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为取消党委制大造舆论。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批评说：由于“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使之〕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为此，会议决定：“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各军党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并指导其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根据会议决议，从1932年起我军取消了各级党委制，而代之以政治委员为党的全权代表制。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明文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即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指挥员在执行任务上有不同的意见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的权能。把党组

织隶属于同级政治机关管理之下，把党委置于同级政治委员领导之下，实行政治一长制，这就颠倒了组织与个人、党委与机关之间的关系，损害了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原则，给军队中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主要是：第一，把党的组织原则和军队的组织原则混淆起来。单纯地强调个人行政领导，使军队严肃的作风、命令的方式反映到党的生活中来，造成了党内极浓厚的行政作风，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化。有的干部甚至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从而影响了党内民主生活，损害了党员应有的权力，降低了全党的积极性，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第二，助长了分散主义偏向的产生。由于否定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有的干部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尊重上级的决定，重大的问题事前既不向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上级机关报告，危害了党的统一。第三，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下，“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排斥和打击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采取成立军委分会和军政委员会、缩小政治委员的权力、扩大党务委员会的职权等方式，逐步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集体领导制度。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强调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它“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

团。”^①并决定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党的各级委员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但是由于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七大”的这一决定，未能很快在全军实行。

党的“七大”以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决议，在所属部队开始了恢复党委制的工作。1945年11月中旬，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第一次（扩大）全会（即峰峰会议）上，决定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委员会，首先在纵队和旅建立党委。于是，军区所属各部队抓紧了纵队、旅两级党委的恢复工作，依次指定了纵委和旅委的名单。1946年春，宣布取消团的总支部，开始建立团党委。为提高对党委领导制度的认识，在部队中大量印发了《古田会议决议》，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加强了对连队党支部工作的领导，注意保持连队干部的健全，利用战争间隙培训支委、小组长，积极发展党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但是，经过大半年的实践，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各级党委的领导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团委的日常党务工作仍由政治处的组织股掌握。对于很多重要的问题，仍然不是经过党委的讨论，而是仍采取首长简要会议的方法去解决。党委的领导很薄弱，有的甚至处于半停顿的状态。军区一再督促各纵队认真建立各级党委的领导与工作，党委对于部队中的重要措施，才开始进行民主讨论。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3页。

为了在部队尽快恢复党委制，1946年10月，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领导下，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主持起草和颁发了《党的团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团党委的组织、任务、工作及有关事项作了详细规定。关于团党委的组织，条例规定：“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简称‘团委’。”“其产生，在战时可由上级党委与政治机关……组成之，在平时可召集全团的党代表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党的干部中如团长、政委、主任应保证当选，其余可按情况选举，团政委一般的兼团委书记。”关于团党委的任务，条例规定：“团委是全团党员大会或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其任务是实现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议及上级党委决议、军政机关指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致和团结，保证全团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正确开展和作战训练等任务的完成。”关于团党委的工作，条例规定：党委应“讨论布置全盘军事政治工作，给团司令部、政治处及全团以工作方针的指示，以及检查讨论司令部、政治处的工作。”“经常检查研究分析干部与党员及部队的思想状况，及时发扬正气和克服干部与战士中不正确倾向，以保证全团思想领导的实现。”“对比较重要的问题，有时可召集团委扩大会（指定一定干部列席），以便吸收更广泛的意见及使更负责的一些干部首先了解。”“适时召集全团党的积极分子会或全团党员大会报告形势与任务，借此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等。”对于党员的奖惩、干部的升降的权限亦作

了具体规定。此外，关于团党委与政治机关的关系，也明确规定：“团委会依托政治处为其执行决议的日常办公机关，不另设专门办公机关，团委决议执行的检查督促，除一般均由政治处负责外，团委应尽量分派团委各委员分头负责领导与检查各支部对于决议的执行。”“一般日常党务工作（党的支部会议与生活及缴纳党费发展与教育党员等），由团政治处进行。”这个条例经中央审查后，认为很好，即颁发全军试行，并要求晋冀鲁豫军区将团委工作经验总结报告上去。由于“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许多工作，大都要经过团委与支部去实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又于12月15日下发了对于部队目前党的工作的意见，强调“目前除了加强纵委、旅委的工作外；应特别加强团委与支部的工作”，要认真执行团委工作条例。同年12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向中央作了《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汇报了恢复党委制的情况、经验和问题。

1947年1月14日，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政治部又给各旅团政委写信，重申恢复党委制的重要意义，要求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认真贯彻执行。同时要求各部队“召集党委会，专门详细的研究讨论一次本部颁发的‘团委工作条例’，并检查过去哪些做到了，哪些没有做到，并研究将来如何全部的去做到。”

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恢复党委制的做法，党中央十分重视。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就军队中党组织形式问题复电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指

出：“根据晋冀鲁豫执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党中央正式颁布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之前，根据晋冀鲁豫军区的经验及其文件，恢复党委制。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曾指出，军队中组织了各级党委会后，则军政委员会应即撤消。按照这些指示，我军团以上各级党委会先后成立。1947年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初稿）》，明确确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应该在这支人民军队中建立起它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即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党委员会条例，是对我军党委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党中央指示和条例颁布之后，全军团以上各级党委普遍恢复、建立并日益健全起来，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一些部队总结了实行党委制的积极作用：一是经过党委民主讨论和决定，党的认识统一，工作步调一致，不致发生互相牵扯和抵触；二是更加发扬党内民主，提高了全党积极性；三、是党委决定的问题，较之少数首长人员经商谈解决，更为全面和适当；四是有利于监督和审查军政领导机关的工作。毛泽东曾高度

评价这一事件，认为“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是“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①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38页。

《延安一日》征文启事

1、为了弘扬延安精神，全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联合发起《延安一日》征文活动。

2、《延安一日》征文主要对象，是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征文内容以记叙在延安工作、生活和学习中最值得纪念、回忆的人和事为主。征文所记叙的人和事要典型、具体，重点突出，文字力求简明生动，征文一般不超过1万字（如内容丰富，亦可不受字数限制）。因限于人力，请自留底稿，一般不退稿。

3、征文经审阅，择优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刊登（我们亦可推荐给其他报刊发表），并考虑出《延安一日》征文专辑。

4、征文请寄北京市1924信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刘昌亮收，邮政编码100091。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1991年2月15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八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